

# 國立交通大學

客家文化學院  
客家社會與文化教師碩士在職專班論文

我不住在「竹籬笆」：  
一個外省女性的客家村落生命史（1950-1980）

I hadn't Lived Behind The Bamboo Fence: the Life History of  
A Female Mainlander in a Hakka Village (1950-1980)

研 究 生：易星萍

指導教授：羅烈師 教授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七 年 七 月

# 我不住在「竹籬笆」：一個外省女性的客家村落生命史(1950-1980)

學生：易星萍

指導教授：羅烈師教授

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客家社會與文化教師碩士在職專班

## 摘 要

本研究主張外省人異質性的立場，探討外省人本土化的經驗，藉由深度訪談及文獻史料建構出一位散居外省女性的生命經驗，並呈現外省人在客家村落的生活圖像。本論文共有七章，第一章為導論，其後的結構分為故事與分析：第二章仿《金翅》的敘事性筆法，呈現研究對象的生命故事；第三章至第五章分別從外省人、社區及女性等三重視野來檢視一個客家村落的外省移民家庭故事；從故事到分析，均以移民為貫串的軸線。最後以第六章結論收結，第七章餘論則是主結構外的省思。本研究嘗試避開對外省人預設的本質化，而將焦點轉移至移民適應的研究面向，討論集居與散居在適應典型上的差異，也因而透顯外省人並不具有外省族群的意識與認同；在進一步探究散居的移民個體的認同傾向時，發現在個體與地方社會的互動關係上，個體本身具有主體性與能動性，社會與文化也有其彈性與包容力，能吸納異質的元素，在互動過程中促成社區的變遷，移民個體產生在地的認同；研究對象的性別也顯現差異性，女性移民個體在台灣既成的社會與文化脈絡中仍受到侷限，但移民淺根與游移的特性正是突破結構限制的利基點，本研究對象因此透過行動實踐而定義自己，也反映女性角色在時代變遷中的改變。

關鍵字：外省人、社區、女性、客家、客家村落、移民、生命史、本土化

# I hadn't Lived Behind The Bamboo Fence:the Life History of A Female Mainlander in a Hakka Village(1950-1980)

Student : Shin-Ping Yi

Advisor : Dr.Lieh-Shih Lo

**College of Hakka Studies Degree Program of Hakka Society and Culture**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 ABSTRACT

This research discussed the experience of a mainlander's indigenization which based on the mainlander's heterogeneity. This survey constructed the life history of diaspora of a female mainlander and presented the life's situation of a mainlander who is living in a Hakka village through the deeply interviews and literatures. There are seven chapters in this research. Chapter 1 is the introduction and afterwards other chapters are distributed into two parts. These two parts are history and analysis. Chapter 2 imitated the descriptive method of "Jin-Chi" to show the life history of the sample. From chapter 3 to chapter 5, this research used separately three viewpoints to conduct a mainlander's migrant family history of a Hakka village. Three points of view came from mainlander, community, and female. Migration is the main stream for the whole study. Chapter 6 is the conclusion and chapter 7 is the discussion of findings.

This study tried to avoid the mainlander's homogeneity but to focus on the aspect of migrant's adoption. The results show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settlement and diaspora and prove the mainlanders do not have the ethnic identity and ethnic consciousness. For the aspect of the migrant's ethnic identity of diaspora, there are some findings from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individuality and local society. First, the individuality possesses subjectivity and agency. The society and culture also have elasticity and tolerance which can absorb the heterogeneous elements. Through this interaction, it will promote the changes of the community to produce the local identity of migrants. Furthermore, the sex of sample is also significant. Female migrants are still limited in the society and culture in Taiwan. Migrant's characteristics are the main points to break the limitation of frame. The sample of this study identifies self by truly action and also reflects the female's changes in every generation.

**Keywords : mainlander 、 community 、 female 、 Hakka 、 Hakka village 、 migrant 、 the life history 、 indigenization**

## 謝誌

終於，畢。業。了。

2008 年夏天，我目送我的學生們昂首踏出學園，奔向他們的大學生活；我欣見我的雙胞胎子女盛裝打扮，參加他們人生第一個畢業典禮；而我自己也披上碩士服，完成對自己的承諾。2008 年的夏天，很特別。

我的碩士帽由長串名單撐起：

江奶奶，您是這本論文的主角，可惜我不能在這裡稱呼您的真名，您給我的不只是研究所需的生命故事，還有對我人生的啟發。對您的感謝，難以言喻。

我的指導教授羅烈師老師是這本論文的靈魂。他嚴謹的學術要求給我相當大的壓力，但在恩師的提攜與鞭策下，我才能完成不可能的任務。Asii 老師，謝謝您。還有連瑞枝老師和呂欣怡老師，您們的指正與建議，讓這本論文更見光澤，謝謝您們。

老媽，您是這本論文的最大功臣，謝謝您全力支援我，為我理家、為我照顧孩子，讓我沒有後顧之憂。當然，也要感謝老爸，謝謝您把老媽借給我。

老公，謝謝你為了我，勞心、勞力、傷財，還要兼做我的出氣筒和按摩師。你問我結婚十週年，我們擁有什麼？這本論文的孕生就是答案，因為它代表我有你的愛，而我也愛你。飛飛、多多，媽咪很久沒唸故事書給你們聽了，而你們現在都已能自己唸書寫字，還能幫忙做家事。你們在媽咪埋首苦讀之際，悄悄長大了。你們的親親，是媽咪每晚熬夜爬格子的力量，謝謝你們。

美虹、碧冬、顏穗、徐薇，還有許多好同事，謝謝你們對我這兩年動不動就哭的包容與疼惜。鈺涵、佩如，沒有妳們這些好同學，我大概早就成了研究所的逃兵吧，謝謝妳們時時緊抓著我不放。還有昭慧，我們從計畫逃亡到能攜手畢業，革命情感難捨。秋燕也是一起加油的好伙伴。慧心巧手的助理旻秀，看妳的部落格，是我論文寫不下去時的最佳補給品哦！

還有許多幫助我的朋友，無法一一具名，星萍在此向您們致意。

回首這趟研究之旅，煎熬中閃現成長的喜悅，蛻變不就是如此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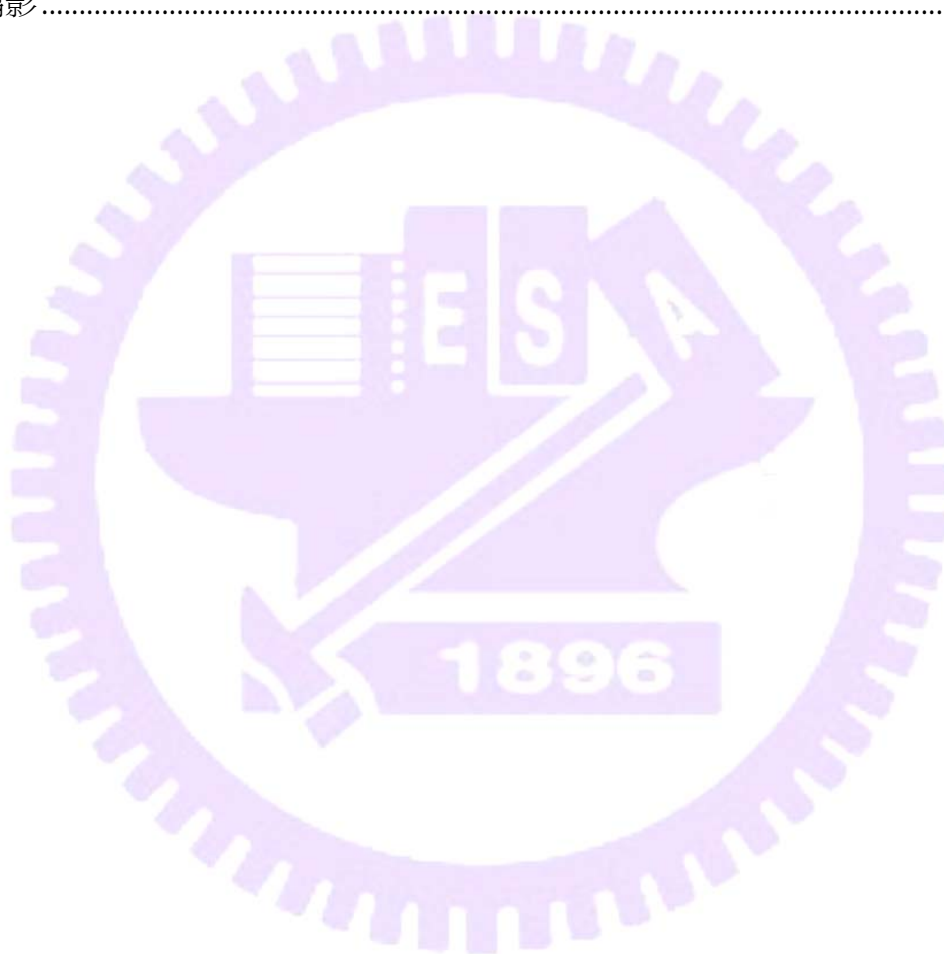
星萍・2008 夏

## 目錄

中文摘要.....	i
英文摘要.....	ii
謝誌.....	iii
目錄.....	iv
表目錄.....	vi
圖目錄.....	vii
<b>第一章 導論</b> .....	<b>1</b>
第一節 研究動機.....	1
第二節 文獻回顧.....	3
第三節 研究對象.....	12
第四節 研究方法、文獻史料與章節安排.....	18
<b>第二章 一個外省女性在客家村</b> .....	<b>24</b>
第一節 劇變的中國·走調的青春.....	24
第二節 改治的潭門·苦難的歲月.....	40
第三節 飛躍的經濟·落地的家族.....	67
<b>第三章 「竹籬笆」內外的移民適應差異</b> .....	<b>87</b>
第一節 移民適應的概念.....	88
第二節 集居外省人的遷移適應.....	93
第三節 散居外省人的一種典型.....	101
小結.....	113
<b>第四章 老潭門的開放性與變遷</b> .....	<b>115</b>
第一節 老潭門社會的開放性.....	115
第二節 一體的兩面：老潭門社會提供移民適應的助力和阻力.....	118
第三節 老潭門社會的變遷.....	122
小結.....	127
<b>第五章 她的主體性與角色轉變</b> .....	<b>128</b>
第一節 女性主體意識的萌生.....	129
第二節 女性主體意識的覺醒.....	131
第三節 重構女性個人生命的意義.....	1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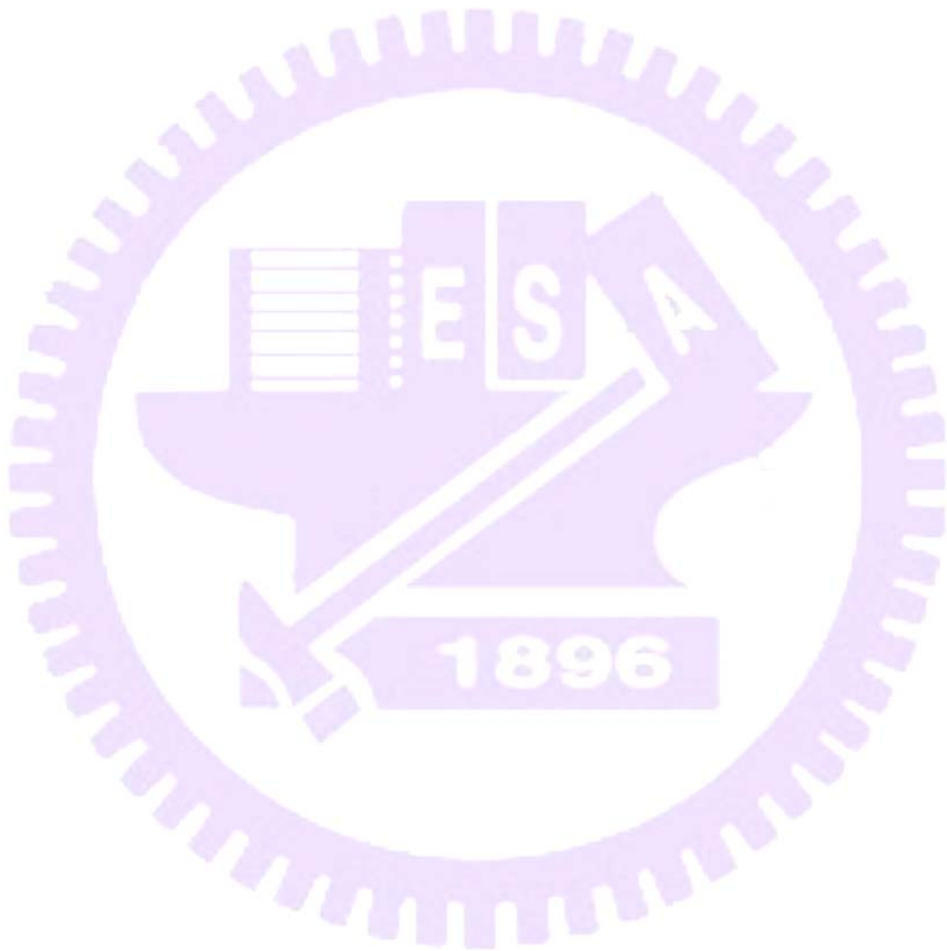


小結.....	138
<b>第六章 結論 .....</b>	<b>139</b>
第一節 本研究的意義 .....	140
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展望 .....	146
<b>第七章 餘論 .....</b>	<b>149</b>
<b>參考文獻.....</b>	<b>153</b>
<b>附錄.....</b>	<b>159</b>
史料剪影.....	159



## 表目錄

表 1	江志如生命重要年表.....	13
表 2	江志如史料明細表.....	21



## 圖目錄

圖 1	江志如系譜圖.....	12
圖 2	新竹縣位置圖.....	14
圖 3	遷移適應循環系統示意圖.....	90
圖 4	雙重認同光譜.....	112
圖 5	老潭門社會結構示意圖.....	116
圖 6	老潭門社會變遷示意圖.....	125
圖 7	江志如主體性的發展歷程.....	129
圖 8	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的自我探索圖.....	150



## 第一章 導論

本研究宗旨在探討外省人本土化的經驗，試圖由一位外省女性的生命經驗及自我感受出發，呈現外省人在客家村落的生活圖像，期望藉由凸顯異質性以反思主流論述框架的謬誤。<sup>1</sup>首先釐清外省人的異質性，以理解不同的生命處境和社會位置將導引社會行動者步上歧異的路途；其次，外省人流亡到台灣以後，在地社會為他們提供適應的助力和阻力，並以當地社會自有的邏輯將外省人納編進地方社群；再者，外省人以個別行動者的主動性與能動性，將早年生命經驗轉化，並將根紮到台灣的土地上，進而本土化。

本章將說明本研究的動機、問題意識，以及回顧社會科學中有關外省人的研究、歷史與記憶、女性的主體性等文獻，並扼要地介紹本研究的對象及其所居處的地方社會，最後說明本研究的研究方法與章節安排。

### 第一節 研究動機

#### 一、研究動機

若依漢人父系繼嗣原則，我是外省人第三代。在那板蕩的年代，就讀高中的祖父棄學從戎，並攜眷隨軍隊輾轉撤退來台。來台後曾有一段短暫的眷村生活，退役後的祖父只能打零工養一大家子人，家父與叔叔在家計的考量下，棄讀一般大學而轉考軍校。家母是老潭門的客家人，她與家父自小相識，因為祖父一家在四處漂蕩中，曾經落腳老潭門好幾年，就在老街上。<sup>2</sup>這是典型外省人的際遇。從求學到工作，只要碰上外省人，

---

<sup>1</sup> 我以為「外省人」實為一政治建構，被視為與原住民、閩南、客家並列的族群是否合宜尚有許多再討論的空間，但在尚未有更合適的用詞之前，為了本研究在行文的需要上將會繼續借用「外省人」一詞，而不再添加「」。

<sup>2</sup> 「潭門」為假名，因當地歷史背景有而「老」與「新」之稱。由於本研究涉及研究對象非常隱諱的生命經驗，應當事人要求，也為保護她及其家人，故本研究中相關的地名、人名等均以假名處理，並在假名第一次出現時加註說明。

不管是同輩或長輩，相似的家庭背景往往很快地就能拉近彼此的距離，而產生親切的感覺。這也是許多外省子弟的經驗。

碩一下學期修習田野研究法，因為父母與老潭門的深厚淵源，老潭門便成為我優先選擇的田野地點，並在羅烈師老師的鼓勵下，決定以老街上一間已關閉的戲院為期末報告主題。猶記初次拜訪戲院老板娘江志如——已高齡八十二歲的外省老奶奶，我企圖盡快建立關係，使出「我也是外省人」的招數，再追加「我爺爺和爸爸都是軍人」的靈藥，卻得到淡漠的禮貌性回應。<sup>3</sup>這無往不利的一招，竟然踢到鐵板，當時我心裡滿是震撼和疑惑。在之後的訪談中，老奶奶提及老潭門的客家人是眉開眼笑，話語中充滿友善與好感，卻淡淡地說與外省人沒什麼往來。不像外省人的外省人，這位老奶奶激起我的好奇心，好奇外省人的本質是什麼，好奇外省人如何看待我群，也好奇像老奶奶這樣第一代的外省人是如何與本省人靠得這麼近。如果外省人已在地化，還能再被視為「外」省人嗎？

在台灣當前的政治氛圍下，絕大多數的本土論述、愛台灣的口號，外省人總是被排除在外，這個身份與主流的本土化論述扞格而被污名化。難道，後來與先到就永遠是互斥的南北磁極嗎？本研究試圖在這股激昂盲目的政治潮流中，為台灣社會的「歷史」補上另一種聲音，呈現一位年長女性、非軍系背景的外省人，以自己的步調融入台灣這片土地，並企圖為當前污名化、被強迫同質化的外省人展現另一種形象，證明外省人做為一種族群建構的不適當性。最後，我將以這位外省老奶奶的生命經驗為外省族群長期在地化的努力而發聲，期望能為台灣社會中本省人／外省人長期隔閡與斷裂的現象，提供某種程度的媒合。

## 二、問題意識

在台灣，一般人講到外省人就直接聯結到軍人，而後，政府將軍人及其眷屬安置在眷村集體管理，而逐漸同質化，也被外人標籤化，於是外省人被簡單的化約成軍人，也與眷村文化緊密聯結，不管是民間論談或是學術焦點幾乎都陷入外省人、軍人、眷村三

---

<sup>3</sup> 「江志如」是假名。

位一體的思維。1990 年代晚期終於有研究開始注意到這個盲點，但直到 2000 年代初期才真正探觸核心，解構前人論述，但後繼的研究仍極為缺乏，尚未形成一股沛然的力量。

歷來有關眷村的研究很多，但是，外省人並不盡然都是軍人。沒有國家撐腰，沒有同胞壯膽，沒有集居的封閉（或自給自足）社會網絡，非軍職的外省人散居在全台各處，他們勢必得與本省各族群直接接觸，也就是弱勢者得想辦法融入當地社會文化中。在現今社會氛圍中，此一本土化經驗卻被忽略，因此，本研究企圖透過一位長居老潭門的外省女性的生命經驗，呈現當年外省家庭努力融入客家村落的歷程與成果。

本研究擬由三方面著手探究這位非軍職背景的外省女性的本土化經驗。首先，透過研究對象的生命經驗，釐清她在大陸時期所經驗的身份以及所處的位置，因為對照高比例軍職背景的外省人及其來台原因和過程，將凸顯出她不同的生命經驗和在台生活。其次，檢視研究對象的台灣經驗，包括語言操持、鄰里關係、人際網絡、經濟能力、宗教信仰等，察考她對在台生活的觀感和認同程度，並解析出驅使她本土化的因素。最後，我們相信研究對象本身的主體性與能動性，在社會變遷中得到某種程度的發展，因而促成其特殊的生命經驗，因此，我們也將嘗試理解她在表述自我、理解台灣經驗，以及自我定位的內在意涵。

## 第二節 文獻回顧

本研究欲透過一位外省女性江志如的生命經驗，呈現外省人的異質性，並從中細緻地描繪外省人在台灣落地生根的圖像。在文獻回顧方面，將分三個層面討論：一是從社會科學中有關外省人的研究來討論，以指出目前相關研究的偏向與不足之處；二是從歷史與記憶的理論來探討個人記憶於歷史之有效性與侷限性，做為本研究的學理依據與指引；三是關於女性的主體性，提供本文對研究對象有更深刻的認識與分析。

## 一、外省人研究

在社會科學界，關於外省人的研究以國族認同和眷村相關論述為多。前者是順應台灣特殊的歷史脈絡和政治氛圍下的產物，由於外省族群在國族認同上的高度相似，與解嚴後的政治正確相背，而遭致污名化，這類研究更常陷入本省／外省的二元斷裂。後者是因國家機器主導而使集居的外省人形成一個特殊可指認的社區和群體，眷村變成外省人外顯的標記，因此研究外省人，眷村幾乎成為不作他想的唯一內涵。上述不論哪一類的研究，主要對象均是男性，女性在這個範疇幾乎消失，男性一言堂的偏執角度應該修正。而且外省人在政治建構下逐漸本質化，絕大多數的相關研究也都不脫這個思維。

劉益誠反對將外省人視為一個同質性的族群，而嘗試呈現外省人的差異圖像。<sup>4</sup>眷村與散戶居民，因早年相似的生命經驗與軍人角色而共享相似卻不相同的國家認同，根本原因在於「眷村、散戶跟國家的距離是不對等的」，因而產生積極與消極的認同結果。<sup>5</sup>國家以權力與福利兩面互生的形象降臨眷村，眷村以日常生活的認同實踐做為回報；散戶沒有親近國家的途徑，只能不斷消耗過去對國家的想像。不同位置、不同生命經驗的外省人因特定的歷史脈絡而被劃分成同一族類，但他們並不視對方為「我群」，多重行動者的身體實踐與主觀詮釋，輕易破解政治建構下的「外省人」密碼。

劉氏揚棄冰冷的統計量表式的巨觀視角，轉而重視多重行動者的聲音與詮釋，細緻地呈現不辯而證的差異圖像，打破過去「外省人」等同「眷村」的思維，終於揭開外省人異質的真象。然而，關於散戶的成分，劉氏雖然指出有非軍方背景的「難民」與原住民移民，但整個研究仍圍繞在有軍隊經驗的外省人打轉，「難民」突然消失而沒有任何交代，令人遺憾。<sup>6</sup>我以為劉氏雖將「外省人」與「眷村」的等號打破，卻沒能將「外省人」與「軍人」（或俗稱的「阿兵哥」）的等號一併消除，遑論女性在其中發聲的可能，因此並不能完全回應外省人差異性的基本關懷。

---

<sup>4</sup> 劉益誠，《竹籬笆內外的老鄉們－外省人的兩個社區比較》（新竹：清華大學社會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頁2。

<sup>5</sup> 劉益誠，《竹籬笆內外的老鄉們－外省人的兩個社區比較》（新竹：清華大學社會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頁49。

<sup>6</sup> 關於原住民移民，劉益誠特別聲稱其遭遇的困難，以致產生的侷限性。見劉益誠，《竹籬笆內外的老鄉們－外省人的兩個社區比較》（新竹：清華大學社會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頁63。



趙彥寧從女性角度出發，更進一步實踐外省人異質性的觀點。首先，爲了避免陷入「中國」、「台灣」二元對立的思維，她以「中國流亡者」指稱一般所言的「外省人」；其次，明確定義「中國流亡者」爲自 1945 年起來台至解嚴前無法返鄉者，以真實反映「中國流亡者」的異質成分；再者，她以「噤聲的女性」挑戰公私領域中男性霸佔發言權的現象；最後，強調「階級」的影響，不同階級者來台後也將看到不同的風景，並發展出迥異的生命經驗，顛覆過去對「中國流亡者」的想像，更解構「中國流亡者」與國家認同之間的必然關係。<sup>7</sup>趙氏不斷試圖讓我們看到例外、例外的例外，也就是說她不停地在二元對立之間解構與重構。<sup>8</sup>趙氏利用女性隱諱的話語，解讀女性沒有或無法、或不能說出的想法，也就是隱身其中的價值思維，並推論出在父系社會結構下，女性以生殖的身體與母職實踐做爲個人意義的正當性和終點。趙氏嘗試超越族群、階級等社會建構的分類，延展出女性相似的位置。

打破所有習以爲常的概念是趙彥寧最大的貢獻。她時時提醒例外的存在，異質才是真實的存在。而女性因長期被摒除在公領域，甚至是家戶的私領域論述之外，因此在她們的看法中更能見到公私領域互動的痕跡，性別研究將提供不同的視角。不過趙氏選用「流亡」指稱研究的對象，似乎隱有變動、不安定、不落腳的意涵，因此在研究者主觀的意向上只停留在回憶流亡經驗的層次上，而無法滿足筆者所關心的——流亡者如何安定在新的土地上而停止流亡。

在外省人相關論述中展開女性身影的性別研究，有賴錦慧及郭苑平，分別研究婚入眷村的原住民女性與台灣籍女性，她們的研究都指出女性邊緣化的處境。<sup>9</sup>

郭苑平指出眷村中台籍婦女的邊緣化來自於生理性別以及族群身份的雙重弱勢，不僅受掌權男性的壓制，也在等同男性地位的外省女性的監督下，學習認同眷村的具象生活和抽象價值。而這套主流論述涵攝在生活的各個層面裡，對弱勢、不擅掌控公共言說

<sup>7</sup> 趙彥寧，〈戴著草帽到處旅行：試論中國流亡、女性主體、與記憶間的建構關係〉，收入趙彥寧主編，《戴著草帽到處旅行》（台北：巨流，2001），頁 203-245。

<sup>8</sup> 張茂桂，〈「流浪」到永遠？評介趙彥寧，〈戴著草帽到處旅行〉〉，《台灣社會學刊》28（2002）：265。

<sup>9</sup> 賴錦慧，《族群通婚與族群觀——四季新村原住民婦女的經驗》（花蓮：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1998）。郭苑平，《眷村台灣媽媽的自我與認同研究》（新竹：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

的女性而言，飲食和語言的學習是她們最切身的經驗，也是最易於訴說的面向。她們時時在複製並強化不斷貶抑推擠她們的主流論述，形成一個循環又循環的過程，在這扭曲的過程中，她們認同，也相對得到認同，但無助於她們轉換位階。她們最終要透過母職的實踐，依附於丈夫和子女的成就之下，才能得到自我的身分和價值，也才有可能跨越族群身分的鴻溝，在眷村中得到被肯定的機會。要言之，郭苑平指陳眷村內部性別、族群與階級間的關係，在台籍女性身上發生緊箍的作用，驅使她們「主動」認同。<sup>10</sup>

郭苑平的研究將外省女性劃分至男性位階，以凸顯台籍婦女的弱勢，某種程度或忽略或壓抑了另一類的女性，這固然是她研究取向所限，但性別主題將因此受到侷限或扭曲，故郭氏的研究與其說是關心性別議題，毋寧說是關心階級。

綜上所述，劉益誠率先注意到外省人的異質性，切割軍人與眷村的關係——眷村內的軍人社群、眷村外的軍人社群，卻未把外省人和軍人分割清楚，仍然混用而任由它們畫上等號。趙彥寧延續異質性的立場，並將研究主體轉至外省女性，也跨越眷村限制，透過她們的生命經驗解構並重構我們僵化的概念和二元對立的斷裂。賴錦慧和郭苑平提供了眷村中非外省女性——原住民婦女與台籍婦女的視角。在這樣的脈絡下，應有一塊「外省人、非軍方背景（非眷村）、女性」的領域，更確切地指出外省人的異質成分，揭開「外省人」的政治性建構，並得到重新省思的機會。更企圖藉由本研究對象的生命經驗，理解這類散居的外省人是如何在異地生存，為什麼能在異地生存，為了生存他們有何改變，改變的程度有多少；另一方面，異地提供什麼助力或阻力，為何會提供這些條件，異地因外來者的加入而有何變遷，呈現何種新面貌；此外，在移入者與在地者互動的過程中，雙方都將因此而產生若干變化，並共創新的生態。

## 二、歷史與記憶

前述有關外省人的研究，研究者均從研究對象口述訪談的生命經驗來探究其關心的主題，那些受訪者從個人記憶重構過去，也重新解讀過去，他們再現的是「歷史」嗎？

「歷史」的本質是什麼？它有所謂的「本質」嗎？它是真實發生的事嗎？還是詮釋發生

---

<sup>10</sup> 郭苑平，《眷村台灣媽媽的自我與認同研究》（新竹：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



的事？如果是後者，那是「誰」在詮釋？誰有這權力詮釋？他／她何以如此詮釋？研究者又該如何面對由受訪者記憶所產出的「材料」呢？我們有必要從學理上的討論來理解歷史與記憶。

遲至二十世紀初，社會學家與心理學家揭開「集體記憶」的秘密，歷史學家開始對於「歷史」的一元性和真實性產生疑問。集體記憶理論的開創者 Maurice Halbwachs 主張記憶是一種集體社會行為，不同群體有對應的集體記憶，也藉由各種社會活動強化集體記憶，進而凝聚認同。俄國心理學家 L.S.Vygotsky 進一步提出個人記憶離不開社會、文化、群體的集體記憶活動。英國心理學家 Frederick Bartlett 提出個人記憶是在自己心中的「概圖」上重建過去，而個人心中的概圖受社會群體影響，必須配合社會組織提供的記憶架構，因此，記憶與事實是不相符的，是經過扭曲的，是合理化過去的手段。人的回憶往往比「事實」多了補充說明或推論，而歷史又是人們在特定時空下選擇性地重建或重組過去，因此歷史作為一種社會記憶，也與個人的回憶相似，是對過去作理性化的解釋與重建，而刻意遺忘或扭曲的結構性健忘往往是在現實環境中改造認同的手段，更可見歷史的政治性。<sup>11</sup>王明珂以為這種歷史的政治性體現在族群的集體記憶和認同上就非常深刻，因為欠缺明確血緣事實的「文化親親性」，更容易透過選擇性的集體記憶或是結構性健忘來操作邊界的修正，成員的認同也隨之變遷，而控有這選擇權的，是社群中的菁英。<sup>12</sup>

由此說來，歷史不是一元的論述，而是多元的論述；它不是已僵死的，而是活化的，會持續被建構、被修正，它反映的是「個人的認同、行為、記憶與社會結構間的關係」，而社會本質也就在各方詮釋的競爭過程中不斷被修正。因此，不論是文學性的自傳、傳記，或是學術性的口述歷史，均是個人記憶與社會記憶間不斷互動、彼此吸納、互為因果的產物，而採訪者或研究者本身的社會背景與價值認同等必然在其中產生若干影響。王明珂分析了 1945 年起近五十年出版的自傳、傳記與口述歷史，指出男性、非台籍人士及在各領域有所成就的人，尤其是政治界，握有絕對的歷史詮釋權。問題是社會並非

<sup>11</sup> 王明珂，〈集體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當代》91（1993）：6-19。

<sup>12</sup> 王明珂，〈過去、集體記憶與族群認同：台灣的族群經驗〉，收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輯，《認同與國家：近代中西歷史的比較》（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頁 249-274。

單一階層，歷史也沒有標準版本，幸而在這夾縫中已逐漸開出新的花朵——邊緣的、弱勢的、被剝削者的聲音逐漸冒出頭來，賦予他們申明、辯駁、證明自我存在的機會。在此趨勢下，對婦女記憶的積極採集，已成為共識。<sup>13</sup>

然而，當研究欲呈現異質性的「證據」，也就是展示被推擠到「社會集體記憶」之外的另一種「個人記憶」時，面對的質疑將會是「記憶」可靠否？尤其既是「個人的」，能有多少代表性？固然研究者將以客觀性的文獻和史料，以及他者的說法做為比對和檢證，不過口述歷史和社會記憶的包容性才真正足以解套，甚至於它們是歷史與社會活化的來源。刀刀兩面利，優點也恰是缺點，因此研究的焦點並非受訪者提供多少「事實」，而是繞到背後，分析受訪者如何詮釋、為何如此詮釋、這樣的詮釋對受訪者以及社會有何意義。

歷史學界關注記憶面向的真偽與意義，心理學領域也有一套別具意義與爭議的研究方法——心理傳記學。心理傳記學的主角，當然是「人」，研究者對「人」的形上預設信念不同，就會有不同的研究典範，心理傳記學也就以多元的形貌出現。心理傳記學屬於人文社會科學，它的開展就是「研究」，因此有一系列具體可行的步驟、嚴謹批判的論證過程，但必須尊重脈絡的獨特性，因為生命不可化約或切割。心理傳記學的「研究」最終要以一本傳記的文學形式出現，它是資料的組織，解釋的檢核，背景的分析，再加上文學的熔接。但心理傳記只是試圖傳達傳主的生命「圖像」，而非「真實」，它頂多只能做到「多元的真實」以及「建構的真實」。而且，這一歷程，對傳主以及對研究者都是一種「社會建構」，所產生研究結果，亦即「傳記」，也將對閱聽者產生不同程度的「社會建構」。<sup>14</sup>質性研究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中有蓬勃而正向的發展，因為人或許有許多共通性可被化約、歸納或預期，但人有其歷史性、社會性，多重因素激盪出個人的獨特性，使得每個生命都是值得被探究、被尊重。一個以科學研究產出的生命「圖像」，是以更易為人所接受的形式，傳達出嚴謹的知識與嚴肅的意義，達成社會科學的目的。

<sup>13</sup> 王明珂，〈誰的歷史：自傳、傳記與口述歷史的社會記憶本質〉，《思與言－人文與社會科學雜誌》34.3（1996）：147-183。

<sup>14</sup> 丁興祥、賴誠斌，〈心理傳記學的開展與應用：典範與方法〉，《應用心理研究》12（2001）：77-106。

因此，本研究企圖重新檢視並修正當前主流歷史對外省人的論述，選擇的研究對象非當前社會主流論述下的典型外省人，且是公共論述中居於邊緣地位的女性，又是年事已高的老者，此三重弱勢者的身份，其記憶更有保存的價值與研究意義。且由受訪者個人主觀記憶出發，我們見到的將不只是過去的再現，更可見到「現在」如何影響她講述和詮釋過去，比如近年社會上強烈的本土化要求、族群意識衝突、或家庭經濟條件改善、丈夫去世後的寡居心情等，這些後來的經驗和當下現實的需要，可能會使她重新塑造過去。<sup>15</sup>此外，口述訪談是研究者與受訪者互動下的共同產物，研究者的主觀意識、價值取向、個人背景等亦將無可避免地在其中發生若干影響。

### 三、女性的主體性

本研究的對象江志如，相較於同年代的女性，其特殊的生命經驗導源於她具有自主性，所以，「女性的主體性」是本研究在梳理江志如生命史時非常重要的面向。

個體的主體性不只是本質的存在，更是建構的。個體的主體性在生命情境與外在環境互動的過程中，可能改變、彰顯，也可能隱閉。陳怡君研究日治時期的台灣文學女作家楊千鶴，將女性的主體性分為身體主體與內在的精神主體，指出接受教育、投入職場、吸收新知等能提供女性身體主體性開展的空間與機會，進而形成內在的、精神主體性的自我反省與確認，女性正向的生命力因而徹底彰顯。不過，主體性的實踐往往奠基在社會脈絡與物質基礎上，也就是說，個體在權力結構中的位置（如階級、社會、性別、職場環境）是不可忽視的輔翼條件。因此，女性的主體性在現實社會情境的侷限下，僅能有限度的實踐與發展，但是，身體主體性或許受到阻礙，內在精神主體卻可透過思考、批判而不斷自我建構。陳氏透過楊千鶴的生命經驗，以及小說、自傳、論述性的文章等，爬梳出楊千鶴在各生命階段中的女性主體實踐，以展現其新女性的形象。女性主體實踐的過程並非順遂無波，實踐與箝制其實是交互影響的兩面因素，在矛盾中求突破正是女性主體性發展歷程的主軸。<sup>16</sup>

<sup>15</sup> 柯塞著，邱澎生譯，〈阿伯瓦克與集體記憶〉，《當代》91（1993）：32。

<sup>16</sup> 陳怡君，《日治時期女性自我主體的實踐——論楊千鶴及其作品》（台南：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



江玉珮則研究一九八〇年代的女作家蕭麗紅。江氏指出蕭麗紅之所以未名列女性主義作家，是因作家在主觀意向上不願被侷限，但不表示沒有女性意識，並透過作家筆下的女性，反思女性的主體性。蕭麗紅小說中的女性均是具有傳統婦德的女性，自我壓抑、自我衝突與矛盾，進而覺醒並尋求解脫的歷程，反映出女作家本身的創作心理與背景。蕭麗紅面對父權社會對女性的壓迫，她的反思是藉由被壓抑的、謙卑的、但內在心靈高尚的女性主人翁來訴說，也就是將她的女性意識表現在對女性生命價值的關懷，而非激烈反抗傳統禮教。江氏以爲蕭麗紅用溫和、冷靜，也樂觀的筆調，重構出不必走出家庭，卻能了解自我處境、知道自我需求，實現自我並認同自我的新女性。<sup>17</sup>

關於女性主體性的研究，時常透過具有知識、書寫能力、反思能力的女性作家，或是藝文作品中的女性角色的形象來討論，陳怡君與江玉珮的研究只是其中的兩個例子，這似乎意謂著女性的主體性，與知識和反思能力是分不開的。此外，陳怡君與江玉珮的研究結果都指向：擁有成熟主體性的女性個體能爲自己找到面對困境的解決之道，更能獲得自我生命的意義。提到女性主體性，不免令人聯想到女性主義，這兩者有何關聯或差別？擁有女性主體性是否就是服膺女性主義？江玉珮的研究試圖將女性意識與女性主義切割，而蔡麗玲的研究站在女性主義的立場上提供一個更前進的觀點。

蔡麗玲直接以《母職作爲女性主義的實踐》爲題，透過理論論證與田野深度訪談，進行女性特殊性及潛力的具體討論。不可諱言，女性主義的確開啓了女性對自我的關注與反思，以及對父權的批判，其後流派論戰的焦點在於母職實踐。反對者以母職爲剝削女性的元兇，然而贊成者則相信母職是造成女性特殊性的來源。在此相悖的理論基礎上，蔡氏以實證指出母職必須經過「自主性」、「職場價值」的洗禮，並具備「自我肯定」的能力，若有「女性情誼」更能發揮支持的力量，由此，母職才可成爲女性主義實踐的一種方式。反過來說，母職實踐是女性的一種選擇，但長期以來父權體制的操縱方式，如破壞女性自主、搶奪女性身體自主權、忽視女性的無償勞動，並以職場價值壓迫等，卻是女性不快樂的原因。所以，女性主義所支持的母職價值仍來自對父權體制的批判，

---

士論文，2006）。

<sup>17</sup> 江玉珮，《蕭麗紅小說中女性主體反思之研究》（屏東：屏東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

唯有突破既有價值框架的母職實踐，才能產出由內而外的改變、成熟的人格、以及更深刻的多元成就等正向發展。<sup>18</sup>

在女性主義與母職實踐的議題上，吳孟潔進一步結合了移民行動的現實面向，以田野調查的方式，指出台商女性配偶在父權文化與經濟現實的結構裡，她們被迫中斷原本的工作與生活，角色重置使夫妻間權力關係失衡。雖然她們處在女性與移民的雙重弱勢位置，但高學歷與職場磨練的經驗，使她們能獨立與反思解決困境的辦法。<sup>19</sup>也就是說，女性行動者以其成熟的主體性帶動能動性，消解失去職場價值的焦慮與困境。吳氏的研究反映出具有知識與反思能力的女性，即使被迫回歸家庭實踐母職，也不以激烈的手段與父權制度對抗，而是另思應對的策略行動，顯現蔡麗玲所謂的，實踐母職的女性能擁有成熟且高適應力的人格。

本研究企圖從女性角度來觀察與分析，但務求以江志如本身的脈絡出發，並不刻意強調女性主義，但正如前文所述，關於女性主體性覺醒的論述，我們仍無法與女性主義完全切割，而有若干借用。

總之，分類是人類心靈的某種需要，尤其是在台灣的歷史脈絡下，漢／番，閩／客，外省人／本省人，中國結／台灣結，外來者／本土化，二元對立所生產的排除異己的霸權思維一直沒停歇過，只是不同的時空脈絡有不同的政治正確，於是壓迫者與被壓迫者的位置便在其間不停地交換，歷史也因掌權者的更迭而一再重構，以傳播隱藏其中的意識形態。可是「中國」、「台灣」、「族群」（或省籍）等持以分類的概念其實經不起檢驗，模糊的內涵來自於戰後民族主義運動下的產物，也反映出當代台灣政治與文化論述的內在焦慮。<sup>20</sup>此時，異質性的意義從而衍生。游離在主流邊緣的異質者，將讓人們發現分類概念的謬誤，而女性視野更能提供不同的觀察面向，顛覆習以為常的價值，因而肩負起媒合斷裂的可能貢獻。我們只有以微觀的視角，開啓地方性的視野，方能看見活生生的人群和真實的故事，也才有論述的基礎和詮釋的空間，歷史的意義便在其中拓展開來。

<sup>18</sup> 蔡麗玲，《母職作為女性主義的實踐》（新竹：清華大學社會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8）。

<sup>19</sup> 吳孟潔，《漂洋過海的生活：台商女性配偶的遷移與轉變》（新竹：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

<sup>20</sup> 趙彥寧，〈戴著草帽到處旅行：試論中國流亡、女性主體、與記憶間的建構關係〉，收入趙彥寧主編，《戴著草帽到處旅行》（台北：巨流，2001），頁 200-201。

### 第三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企圖透過一位曾經長居老潭門的外省女性的生命經驗，來呈現外省人本土化的經驗，故本研究的研究對象包括江志如，以及她所居處的老潭門社會。

#### 一、人——江志如

本研究以潭門老街上已關閉的光榮戲院老板娘江志如為主要研究對象，因為她的特殊性開啓我對外省人的新理解與興趣，而且，在她身上集合了外省人、客家人、老潭門等與我有關的多重面向，更重要的是她個人有極高的配合意願。<sup>21</sup>江志如已是高齡老者，記憶難免有若干的衰退或混亂，但目前身體健康尚佳，言談也十分清晰、有條理。

江志如與王先生結縭後，育有四名子女，在台家族已繁衍到第四代（請見圖 1）。<sup>22</sup>丈夫過世後，與長女和三女同住在台北自宅。與江志如的單獨訪談，前後八次，初次是電訪，其後七次在江家宅內進行，每次約一至二小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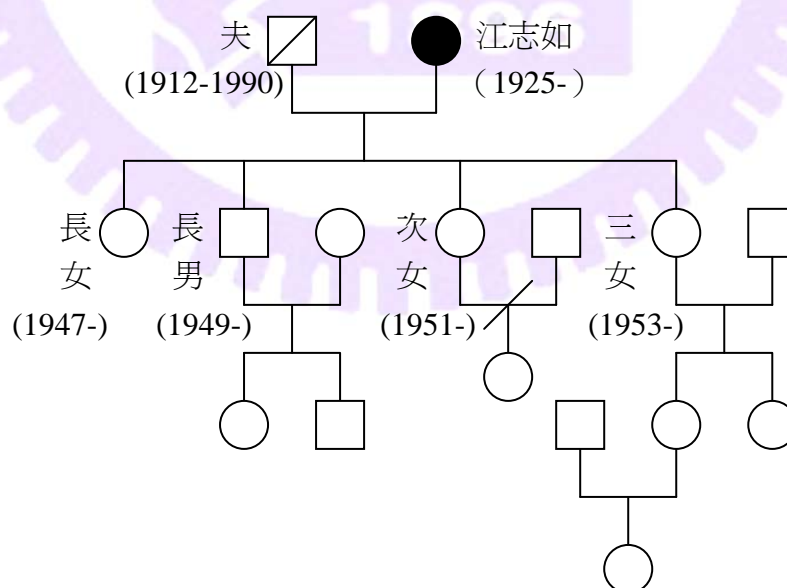


圖 1 江志如系譜圖

<sup>21</sup>「光榮戲院」為假名，該戲院位於潭門老街上，訪談中，江志如曾指正戲院名稱並非如《潭門鄉志》中所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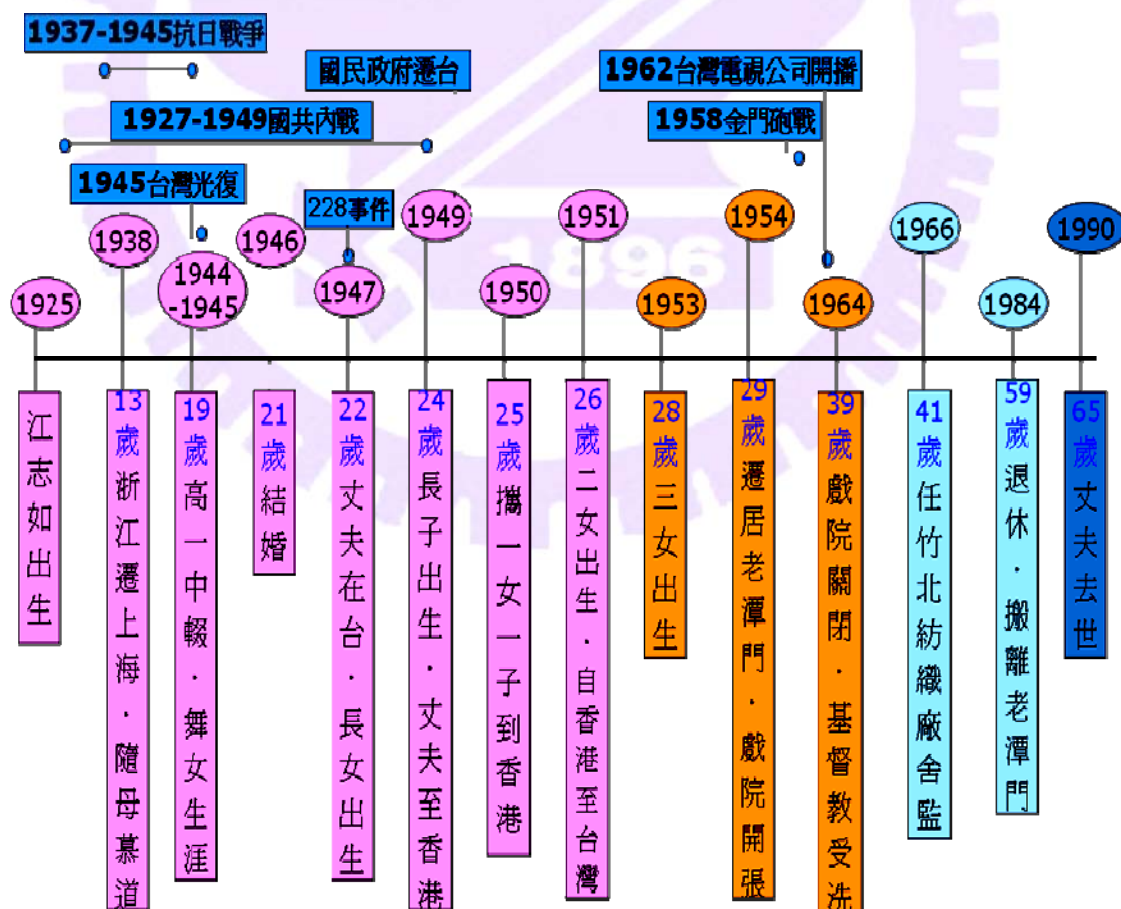
<sup>22</sup> 江志如的丈夫「王」先生，姓氏為假。



第二章將以全章的篇幅敘述江志如的生命故事，以下僅簡述她的生平概要（請見表 1）：

江志如（1925-），浙江人，原生家庭富裕又有權勢，屬於上階層，她因此得以接受教育，直到高一，家境驟轉才輟學。嫁為人婦以後，物質生活仍奢華無缺，不過夫妻欠缺感情基礎，以及原生家庭的拖累，使她精神生活飽受折磨。台灣光復後，她家在上海的棉布生意逐漸轉移到台灣。民國三十八（1949）年上海淪陷，她丈夫先到香港，隔年她再帶孩子們去會合，四十年才遷入台灣。江志如一家抵台後，家庭經濟已不復過去的榮景，先在台北短暫落腳，再搬到新潭門從事養豬生意，失敗後又轉至老潭門開戲院。戲院倒閉後，卻沒有立即搬離。<sup>23</sup>從民國四十三年起，三十歲的江志如與丈夫，以及四名年幼的子女定居在潭門老街上，長達三十年，直到七十三年江志如退休才搬離，遷居台北與女兒同住。

表 1 江志如生命重要年表



<sup>23</sup> 《潭門鄉志》中的記載是民國五十多年時搬離老街，與江志如說法不符。見《潭門鄉志》，頁 245。

## 二、地——潭門

江志如一家落「地」生「根」之處，潭門，是本研究關懷的另一個部分，尤其是江氏主要居住地老潭門及老街。

### 1.地理環境

潭門，位在台北盆地以南，苗栗及竹南丘陵以北，為台灣西部平原與山地之交，是南北交通必經之地。潭門三面環山，水源豐沛，且氣候溫濕，兼有平原及丘陵地，自拓墾以來就有興盛的農業，平原盛產稻作，丘陵地則發展經濟作物，栽植茶葉及水果。目前行政區隸屬新竹縣（請見圖 2）。



圖 2 新竹縣位置圖

## 2. 歷史及語言

潭門一帶的土地，當年屬於竹塹社原住民所有，在竹塹社與粵籍墾佃的拓墾下，逐漸發展成河口淘、大潭門與上曲，三庄鼎立。<sup>24</sup>而羅屋等宗族於 1798 年取得所有權，宣告大潭門庄正式開庄，經過羅、陳、戴、葉、周、張等宗族長期墾殖，發展成此地大姓，擁有大量土地，並控有灌溉系統所有權。宗族內部階級分化，幾乎所有居民都被組織進去，形成穩定社區的重要力量。<sup>25</sup>

大潭門是純客家人的村落，絕大部分居民祖籍廣東陸豐，以海陸客家話為通行語言。部分居民祖籍廣東蕉嶺，操四縣客家話。因人口優弱勢，能講四縣客語者必能講海陸客語，但使用海陸客語者僅能聽懂四縣客語。<sup>26</sup>

## 3. 交通輻輳

老潭門，跨越潭肚和潭門兩個行政村。<sup>27</sup>主要街區落在潭肚村 1-14 鄰，就是一般人熟知的潭門老街一帶，昔日屬於「大潭門」三個人口密集區之一。<sup>28</sup>兩百多年前竹塹地區陸續開墾，從平地到山區，村落林立，大潭門位居山區與台地中間，挾著優勢的地理位置，成為貨物集散地。1884 年劉銘傳主持台務，興辦基隆到新竹的鐵路，老潭門屏雀中選，設立「大潭門火車站房」，1893 年正式通車。日治時期改稱「潭門驛」，車站周邊區域，商旅往來，進出繁忙。當地旺族羅家掌握商機，在自有土地上開通三元宮到潭門驛（即後來的天主堂）的道路，並率先興築融合巴洛克風格的房舍，整排連貫的拱圈牌樓隨後陸續起造，被稱做「新街」，與先前的兩條民街串連，形成老潭門的心臟，享受鐵路交通帶來的商業利益，直到 1929 年鐵路北移到新潭門。<sup>29</sup>

<sup>24</sup> 「河口淘」、「大潭門」、「上曲」，皆為假名。

<sup>25</sup> 羅鵬華，《老街講古》（2004），頁 33-41。因為匿名的關係，無法明註作者及出版資料，其後形式同此，不再加註。「羅鵬華」是假名。

<sup>26</sup> 羅鵬華，《大潭門的歷史人類學探討》（2001），頁 46。

<sup>27</sup> 「潭肚」為假名。

<sup>28</sup> 袁美雲，〈潭門地名探索〉，《新竹文獻》15（2004）：41。

<sup>29</sup> 街頭（當年稱老街）和橫街，加上新起造的新街，連接成商業大街。即現在所謂的「潭門老街」。

#### 4.商業機能

潭門交通輻輳的地理位置，使她自拓墾以來就是南北貨物的集散地，因而納入全球商品經濟市場的一環。繁盛的商業機能帶來大量的外來人口與細緻的職業分化，到日治末期時，穩坐商業中心的大潭門街（即今潭門老街）上，農業人口與苦力傭人各佔 33%，商業人口已有 19%，工人則有 11%。不過限於地區性的商業利益，使得大潭門街上的店屋轉手頻繁。<sup>30</sup>鐵路路線重新規畫，火車站撤移，使當年大潭門街的商潮才湧現十年即見衰退，街上的商家也跟著人潮一起出走，只留下遷不走的洋房店面，老潭門也從此回復安靜的農村。

不過，沉寂的老潭門在台灣光復後並非靜止不動：國民政府接收老潭門後方山區の日軍演習場後，裝甲營駐軍於此，大量的外省軍人與軍眷移入；且軍方的調防制度也使得大批的軍人來來去去，老潭門一時之間又熱鬧起來。然而，軍營帶來的商機並不足以繁榮老潭門，社會經濟型態轉變，農村青壯人口仍持續流向都市，只餘老人及孩童留守農村。1975 年，在老潭門西南方的潭門工業區成立，卻因工業區的地理位置、交通等因素，潭門未如預期的繁榮起來，不過至少提供潭門人充裕的就業機會。1980 年新竹科學園區開發，高科技業帶來的就業機會與創造的營收，帶動周邊新竹縣市長足的發展，對潭門也發生重要的影響。2000 年前後，老潭門在社區總體營造政策的支援下，開始有意識地保存及轉化軟硬體資源，將潭門老街打造成文化歷史街區，企圖以文化觀光資源重振商機。以農村為基礎的老潭門，因交通附麗而來的商業機能始終有其侷限，但不曾停止。

#### 5.宗教信仰

民間信仰方面，大潭門開庄後的一百多年仍無村廟，主要信仰是以神明會為運作形式的三官大帝、媽祖、觀音、伯公與有應公，其中以三官大帝最重要。三官大帝為客家人普遍的信仰，大潭門附近村落的村廟也都主祀三官大帝。1904 年，大潭門重要的宗族出面號召，在潭門老街街頭興建三元宮，大潭門終於有了自己的村廟，形成村民重要的

---

<sup>30</sup> 羅鵬華，《大潭門的歷史人類學探討》（2001），頁 60-61。



信仰中心。

至於西教，1893 年張長生受馬偕感召，回家鄉大潭門建教堂，傳佈福音；同時另一傳道士許泉勇也吸收少量教民。<sup>31</sup>當時教堂除了傳教，也提供醫療服務。<sup>32</sup>除基督教外，還有天主教派。1954 年朱神父在老潭門買下博眾布行舊址，改為天主堂傳教，教友超過二百人，1965 年德依慈神父買下老街尾，原是火車站的天主堂現址，二十八年的教務運作，終於在 1993 年因教友人數銳減而關閉。<sup>33</sup>

## 6. 有關潭門的學術研究

對於潭門的理解，羅鵬華的貢獻在於指出老潭門緊密的社經結構，十九世紀時，老潭門粵籍移民聚族而居，並透過祀典儀式，而將家戶結合成宗族。宗族掌控絕大多數的土地與灌溉系統，組織並領導派下所有子孫，而成為村庄下的次單位，同時也是各嘗會和廟會的基本單位。宗族顯然在族群緊張的歷史時空下發揮功能，穩定了老潭門的社會秩序，同時成為老潭門最富有、也最具權勢的團體。宗族與廟會的雙重地域化，使老潭門的社會結構與土地緊密結合，個人不論生與死都必須透過宗族才有依歸，才能成為「有產階級」。<sup>34</sup>然而，羅氏關注在宗族，非宗族的少數人在研究取向上被犧牲掉，未予以多加討論，使老潭門呈現一元圖像，陷入主流論述的思惟，而忽視異質性的意義。此外，羅氏鉅觀的研究取向，以及史料的侷限，使老潭門呈現靜止的狀態。<sup>35</sup>然而，在不同的歷史時空下，老潭門一直有或大或小的商機不斷吸引外來者移入，也因社會變遷，推擠出農村過剩的人口，這絕對是一個與外界不斷互動的動態過程。

一般而言，宗族力量強大的地方社會，往往具有高度的同質性與封閉性，但與外界持續流動的經濟活動與力量，必然某種程度破壞了老潭門穩固的社會結構。再者，社會結構的盤整，除了經濟資源的支持，還有政治力的干預，以現代社會而言，普及的教育也是不能忽視的面向，而全球化所造成的時間感與空間感的壓迫，更使地方社會產生前

<sup>31</sup> 「張長生」、「許泉勇」皆為假名。

<sup>32</sup> 羅鵬華，《老街講古》（2004），頁 50。

<sup>33</sup> 「朱」神父、「德依慈」神父、「博眾」布行皆為假名。見羅鵬華，《老街講古》（2004），頁 88-89。

<sup>34</sup> 羅鵬華，《大潭門的歷史人類學探討》（2001）。

<sup>35</sup> 羅鵬華，《大潭門的歷史人類學探討》（2001），頁 127。

所未有的急速轉變。因此，雖然老潭門的宗族至今仍然壯大，但後來移入的少數人口，卻不必然被排除在老潭門已鬆散的社會結構之外，而能從中取得一席之地。換言之，外省人移入老潭門，不同的語言或日常生活習俗等均使他們成為可被指認的他者，此一異質的存在必然某種程度衝擊該地域的高度同質性，而使得老潭門原有的結構開始推移。

相對於羅鵬華鉅觀的研究取向，本研究將以微觀的視角，細察發生在二十世紀老潭門這個客家村落與來自千里之遙的中國移民的故事。

#### 第四節 研究方法、文獻史料與章節安排

本研究的研究方法，包括江志如的深度訪談，以及相關文獻史料的蒐集；並敘明本研究對研究對象的保護措施。在前兩者的基礎上，本文仿效《金翅》的敘事方法來呈現江志如的生命故事，再根據江志如的生命脈絡，分析她之於外省人、老潭門社會以及同時代女性的異質性，以及她所顯示的意義。另外要說明的是，本研究透過台灣光復後一個外省女性移居客家村落的故事來呈現外省人的本土化，故以研究對象江志如在潭門定居的三十年——1950 至 1980 年代，做為本研究的主要時間斷限。

##### 一、研究方法

###### 1. 深度訪談

對研究對象江志如進行深度訪談，以蒐集她的生命史，從而理解她過去的生活場域、主觀的經驗感受、日常行動與實踐，以及她所處的社會文化脈絡。

深度訪談是取得研究所需材料的方法，必須先從人際關係的建立開始，與受訪者在互信的基礎上才可能進行「深度」的訪談。研究者依據研究旨趣，先訂定訪談內容的大方向，並根據與受訪者訪談的情境與發展而修正。深度訪談與口述訪談、口述歷史的特性與但操作方式類似，而口述歷史的學術要求更為嚴格，因此口述歷史研究法的相關論



述能提供本研究諸多啟思。

首先，江文瑜認為不論是探求異質性的目的，或是讓沒有權力的弱勢者有主張自己的機會，尤其是在父權結構中被迫「無語」的女性，口述歷史是最適合且重要的研究法。<sup>36</sup>游鑑明也認為女性口述歷史因為更關注在女性的觀點，以及女性思考邏輯與表達的特殊之處，方能真正接收到女性的真實「聲音」，此外女性關懷的面向較趨近生活，能得到不同層面的研究素材，可以補足向來以男性為主的正統歷史的闕如。<sup>37</sup>所以，對女性的研究，讓女性口述表達是最佳方法。

其次，深度訪談奠基在研究者與受訪者的密切互動，經由研究者觸發，江志如透過口述言說再現的記憶，已非全然是過去發生的事，而是受訪者「現在」「如何」看待過去發生的事，研究者得以在受訪者的「過去」與「現在」之間來回觀照，分析出她的客家經驗，並挖掘潛藏在其深層意識中複雜的認同，以做出合理的詮釋與批判。然而，分析的依據是受訪者透過「言說」表達的個人生命經驗，江志如已是八十二歲高齡的長者，難免會出現記憶的錯置或遺忘，甚至是欺瞞，研究者該如何正確地使用這些訪談資料？

「言說」是非常複雜且高度抽象的符號象徵，也是人們處理社會關係的重要工具。人們說了「什麼」，並不單純只是「什麼」，重要的是人們「為何」這麼說，以及人們「如何」說，這裡面隱含了權力關係和社會關係等面向。<sup>38</sup>所以，這些糾結的關係，是研究者必須要警覺的，而不能陷入受訪者言說「內容」的泥淖之中。

此外，針對女性的訪談還有另一重挑戰，即女性表達方式的特殊性。男性的敘事多與正統歷史相合，而女性的敘事通常不參照正統歷史。<sup>39</sup>也就是說女性口語言說的脈絡，較少以客觀紀年或與公領域的重要事件做聯結，而多以私領域中的「重要人物」，通常是丈夫或子女為依據，自己退居其中，因此女性時常在表達時「自動」將自己的聲音消音。事實上，這一「自動的行為」正意味著另一種待傾聽的「聲音」。而且，女性的表

<sup>36</sup> 江文瑜，〈口述史法〉，收入胡幼慧主編，《質性研究：理論、方法及本土女性研究實例》（台北：巨流，1996），頁 249-269。

<sup>37</sup> 游鑑明，《傾聽她們的聲音：女性口述歷史的方法與口述史料的運用》（台北：左岸文化，2002）。

<sup>38</sup> 江文瑜，〈口述史法〉，收入胡幼慧主編，《質性研究：理論、方法及本土女性研究實例》（台北：巨流，1996），頁 257。

<sup>39</sup> 趙彥寧，〈戴著草帽到處旅行：試論中國流亡、女性主體、與記憶間的建構關係〉，收入趙彥寧主編，《戴著草帽到處旅行》（台北：巨流，2001），頁 209-210。

達有時時反省自己言說的傾向，而一再修改或評論先前的說法，這些轉折處，也深具探究的意義。有時，女性的表達方式甚至是充滿隱語的，「實情」往往寄託於他者。<sup>40</sup>因此，研究者在進行女性的深度訪談時，必須敏銳地接收受訪者的「另一種聲音」，並抽絲剝繭，找出受訪者真正的意涵，才能趨近研究核心。

口述歷史是受訪者與研究者互動下的共同作品，本研究採用的深度訪談同樣有此特性，所以並不否認研究者在其中必然造成若干影響，且某種程度回饋並觸發受訪者而產生新的感知，並在訪談過程中不斷循環。而研究者在本研究中所參與的角色與位置，正反映本研究的終極關懷，外省人在本土化論述下的心理危機與變遷。

## 2. 文獻史料

由口述訪談而生的文本是主觀的，研究尚須蒐集客觀的文獻史料，一則建構，二則檢核研究對象本身及所處社會環境的真實性，事實上，我們不可能得到「絕對的客觀真實」，只能趨近於「多元的真實」和「建構的真實」。<sup>41</sup>

客觀的文獻史料朝向江志如與潭門，兩個層面來蒐集，以交織出立體的生命故事。

關於江志如個人及其家族的史料，她曾經遺憾地表示許多老文件因為搬家而亡佚，但主動出借一本名為《留給子孫的「財富」》的紀念集，內容主要是她個人的投稿文章，以及少量紀念性的收藏，並附上自序，為江志如自編的文集。然而江氏口中「不見了」的史料，竟在第四次訪談之後奇蹟般地被發現，從戲院整建工人手中搶救下來。這百餘筆的珍貴史料被摺疊收藏在一個已生鏽的餅乾盒中，安靜地躺在光榮戲院的角落裡，長達二十三年。這批史料保存大致完整，經過整理，與紀念集彙整成下頁表 2，包括契約、納租收據、稅單、公文、私人書信等。

---

<sup>40</sup> 江文瑜，〈口述史法〉，收入胡幼慧主編，《質性研究：理論、方法及本土女性研究實例》（台北：巨流，1996），頁 257-259。

<sup>41</sup> 丁興祥、賴誠斌，〈心理傳記學的開展與應用：典範與方法〉，《應用心理研究》12（2001）：87。

表 2 江志如史料明細表

類別	稅單				政府 宣 導 品	納 租 收 據		公 文		契 約			借 還 單 據	私 人 書 信		其 他	鐵 盒	發 表 文 章		
細 目	娛 樂 稅	房 捐	所 得 稅	牌 照 稅		公 家	私 人 地 主	公 文	公 文 封	不 動 產	不 動 產 訂 金	戲 院 開 辦		信	信 封	規 費 車 票 藥 帖	三 花 餅 乾 盒	江 志 如 著	他 人 書 及 江 氏	蒐 集 的 藥 帖
數 量	1	16	2	3	2	8	28	12	14	2	1	1	5	8	7	6	1	24	1	1
小 計	22				2	36		26		4			5	15		6	1	26		
總 計	117 筆																	1 本		

這批史料保存大致完整，經過整理、分析、解讀，能提供充分的佐證與說明，例如娛樂稅單雖然只有一張，但意義重大，足見戲院在當時的特殊性質，以及戲院營收的推估。房捐及納租收據則顯示戲院建物從營業到自住的轉變過程，並由遲納的時間窺知家庭經濟的窘迫與變化，然而三張乙種腳踏車牌照稅單和不動產契約，卻又透露經濟困境下的另一面貌或價值取向。戲院契約更提供豐富的資料，戲院與軍方的關係在此無所遁形，戲院與社區的關係也耐人尋味。私人書信中，一封江志如母親署名的家書，道盡大時代變局下小人物的無力，卻不知一別成永訣。六封寄自香港的催債信，語氣一封比一封無情，其中有一封書信更有明顯的揉捏痕跡，這對江志如家來說有什麼意義呢？家庭

經濟是雪上加霜，朋友情感決裂也是重擊。絕境中，十多筆公文往返的交涉紀錄透露出他們積極尋找生路，捍衛權益，也顯示他們具有不畏與官方打交道的知識與書寫能力。

雖然本研究主要的關懷是江志如在台灣客家村落的經驗，但人的意識、價值與行為都是有連續性的，其早年重要的生命經驗必然潛入深層意識中，而提供其往後行動的根源與基礎，所以，蒐集其完整的生命史與史料仍有其必要性，不過在材料處理上將因研究取向而有輕重之別。

在與潭門有關的文獻史料部分，歷史文獻和一般性文獻，如《潭門鄉志》、《新竹文獻會通訊》、《新竹文獻》、剪報資料等，都能提供研究者對潭門有基本而概括性的理解；而學術性文獻，如羅鵬華的研究，則更進一步開啓與深化研究者對潭門的切入層面，但目前除羅氏的研究之外，質量都有限。

### 3.保護措施

由於本研究涉及研究對象江志如非常隱諱的生命經驗，應當事人嚴正的要求，也為保護她及其家人，本論文採取的保護措施如下：一、進行全面匿名，相關的人名、地名等均以假名處理，但研究者自存一份真假名稱的對照表，可供未來其他研究之參考。此外，部分引用著作有高度相關性，亦須匿名，故無法明註作者及出版資料，僅註明年份及頁數，例如「羅鵬華，《大潭門的歷史人類學探討》（2001），頁 60-61。」並在第一次出現時註記說明，其後不再加註。二、訪談內容的引文，均以標楷體呈現，並註記訪談日期，例如「引自江志如的訪談稿，2007.10.21。」但不將訪談稿全文置於附錄中。三、百餘筆史料相片僅供研究者進行研究與建構之用，並酌置數張經過匿名加工的史料相片於附錄中。

## 二、章節安排

本論文分成七章。

在第一章「導論」中，說明本研究的動機和問題意識。文獻回顧以外省人研究為主，做為本研究開展與對照的基礎，以顯示外省人異質性的真實性；並探討歷史與記憶的理



論，說明蒐集江志如生命所採用的深度訪談在研究方法上的合法性與重要性；還有討論女性主體性的相關研究，做為分析江志如生命經驗的重要依據。接著簡介本研究的主要對象——江志如與潭門。最後說明本研究的研究方法和章節安排。

第二章「一個外省女性在客家村」，參考《金翅》的敘事手法，呈現研究對象江志如的生命故事，依其生命的重要進程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節「劇變的中國·走調的青春」，敘述江志如早年在大陸的生活經驗及社會位階，這個社會座標將對她的台灣經驗造成若干影響；第二節「改治的潭門·苦難的歲月」，以江志如在老潭門經營戲院為主軸，旁及其家庭教育與鄰里關係等面向，家庭內外的經驗驅使她本土化；第三節「飛躍的經濟·落地的家族」，展現跟上工業化社會腳步的江志如在角色上的轉變，以及社會網絡的向外延伸，促成她實現自我，並紮根台灣。

第三章至第五章為分析，分別從外省人、老潭門，以及江志如本身來解析本研究的意義。第三章「『竹籬笆』內外的移民適應差異」，從移民適應的概念入手，以此來理解集居外省人和散居外省人，因為不同的生命經驗、不同的適應對策，以至於有迥異的適應結果。第四章「老潭門的開放性與變遷」，先從老潭門的歷史脈絡分析出老潭門社會的開放性，以及對移民適應所提供的助力和阻力，外來移民、老潭門社會和老潭門以外更大的社會系統，經過不斷的互動而共創出老潭門社會的新面貌與新生態。第五章「她的主體性與角色轉變」則以江志如的位置出發，理解她在社會變遷以及移民的結構困境下，所產生的主體性和能動性，並從中看見女性重新定位自己。

第六章為「結論」。外省人以移民的角色進入台灣，展開移民遷移與適應的生命經驗，社區接納外省人，外省人也以不同程度的土著化與社區結合，進而產生不同程度的認同傾向。個別行動者與社區的互動，使彼此都產生不斷變遷的形貌，最終都成為歷史文化中的一部分。而女性雖然被性別框架侷限，但移民的游移特性卻能突破結構限制，江志如因此重新定義個人生命意義，並反映女性角色在時代變遷中的改變。

第七章為「餘論」，是主文結構之外的省思。除以後設立場觀察江志如的口述言說；也嘗試以研究者本身為例，探究外省人在本土化論述下的內在心理焦慮。

## 第二章 一個外省女性在客家村

### 第一節 劇變的中國·走調的青春

#### 國·動盪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是中國人永遠都不能忘懷的一段歷史。西方列強相繼叩關，中國百姓飽經戰禍的蹂躪，自大卻無能的清廷受盡屈辱，氣數已盡。1911年十月，革命黨人終於以武昌起義之役，推翻滿清，史稱「辛亥革命」，中國施行數千年的帝制劃上句點，步上民主共和的國家體制。

然而，革命成功的意義不過是個象徵，並非一把刀將過去徹底斬斷，毫無瓜葛；事實上，接續清廷法統的「中華民國」必須概括承受，包括內憂及外患。清季，腐敗無知的朝廷無能抵抗來勢洶洶的歐美日等列強，幾乎是每戰必敗，被迫簽下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割土開關，遺害又深又遠。中華民國在列強環伺侵逼、攫奪私利下飄搖繼立，但內部並不統一，全國各地軍閥擁兵自重，互相侵軋，烽火不斷；中國共產黨在蘇聯莫斯科政權的扶植下快速崛起，組織鄉村農民反地主，鼓動城市工人反資本主義，催生罷工行動；國民黨與共產黨之間分合無常，國共內戰長達二十二年；戰爭使得國家財政捉襟見肘，幾乎瀕臨破產，只能靠強徵苛稅和舉債度日，造成日後嚴重的通貨膨脹。革命後建立的現代中國，面臨中國史上變動最劇烈的三、四十年，不論是政治、外交、經濟或文化等，都使中國及她的子民處在極端拉扯而苦痛的日子，對未來充滿惶惑。

列強對中國持續的侵逼，使中國人對帝國主義普遍反感，尤其是日本。民國三年（1914）八月，第一次世界大戰在歐洲戰場爆發，日本趁西方列強將重心移回本國時，加緊侵華。隔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條無理要求開始，日本對中國的侵略行動益發熾烈，政府卻採取親日的姑息立場，引發中國人民強烈地反日情緒與浪潮，包括抵制日貨及示威抗議等運動。同時，共產黨有計畫地吸收黨員，滲入農村，挑起農民反地主的情緒；鼓動城市工人組織工會，進行罷工，尤其是對中國人最為苛刻的日本紗廠：



外國人根據不平等條約，得在中國設置工廠從事製造，遂行對中國的經濟侵略。其中以日本人在中國設立的工廠最多，僅上海一地，即有二十二家紗廠，佔上海紗廠總數的三分之二。日本廠主對中國工人的待遇，較任何外廠為苛，每人每日工作時間規定為十二至十三小時，所得工資僅一角五分，最低者為一角二分，尚不及其他國家工廠工資之三分之一。所以有些工人，一有機會便轉入他廠。日本廠主為防止工人轉廠，特規定一種儲金辦法，將工人工資每月扣百分之五存儲於廠中，必至工作滿十年後發還，中途輟工離去者，此項儲金即被沒收。工人工作期間，又經常遭受毒打或開除之無人道待遇。<sup>42</sup>

民國十四年對上海而言，是慘痛的記憶。二月十六日，日資的內外紗廠發生一名童工被管理員以鐵錘擊斃，全體工人憤而罷工。五月時，日本各紗廠以男工不馴為由，全數革退，引發男工聯合罷工；五月十五日，工人代表與廠方交涉時被開槍射殺，造成傷亡，支持工人的上海學生遂於五月卅日遊行示威，要求釋放被英國人逮捕的中國學生。以工人、學生為主的示威群眾高喊口號，激昂的愛國情緒在他們之間化開來，感染愈來愈多的聲援者。但慘劇發生在一瞬間，英國巡官下令向群眾開槍，十一人罹難，二十多人重傷，是為「五卅慘案」。這場屠殺之後，上海發動總罷工，包括武漢、長沙、廣東等二十八個城市響應示威，攻擊英人及日人的事件層出不窮，外國人加強軍力保護僑民，因而有六月十一日「漢口慘案」、十三日「九江事件」、二十三日最為慘烈的廣州「沙基慘案」，在共產黨和勞工領袖的領導下，香港也發動持續十六個月的大罷工，抗議英國人在上海屠殺中國人，並演變成全面抵制英貨的局面。<sup>43</sup>

棉布產業是當時中國發展成熟的產業之一，列強為在中國攫奪最大的利益，不但積極投資設置紗廠，並苛刻中國工人，而反對資本主義的共產黨為迅速培植勢力，即以策動紗廠工人做為勢力擴張的路線。也就是說，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在中國的棉布產業裡決戰，這場戰鬥並沒有因為民國十四年裡一場場激烈的示威和血腥的鎮壓而畫下句點，它們的纏鬥一直延續到同一年出生的女娃兒長大成為棉布莊的少奶奶，而共產黨獲得最

<sup>42</sup> 李雲漢，《中國近代史》（台北：三民，1985），頁 238。

<sup>43</sup> 李雲漢，《中國近代史》（台北：三民，1985），頁 238-240。史景遷，《追尋現代中國（中）》（台北：時報文化，2001），頁 444-445。

終勝利的結果，使得當年的女娃兒後來被迫逃離她生長的大陸。而這一切外邊發生的風風雨雨，剛出生的女娃兒又怎麼會知道她的未來竟然與上海、與棉布，甚至與共產黨都脫不了干係呢？

## 家·羽翼

民國十四年，全國各地持續處在罷工、示威、鎮壓的緊張、殺伐氣氛之中，但對浙江的一間米店而言，卻充滿新生的喜悅。這一年春天，富裕的江家米店誕生了一個女娃兒，取名為志如，小名叫如官；她的兄弟和妹妹們也都是以名字的尾字再加上「官」字為小名，這是家中的習慣。志如是她父母的第二個孩子，她出生時，家裡已有一個兩歲的男孩兒，而在她之後的五年，父母才再生一個弟弟，之後，又有兩個分別小她七歲和十歲的大妹及小妹；也就是說，她父母一共生了五個孩子，二男三女。這五個孩子都從母姓，因為他們的父親是入贅的。

這家米店的老店東是當地商會的會長，既有錢又有地位。老店東夫婦只育有一兒二女，唯一的兒子在十來歲時就去世了，大女兒又已出嫁，在沒有繼承人的情況之下，老店東決定為小女兒招一個夫婿進來。他們出了一個告示，尋找合適的人選。一位前清武官，類似現在所謂的警察局局長，看到商會會長家的招贅告示，便讓其中一個兒子入贅江家，成為老店東小女兒的夫婿，也就是志如的父親。

事實上，這位武官之所以願意讓兒子入贅是有原因的。武官會算命、鑽研易經，並以此為家人算命。武官有七個太太，其中一位太太生下了「四平八字」命格的兒子。<sup>44</sup>這個兒子被武官認定不會有出息，生母又不幸早逝，便交由孀娘養大。雖然武官不重視這個可能沒出息的兒子，但他企圖為兒子扭轉命運，因為「四平八字」的命格是遇貴則貴，遇賤則賤，入贅富貴之家或許是最好的出路，只是武官沒有想到富裕的江家十餘年後竟然破產躲債。

---

<sup>44</sup> 所謂「四平八字」，是依江志如所使用之用語習慣，意謂著有此命格者未來是沒有出息的。目前為止，我翻查相關算命書籍，尙未能查到相關界說，待日後繼續查考。

志如的父親並不是一個不學無術之人，他是個中學教員，在上海教書，放假才能回家，薪水只有七塊大洋；那時一塊大洋只能換三百零幾個銅板。志如的母親常跟兒女們說他們的父親錢賺得很少但很有地位。江家很有錢，家裡請了傭人，還有奶媽照顧孩子。志如的母親是個千金大小姐，家事都不必做也不會做，連燒個豆腐都不會。當老店東夫婦過世後，志如的母親繼承了家業，依舊過著優渥的生活。

在家庭豐滿的羽翼下，年幼的志如受到很好的照顧和保護，她一點也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風雨狂嘯。

民國十五年七月，國民政府決定北伐，掃蕩中國內部嚴重的軍閥割據，力求國家的統一。國民黨與共產黨採取合作的態勢，共同發動軍事行動，蔣介石領導以黃埔軍校兵力為主的國民革命軍，展開兩階段的北伐，兩年告成；東北張學良不畏日本阻撓，亦宣示服從中央統一全國。民國十七年年底，除台灣尚在日本統治之下，中國終於統一。然而，北伐的成功，背後卻隱藏著共產黨趁機分化國民黨的行動。民國十六年四月至八月，南京與武漢各有一個國民政府和中央黨部，史稱「寧漢分裂」。武漢汪兆銘領導的政權左傾，受俄共及中共的左右，直到八月一日共產黨發動南昌暴動，以武裝叛亂正式與武漢政府分道揚鑣，汪兆銘方於八月八日清黨驅共。<sup>45</sup>

## 巢·傾覆

好景不常，志如的母親有胃病，看醫生都沒有起色，她乾弟的父親便介紹她吃一種很有效的藥——鴉片。

鴉片是弱化中國的元兇之一，滿清政府曾經強力禁絕；民國初年，袁世凱在任總統期間亦持續取締鴉片，迫使許多鴉片公司撤至租界區，成效良好。民國六年，滿清遜帝溥儀在軍閥張勳的支持下復辟，雖迅速被其他軍閥圍剿收平，然而軍閥因此佔據了政治舞台，而部分軍閥為籌財源，在佔領地種植及販賣鴉片，使得鴉片再度死灰復燃，荼毒

---

<sup>45</sup> 李雲漢，《中國近代史》（台北：三民，1985），頁 258-266。

中國人民的身心健康，摧毀許多家庭。<sup>46</sup>

因為鴉片一吃就不痛，志如的母親也就漸漸吃下去，終於成癮。家裡開銷本來就大，加上吸鴉片，丈夫賺得又不多，志如的母親只好耗用自己的積蓄。當志如八、九歲的時候，母親告訴她家裡沒有錢了，她為此焦急卻又無能為力：

我年紀小小的就很擔心，可能我比較會想吧！我就想家裡該怎麼辦，可是我又不能幫什麼忙，所以啊，我現在不會告訴小孩他們幫不了的事情。他們幫不上忙，只會讓他們擔心，不好。<sup>47</sup>

這件事在當時年紀尚小的志如心裡，留下震撼而難以磨滅的印象，影響她日後教育下一代的想法。

不幸的是，有次志如的父親放假，從上海回到家來，他的妻子告訴他這個藥的好處，一吃就有精神，志如的父親竟然也跟著吃起來。志如的父親有了鴉片癮，早上起不來，沒辦法教書，書也就不教了。除了父母，志如的哥哥，也就是江家的長子，也吸上了。一家有三口人吸毒，花費很大，又沒有收入，存款用完了，只好把米店賣了；當賣米店的錢也用光了，就向朋友舉債，債還不了，終究走上破產的地步。民國二十七年，志如小學剛畢業，蘆溝橋事變就爆發了，中日戰爭開打，處處烽火，破產的江家在志如父親的帶領之下，在混亂中舉家搬遷上海。離開浙江的時候，志如的母親還不忘帶走家裡的傭人：

破產了就全家搬到上海，連傭人都帶走，我母親啊什麼都不會，沒有傭人不行，家裡一直有傭人燒飯洗衣。<sup>48</sup>

志如的母親自小就是千金大小姐，日常生活的料理是少不了傭人的，所以即使在破產避債期間，江家仍是有傭人服侍。志如也一直過著有傭人服侍的大小姐和婚後少奶奶的生活，直到她隨丈夫漂洋過海到台灣為止。

<sup>46</sup> 史景遷，《追尋現代中國（中）》（台北：時報文化，2001），頁 369-373。

<sup>47</sup> 引自江志如的訪談稿，2007.10.21。

<sup>48</sup> 引自江志如的訪談稿，2007.10.21。



## 善·珍寶

志如的童年生活算是很美好的，家庭經濟無虞，生活有傭人侍候。她喜歡讀書，功課很好，而且家裡也供得起她讀書，她一直讀到高一，家裡終於負擔不起才輟學；她的弟弟和妹妹們就沒那麼幸運了，只有讀完小學；不過兩個妹妹後來還是有完成高中學業，但江家的兩個男孩都不愛讀書。志如的父親雖然很少在家，但志如很敬仰父親的學問：

我父親四平八字，賺不了錢，但是個文人，那時候文人的國學底子都很好。我

父親很會打詩謎，不管做莊或猜謎，都是他贏，還能贏一點錢回來。<sup>49</sup>

她心底期望自己也能如父親一樣滿肚子學問。而且，志如的父親還常告誡孩子們要對人好；志如的母親也告訴孩子們外公行善的逸事：

我聽我母親說，我外公在冬天的時候穿著有長袖子的長袍，袖子裡放著錢，他

到街上看到需要幫助的人就把錢給他。<sup>50</sup>

金錢不是最重要的，與人為善才是真正的財富。志如的父親是個讀過書的文人，也是老師，他傳授了深刻的價值觀給孩子；志如的母親生在一個商人家庭，在其父的身教之下，也能有回饋社會的理念。父母的教育觀、價值觀對孩子的影響是深遠的，志如自認一輩子受益無窮：

從小父母告訴我：「一錢不落虛空錢；與人方便即與己方便；人抬橋子橋抬人

（按：「橋」應為「轎」）；吃虧就是佔便宜。」等等這些在他人身上「播種」

的道理，還說：「獨木不成舟，一個人要在社會上立足，須得仰賴許許多多人的

扶持，所以我們能力所及時，也要多為別人付出才好。」以上這些金科玉律

的話，深深地在我心裡紮下了根，並盡可能的照著去做，倒也不覺得有絲毫吃

虧。<sup>51</sup>

祖父助人行善的奉獻情操在志如心裡已埋下種籽。

母親吸食鴉片，敗盡祖產；父親吸食大煙，自毀前途。一個原本安穩的家庭因而迅

<sup>49</sup> 引自江志如的訪談稿，2007.10.21。

<sup>50</sup> 引自江志如的訪談稿，2007.10.21。

<sup>51</sup> 引自江志如的投稿文章〈播種〉，刊于《中華日報》。

速淪落在街頭，淹沒在各地蜂起的亂象之中，受著未曾嚐過的苦難。那一年，十三歲，志如跟著母親到縣城的基督教教堂，參加趙亮宇牧師證道的培靈佈道大會。<sup>52</sup>三天的佈道會上，志如親眼見到許多受鴉片癮所苦的病患，靠著牧師禱告的力量而痊癒，包括志如的母親在內。志如的母親跟著其他病患排隊領到一瓶代用品，晚上將要就寢時，牧師娘進了她們母女倆的房間。牧師娘告訴志如的母親：「牧師已經為你禱告了，妳要相信神的力量。」並取走床頭的那瓶代用品。當晚，志如的母親睡得很沉穩，她吸鴉片以來不曾這樣安眠。志如伸出手探探母親的呼吸，她非常擔心母親是否死了。母親僅僅靠著禱告就戒除了萬惡的鴉片，使得志如對基督教抱持著奇異的好感。緊接著，七七事變爆發，全國迅速陷入戰亂之中，志如隨著父母流離到上海，「去教會」這件事也漸漸退隱到她內心的一個角落裡，也隨著她轉徙他鄉，等待。<sup>53</sup>

幼時家庭的為善之教，是志如的財富；而基督的恩典，則是她一生受用無窮的珍寶。

## 嫁·買賣

全家避債到上海後，志如繼續升學，中學學校轉角有家文具行，十六、七歲的志如認識了店裡的「小伙子」（按：指帥哥），後來這個小伙子成了文具行的老板，曾是大小姐的志如卻進了舞廳陪舞：

我十九歲的時候，為了家計去舞廳當舞女，那時候也不知道當舞女不正當，只想說陪人家跳舞還可以賺些錢，後來才知道當舞女不好。<sup>54</sup>

一九二〇、三〇年代，上海憑國際港口的優勢，以及新工業急速興起，匯集了各式各樣的階級與人群：租界裡，有受治外法權保障的外國人，以及他們在華的投資事業與家園；有官式頭銜的軍閥為上海的中國人區域及近二百萬人口的控制權而爭鬥；有官商關係良好的中國資本家呼風喚雨，大賺其金；有從農村湧進港口碼頭、工廠、鐵路運輸業等新行業，求一碗飯吃的工人；有組織性的犯罪集團，比如青幫是當時最龐大的黑幫組織，他們與軍閥、地方財團的關係隱晦而複雜；還有因應娛樂、應酬需求而生的女性角色，

<sup>52</sup> 「趙亮宇」是假名。

<sup>53</sup> 根據江志如的投稿文章〈靠主渡過難關〉，刊于教會的月刊。

<sup>54</sup> 引自江志如的訪談稿，2007.10.21。

比如妓女、舞女、交際花、傳統名伶、電影明星等。以地主、資本家爲主要支持力量的國民黨，和組織吸納工人的共產黨，自然都不會放棄這座具有指標性的大城市，上海成爲他們政治角力的戰場之一。思想前衛的作家學人在此居停，低俗的色情行業也蓬勃而生。鴉片被大量販售與吸食，流氓趁機脅逼劫掠。上海充滿機會，也滿佈危險，時髦與傳統並存，進步卻也落後。頂著中學學歷的志如，後來才明白舞廳是個龍蛇雜處的是非之地，所幸她離開得早；只是離開，也是另一場「買賣」。

民國三十三年，十九歲的志如，一百五十公分，長得很標緻，很快就被大老闆相中，熱切地追求她，想金屋藏嬌，包養她做小老婆，但志如不肯，她對自己的婚姻要求至少得是正室，絕不做小。第二年，二十歲的志如在舞廳認識了相伴一生的丈夫——菸草富商王先生。王先生喜歡跳舞，出手闊綽，那時上海舞廳的消費方式是：

一百元買一本票子，和舞小姐跳一支舞就給一張票。小姐會陪跳舞，也有坐檯，坐檯就是在位子上陪客人喝杯茶，坐檯的舞票有兩種，分爲三百元和五百元，小姐陪坐多久都可以。<sup>55</sup>

一般人都是買三百元的坐檯票，王先生卻每次都買五百元的坐檯票，而且必定叫志如的檯。很少有人像他那麼大手筆、那麼闊的，這令志如印象十分深刻。

有一回，王先生帶著朋友又來跳舞，仍像往常一般叫志如的檯。巧合的是，王先生的朋友竟然是當年那家文具店的老板「小伙子」，他一看到志如，竟是舊識，便大叫：「她可是個中學生呢！」文具行老板不經心的一句話改變了王先生與志如原本維持的敷衍關係。民國二十四年八月，政府才開始試辦小學義務教育，期望能提高國人知識水準。那個時候中國人受教育的情況還不普及，即使有受教育，也多是國民學校畢業，能讀到高中已不容易。在那重男輕女的年代，能有高中學歷的女性更是少有。高學歷的志如書讀得比較多、字寫得比較好，或許是吸引王先生的原因之一，但絕不會是主要原因。

王先生聽說志如有中學的學歷後，心裡下了一個決定：娶志如。但是，王先生已婚，元配比志如大四歲，兩人沒有生育小孩。三十三歲的王先生家庭與事業都在家鄉安徽，他與朋友合資經營香菸工廠，雖然只有國民學校的學歷，但生意做得十分成功。與志如

---

<sup>55</sup> 引自江志如的訪談稿，2007.10.21。

相識時，王先生已婚無子嗣，學歷不高又罹患一種手抖的病，字總是寫不好，而元配又沒有讀過書，所以他相信志如可以幫助他的事業：

他認識我以後，心裡想他就是要娶我這樣的太太，不是因為我長得漂亮，是因為我書讀得比他高，字寫得比他好一點；他太太沒讀過書，也不認得字，又不會生。不會生，王家就絕後啦！所以他想他就是要娶我。<sup>56</sup>

其實，元配無法生育的事實才是真正強化王先生另娶的念頭。中國人非常重視傳家的香火，所謂「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所以「絕後」是非常嚴重的事情。遇到這種棘手的狀況，只要經濟能力尚佳的家庭，為了生出兒子，通常都會納小妾。當時中國雖已走進現代化的共和國，但中國廣大的百姓泰半仍處於傳統保守的舊社會風俗之中，納妾、重婚屢見不鮮，即使是當時最能左右中國的兩位強人也一樣，比如蔣介石在與元配仍有婚姻關係的情況之下，在上海納側室，更在民國十六年與宋美齡舉行婚禮。<sup>57</sup>又如毛澤東離開他曾經熱烈追求的妻子楊開慧與兩個孩子，公開和第二任妻子賀子珍同居。

58

總之，年輕貌美、學歷高、帶得出場，還可能生育子嗣的志如擄獲了王先生的心，讓王先生很快地做出人生中的重要抉擇。

王先生知道志如家境破敗的經濟情況，為了討志如歡心，便提出支付一筆聘金，並答應婚後仍照顧志如的娘家，每個月另給生活費，志如被王先生優厚的求婚條件打動：

我想，到哪去找這樣的男人呢？還會給我錢！我不愛他，這是買賣婚姻，我想我這是為家裡犧牲。妳想，我到哪去找這樣的男人，是不是？<sup>59</sup>

然而，志如對婚姻的堅持沒有改變，王先生必須與元配離婚。不像前位富商只想包養小妾，王先生很有誠意迎娶志如，不過事情並沒有那麼順利。王先生的元配擔心離婚後生活無以為繼，狂亂地剪去秀髮，以死要脅，志如也不忍心逼人太甚：

我先生說再逼她，她只有死路一條。我想，大家都是女人，她比我還可憐，我

<sup>56</sup> 引自江志如的訪談稿，2007.10.14。

<sup>57</sup> 陶涵（Jay Taylor）著，林添貴譯，《台灣現代化的推手：蔣經國傳》（台北：時報，2000），頁8。史景遷，《追尋現代中國（中）》（台北：時報文化，2001），頁474。

<sup>58</sup> 史景遷，《追尋現代中國（中）》（台北：時報文化，2001），頁493。

<sup>59</sup> 引自江志如的訪談稿，2007.10.14。



至少還有親生的父親母親。<sup>60</sup>

志如既然對元配的處境心軟，王先生便決定放棄家鄉的一切，與志如遠走高飛，到上海重頭開始：

我先生就把安徽的工廠結束掉，是製香煙的工廠，幾個朋友合資的。他把工廠結束掉，不再回安徽，到上海重頭來，開布莊，不是零賣，是批發的。他太太還是住在安徽的家裡，他每個月給她生活費。<sup>61</sup>

當時二十五歲的元配畢竟還年輕，獨自在安徽住了一段時間就離家出走了，王先生便登報警告逃妻，與她脫離關係；這份警告聲明後來在共產黨欲追鬥王先生時，救了元配一命。之後，志如他們聽說：元配改嫁後，因為不能生育，再度遭到離棄的宿命。

## 富·折磨

民國三十五年，上海的經濟開始動盪，物價逐漸高升，重起爐灶的王先生就在這不利的時機下，做起最熱門的棉布生意，志如也在此時搬進兩層樓的大房子裡，過著比在浙江當大小姐時更奢華的生活，服侍的傭人更多。年僅二十一歲的她還擁有兩件名貴的皮大衣：

我記得我在上海的時候有兩件皮大衣，一件皮大衣要二兩多黃金才買得到。一件是黃狼的、一件是白面的，做生意有錢的時候是過少奶奶的日子。<sup>62</sup>

王先生在上海的新事業是做批發棉布的生意，布莊就設在住家樓下；樓上是住家，樓下是號子。生意開始之初，賺了很多錢，號子裡光是練習生就有好幾個，練習生就是現在所謂的學徒；還有一個大師傅專門燒飯，供應號子裡的眾多的工作人員和樓上家裡人食用；另有專門管理家裡的女傭人們，當然還有奶餵志如女兒的奶媽——志如一結婚就順利為王先生生下一個女兒——當時人們相信餵母乳，女人容易衰老。上海是個時髦的城市，各式餐廳林立，愛熱鬧的王先生喜歡與一票生意上的朋友四處嚐鮮，所以當了少奶

<sup>60</sup> 引自江志如的訪談稿，2007.10.14。

<sup>61</sup> 引自江志如的訪談稿，2007.10.14。

<sup>62</sup> 引自江志如的訪談稿，2008.01.16

奶的志如，幾乎每天晚上都不在家裡用膳，而必須陪王先生應酬。不過志如並不喜歡這樣的生活型態：

我先生都和一大票朋友到處吃喝玩樂，聽說哪裡有好吃的、新開的餐廳就去哪裡吃。他們是輪流付帳，一個晚上就花掉家裡半個月的飯錢，一個星期差不多要輪到兩次作東，花費很大。我不喜歡跟去，我會想為什麼要這樣亂花，很多人都沒飯吃了。<sup>63</sup>

中華民國自建國以來，一直處在兵禍之中。先是軍閥割據、交戰，國家統一遙遙無期，直到民國十七年蔣介石方完成北伐的軍事行動；統一中國是國民黨與共產黨的共識，然而兩黨的政治思惟南轅北轍，纏鬥不斷，後來也是兵戎相向，國共內戰自民國十六年開始，長達二十二年；民國二十六年，蘆溝橋事變爆發，中國又展開八年慘烈的抗日戰爭。

從清末以來，中國整片土地和生活其上的人民，數十年來不斷受到戰爭的摧殘與威脅，長期戰爭使得政府預算赤字嚴重，政府靠著舉債、提高賦稅、濫印鈔票以延緩破產的時間，終究引發通貨膨脹，商人囤積居奇的投機行為使通貨膨脹的速度與程度惡化得更快更大：

上海躉售物價由一九四五年九月至一九四六年二月，增加五倍，一年之後又漲了三十倍。政府採行各種措施，包括把工資盯住生活費用運動、凍結物價與工資，工業物資及消費物品實施配給等等，但是統統不能奏效。一包米在一九四八年六月售價法幣六百七十萬元，八月份已漲到六千三百萬元。<sup>64</sup>

雖然戰爭可能使人們驟然失去家園，但對絕大多數的人民而言，感受最深的其實是因戰爭而起的通貨膨脹，財產急速縮水、消失，買不起，甚至也買不到生活的必須品。具有悲天憫人情懷的志如，經歷過破產的苦日子，深知一般百姓的痛。

民國三十六年，對志如夫婦來說，是很重要的一年。志如生了第一個孩子，是個女兒；志如產下長女時，王先生卻沒有陪伴在身旁，因為他正在台灣開拓他的棉布生意網

<sup>63</sup> 引自江志如的訪談稿，2007.10.14。

<sup>64</sup> 陶涵（Jay Taylor）著，林添貴譯，《台灣現代化的推手：蔣經國傳》（台北：時報，2000），頁 166。

絡。當時台灣發生了流血衝突的二二八事件，消息傳回上海，志如的父親為外孫女命名時，便取了一個有紀念性的名字——紀念她父親在台灣經歷二二八事件。

王先生的棉布批發事業，在台灣光復以後，就把生意的觸角伸展到台灣去，先是將上好的棉布運到台灣賣，後來因為上海愈來愈嚴重的通貨膨脹而逐漸轉移重心：

台灣光復以後，我們上海的棉布很多都裝箱寄到台灣，聽說台灣很有錢，一匹布能買一兩黃金。我們在台灣有莊口，布大部分都寄過去，上海已經沒有什麼了，錢已經愈來愈少啦！（按：意指不值錢）<sup>65</sup>

台灣光復後，布匹買賣是台灣交易中的大宗貨物；當時台灣紡織業還在萌芽階段，尚不成氣候，布匹主要仰賴進口，以日本、上海等地為主。三十七年，蔣經國在上海打老虎，企圖控制嚴重的通貨膨脹，上海的商業投機因而受挫，有些資本便轉到台灣。那時進出香港、上海、台灣等地做生意都很自由，只要買張船票，所以許多上海布商便將大陸的布匹運到台灣，再經由台灣當地商行轉賣，買賣布匹是很賺錢的行業。<sup>66</sup>

不過，台灣的經濟也受大陸通貨膨脹的拖累，三十七年一月十三日以後，台幣與法幣採取機動兌換比率，但仍止不住法幣的一路下跌；三十八年三月十五日終於以舊台幣四萬比新台幣一元的比率發行新台幣。<sup>67</sup>

生意剛移到台灣，王先生就在台灣置產，買下一幢位於台北市明石町的日式房子，屋坪雖小但地段極佳，就在中華基督教青年會（YMCA）對面。台灣的生意網絡打點好後，王先生便派他二弟夫婦到台灣顧莊口，那幢房子就是他們在台灣的家身之所。

明石町係日治時期台北城內的一個行政區，在舊城內東北隅，今中山南路、青島西路、公園路、襄陽路、信陽街、許昌街之一部分及南陽街、常德街均在町內，為紀念明石元二郎而命名，轄域內有台北醫院（今台大醫院）。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日式町名被廢，改採現在通行的街道名稱，至三十七年二月始完成更名工程，王先生在台灣的第一筆不動產，也更正為許昌街○○號。<sup>68</sup>

<sup>65</sup> 引自江志如的訪談稿，2008.01.15。

<sup>66</sup> 黃進興，《半世紀的奮鬥—吳火獅先生口述傳記》（台北：允晨，1990），頁123-131。

<sup>67</sup> 黃進興，《半世紀的奮鬥—吳火獅先生口述傳記》（台北：允晨，1990），頁121。

<sup>68</sup> 湯熙勇主編，《臺北市地名與路街沿革史》（臺北市：臺北市文獻委員會，2002），頁31。

一開始，王先生的確按月支付志如娘家的生活費，讓當了少奶奶的志如不必再為娘家的生活憂慮，然而，這樣安穩的日子沒有維持很久，王先生不再信守先前的承諾，娘家的經濟再度陷入危機。志如只好積極思考娘家的安置。正巧女兒的奶媽求去，志如的母親那時也已戒除鴉片癮，志如便與丈夫商量請娘家母親來幫忙照顧女兒。得到丈夫首肯後，志如便把娘家的租屋退掉，母親、弟弟和兩個妹妹接來同住，父親則借住朋友家；至於哥哥，已另立小家庭，五年後，才二十多歲就死了。

關於娘家的照顧，除了減少租屋開支，志如也積極地安排弟弟在號子裡當練習生，一方面是不好白吃白住，另一考量是弟弟已十七、八歲，只有小學畢業，又不愛讀書，那時時局十分紊亂，根本找不到工作，在號子裡至少能有份正當的差事。不過，志如的弟弟志不在此。他在號子裡時常打混，只要一有空，他便偷溜回樓上住家，與母親一起聽蘇州彈詞。日後他的確在彈詞領域開創了一片，不過，當時他偷溜的行徑讓他的姐夫老板非常不高興。王先生本來脾氣就暴躁，很愛發脾氣罵人，當時上海的物價漲個不停，生意大受影響，妻舅工作打混，讓他有了理由牽怒志如，以發洩壓力：

那時上海東西一直漲，漲得好快，外面漲價了，我先生回來就罵我，他脾氣不好，東西漲，回來就罵我，說我娘家五個人，就我啊、我母親、兩個妹妹、一個弟弟，不是五個人嗎？他大概是嫌我娘家，有點瞧不起的意思。<sup>69</sup>

我先生脾氣很暴躁，很愛發脾氣罵人，外面物價一直漲，他就罵我，罵我江家沒出息，連我弟弟都沒出息。<sup>70</sup>

三十七年八月十八日，國民政府頒布新的幣制改革，要求人民交出所有的黃金、白銀、外幣及舊鈔「法幣」，三百萬法幣只能換取新鈔「金圓券」一元，許多中產階級選擇相信政府，守法地兌換金圓券，結果卻是財產盡失。為期六週的金圓改革非但沒解決問題，反而製造了新的經濟危機。八月二十日蔣經國奉命以督導員副手的身份，到上海管制經濟，包括調派軍隊進駐上海各治安機關坐鎮；獎勵密報；突擊檢查市場、倉庫、工廠，只要查證有囤積居奇的不法行為，奸商就會受到罰款、坐牢的懲戒；整肅貪官汙

<sup>69</sup> 引自江志如的訪談稿，2007.10.14。

<sup>70</sup> 引自江志如的訪談稿，2007.10.21。



吏，甚至重判死刑。蔣經國更勇打「老虎」——南京老虎孔令侃、經濟老虎杜月笙、米糧老虎萬墨林等富可敵國的大商人及各商會會長，勒令他們轉令會員依政府規定的物價供貨，以及交出外幣、黃金等。整個管制手段雷厲風行，約莫一個月，有三千多人被捕，上海的物價獲得平抑，躉售物價指數只上升了百分之六，然而，這一切只是治標的假象。雖然外面查緝是風聲鶴唳，但王先生家裡根本不敢留現金，只要一有錢還是投資，買貨物囤積：

那時候我們有錢就投資，買貨物來放，不能留著鈔票，很快就不值錢了，通貨膨脹很厲害。<sup>71</sup>

通貨膨脹的根本原因來自政府龐大的財政赤字，物價管制並不能解決問題，而且幣制改革全國各地腳步不一，別的地區物價仍舊上揚，人們當然會湧進上海搶購物資，諷刺的是那一年浙江及江蘇的農作大豐收，上海反而嚴重缺糧。壓垮上海經濟管制的最後一根稻草是放「虎」歸山，孔令侃以抖出蔣家及政府祕辛為手段脅迫政府，以換取安全出境，孔、杜等家族也相繼赴港。十月底，蔣經國承認任務失敗，並向全國人民道歉，但是誠意解決不了危機，上海物價又立刻攀升。十一月六日，上海物價比八月漲了十倍以上，人民對國民黨失去了信心。<sup>72</sup>

同樣是商人的新光集團創辦人吳火獅曾經在他的口述傳記裡，談到當時上海通貨膨脹的情況，以及商界周轉的高利貸：

我在三十七年（一九四八）第一次去上海、寧波等地載麵粉，那時物價已經漲得很厲害了。錢跟衛生紙沒兩樣，一點價值也沒有，大概四千八百萬元才買到一擔米。隔兩天又漲一倍。那時上海的通貨膨脹可以說是全世界最嚴重的……鈔票都用大布袋塞一大包，用繩子捆起來，扛到街上買東西，一大包錢也買不到什麼，因為法幣毫無價值，光是鈔紙的價值就比幣值還高。通貨膨脹的速度快到印鈔票都來不及的地步。……同時，利息錢也飛漲，曾經高到三十七元（日息 37%），這是驚人的數字，我們一般談到利息只說是六錢、七錢之類，當

<sup>71</sup> 引自江志如的訪談稿，2008.01.16。

<sup>72</sup> 陶涵（Jay Taylor）著，林添貴譯，《台灣現代化的推手：蔣經國傳》（台北：時報，2000），頁 166-175。

時台灣這邊最高也不過一塊六、七而已。而當時上海的法幣利息要高到三十七元，差不多只要過三天整個價格漲一倍了。<sup>73</sup>

王先生所背負的沉重壓力與怒責妻子的原因，也就可想而知了。

王先生盡力去應付驚人的通貨膨脹，也大膽放手一搏，在共產黨進上海之前，王先生投資了他在大陸的最後一筆生意，他樂觀地以為能為他賺進一百兩的黃金，結果不但未如預期，反而虧損了一百兩黃金。王先生只好向朋友借錢，然而，借錢周轉，往往得付出高昂的代價。因為在通貨膨脹的壓力下，現金只會快速貶值，有錢人除了進行商業投機性的囤積，就是放高利貸，以高利息來養貶值。<sup>74</sup>

生意不好做，又有許多人的生活仰賴著他，包括號子裡的僱工、妻女、兩個弟弟，他父親和奶奶的喪事也由他負責，又要多負擔志如娘家，沉重的壓力讓王先生脾氣更加暴躁，時常把脾氣發在志如身上，令志如對丈夫產生恨意，這樁以買賣為基礎的婚姻很快就出現裂痕：

那時候我江家是沒出息，我弟弟在號子裡是最混的一個。他只有小學畢業，不愛讀書……也沒罵錯啦！但是那時候我心裡好氣、好恨他，常想著只要我江家有翻身的一天，我就要跟他離婚。<sup>75</sup>

志如為了娘家，做了舞女；為了娘家，嫁給王先生；為了娘家，在婚姻中忍氣吞聲。為了繼續照顧娘家，志如試著靠自己，心理壓力也不亞於丈夫：

我先生在樓下，我在樓上偷偷接織毛衣的生意。一件五塊錢，先收錢，我拿了五塊，趕快去買一件厚的衛生衣。那時一件厚的衛生衣要四塊半嘛，五塊可以買一件。叫我妹妹偷偷拿去給我父親穿，天冷了呀！一件織好，我再接一件，又五塊，一件一件的織。那時我很痛苦啊！是心理上的苦，不是物質的。雖然有錢，可是我很痛苦啊！<sup>76</sup>

<sup>73</sup> 黃進興，《半世紀的奮鬥－吳火獅先生口述傳記》（台北：允晨，1990），頁126-127。

<sup>74</sup> 黃進興，《半世紀的奮鬥－吳火獅先生口述傳記》（台北：允晨，1990），頁125。

<sup>75</sup> 引自江志如的訪談稿，2007.10.21。

<sup>76</sup> 引自江志如的訪談稿，2007.10.14。

## 變·遠離

抗日戰爭期間，日軍曾經佔領上海租界，中國人進出受到日軍盤查管制，雖然風聲鶴唳，但只是心理上有些惶恐。緊接在後的上海經濟大動盪，才是真叫上海人嚐到餓死在錢堆裡的滋味。普通百姓每天只求活著，資本家卻是先一步嗅出不對勁的苗頭，陸續把資本外移。共產黨從潛伏到反撲，上海瀰漫著不安的氣氛，不管有沒有辦法，人人都想在「山雨」襲來之前先逃離這個即將淪陷的城市。

三十七年底，共產黨節節進逼，國民黨大勢已去，蔣介石暗地規劃、執行撤退台灣的精密計畫，但仍在上海宣稱國軍將堅守到底，預料三年內即可獲得全面勝利。事實上，三十八年（1949）年初，擠滿難民的軍艦與商船不斷駛向台灣的基隆或高雄，部分有錢人甚至直接避往美國等海外地區。五月五日，上海的黃埔江碼頭和城西機場已擠滿逃難民眾。五月十五日，上海附近已可聽到砲聲，江灣擠進附近縣市湧來的難民。五月二十二日，上海已傳出即將淪陷的消息。五月二十五日，共軍打到上海機場外圍，同一天即進佔上海，國軍並未強力抵抗，只轟炸上海市郊的機場和儲油設施，因此國軍撤離上海後的一個月，上海還能照常運作，基本糧食也不虞缺乏。<sup>77</sup>

共產黨強烈表達出反軍閥、反地主、反資本主義的立場，可怕的階級鬥爭使上海的資本家人人自危，王先生一家也是非得離開上海不可。王先生的生意重心早已轉移到台灣，到台灣去是他們的目標，不過朋友的欠款必須先償還。兩層樓的大宅子，是王先生在上海僅存的資產，資金全在台灣。當時港幣不受通貨膨脹的影響，王先生便要求派守台灣莊口的二弟將錢匯往香港的銀行，他再轉回大陸還債。三十八年，上海局勢終於告急，王先生先一步離開上海，留下懷孕的志如和稚齡的長女，獨自前往香港，等待二弟的匯款以及台灣入境證。然而，王先生不知道的是，他在台灣的錢也早就化為泡影了。

---

<sup>77</sup> 陶涵（Jay Taylor）著，林添貴譯，《台灣現代化的推手：蔣經國傳》（台北：時報，2000），頁 175-193。

## 第二節 改治的潭門・苦難的歲月

### 赤禍・流徙

抗日戰爭打了八年，中國付出極高的代價，終於獲得全面的勝利；民國二十八年（1939）夏天，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中國與歐美列強成為盟友，過去的不平等條約也一筆勾消。外患解決了，但內憂卻已是燎原之勢。民國二十六至二十九年之間，共產黨人數激增，擴張其群眾基礎。在抗日之餘，國共間也發生零星的衝突。民國三十年發生新四軍事件，讓國共的矛盾正式浮上檯面。民國三十一到三十三年，共產黨更加積極地滲透農村。民國三十四年日本投降，戰後全國各地接收的工作繁雜困難，國民政府尚未從戰爭的疲憊中復甦，就在民國三十五年七月，共軍全面叛亂，國共之間的戰爭再起。美國多次促請雙方和解，但中共拒絕和談。共軍勢如破竹，黃河以北幾為共軍所佔，民國三十七年八月十九日中共成立「華北人民政府」，要求國民政府無條件投降。國民軍節節敗退，同年底徐蚌會戰後，國民政府已暗地著手轉進台灣的工作，包括大陸方面的撤退與台灣方面的準備。

三十八年五月，整個上海已陷入恐慌與混亂，碼頭、機場擠滿難民。在共軍進佔上海之前，王先生留下妻小，先一步到香港。在香港，焦急的王先生等不到台灣匯來的錢：

那時我小叔才三十初頭，人很老實，教育程度低，別人看他很有錢，叫他跟著投資他就投資，開牛皮工廠啊、投資農產啊，他根本什麼都不懂，農產是往南送還是往北送，他都搞不清楚，錢都騙光啦！<sup>78</sup>

王先生的資金或許是二弟投資不當，但當時台灣惡劣的經濟環境恐怕也把王先生的錢吃掉了。因為台灣是一座海上孤島，使得台灣的經濟從來就不是封閉自足的型態，這種海洋型的經濟使台灣不得不承受外部經濟的影響，因此，光復後的台灣，除了島內經濟問題，還受大陸經濟的波及，而步上與大陸相同的、惡劣的通貨膨脹的問題。<sup>79</sup>

一直等下去也不是辦法，志如和一雙兒女必須盡快離開上海；志如那時剛生下長

<sup>78</sup> 引自江志如的訪談稿，2008.01.15。

<sup>79</sup> 陳正茂編著，《台灣經濟發展史》（臺北：新文京開發，2003），頁164。



子。爲了安頓妻兒，做長久之計，王先生在香港九龍自建了一棟兩層樓的小房子以後，通知志如帶兒女到香港會合。三十九年，志如在弟弟的護送下，帶著三歲的長女和一歲的長子，從上海坐火車到香港和丈夫會合；上海的大房子，志如交給了娘家：

我是一直照顧娘家，後來想想，還好共產黨來了，我們去香港，才能把上海的房子送給我娘家，讓他們有地方住。<sup>80</sup>

志如的弟弟在香港住了幾個月，找不到工作，便回上海去，只是當時誰也沒想到，不久後，共產黨便封鎖大陸，進也不行，出也不得，姐弟倆竟得隔三十多年，白髮蒼蒼時才能再相見，父母更是無緣再見一面。

志如一家四口在香港過了一個年，並生了第二個女兒。在香港的生活跟以前是不能比。以前在上海住的是大房子，在香港只能住兩層樓、二房一廳的小房子，而且樓上還得出租；當時志如已有了三個孩子，每個孩子只差兩歲，需要人手幫忙，家裡還是請了一個廣東人。台灣那邊始終沒有錢匯進來，沒多久王家連幫傭的工資都負擔不起了，志如就一肩扛下照顧孩子、料理家務的責任，雖然這是當時中國絕大多數已婚婦女的份內工作，但對志如而言，卻是生命中另一頁悲苦日子的開始。

然而，拮据的生活卻使志如的婚姻危機獲得緩解：

香港房子的樓上租出去，也是一個大陸人，學歷很高，有大學畢業，但是打孩子打得很兇，像打動物似的，我們看了很怕。我先生就說：「我們做父母的沒辦法給小孩穿好的、吃好的，怎麼還可以打孩子呢？」我先生是不打孩子的，那時候我聽了，就打消離婚的念頭了。他對孩子那麼好，是個好人，雖然脾氣暴躁點，我就忍忍，後來我再沒想過要跟他離婚。<sup>81</sup>

志如對娘家的責任，因中共的鎖國政策而畫下休止符，儘管心裡仍是切不斷的牽掛。少了娘家的羈絆，志如全心放在自己的小家庭上。脾氣暴躁的丈夫遭逢人生的低潮期，卻沒有使性子牽怒幼小的孩子，反而對孩子滿心愧疚，這讓志如感到滿足。漂泊到人生地不熟的異地，三個孩子是志如的心靈寄託，丈夫對孩子好，愛屋及烏的心理機制下，志

<sup>80</sup> 引自江志如的訪談稿，2007.10.21。

<sup>81</sup> 引自江志如的訪談稿，2007.10.21。

如對曾經充滿恨意的丈夫也轉變了態度。

四十年秋天，王先生以港幣三千五百元將九龍房子的二樓賣斷，終於帶著妻小和一些現款，搭上開往台灣的船，在基隆靠港入境。

志如第一次踏上台灣的土地，她與她的家庭將在這個陌生的海島繁衍下去。那年，她二十六歲。

## 台灣·貧窮

光復以後，台灣島內的戰後復建需要大量資本，政府以增加資本刺激公營事業生產卻成效不彰，接收的政府要員只重管制而無適當因應，導致三十七年末至三十九年初的惡性通貨膨脹。加上台幣對國幣的匯兌制度缺乏機動性，官定匯價無法反映真實匯價，造成大陸過多資金流向台灣，台灣銀行只好增加通貨發行以支應兌款，通貨膨脹更加惡化。此外，台灣回歸祖國的懷抱，還未享受到回歸的好處，卻得立即扮演起支援國民政府在大陸內戰耗損的角色。米糧物資都往大陸送，造成台灣米糧以及各種民生物資短缺，物價大幅上揚，百姓的生活竟然比日治末期還困苦。民國三十八年，政治情勢驟變，國民政府遷台，帶來大量黃金、外匯及專業技術人才，也與大陸的通貨膨脹劃清界限，政府終於拿出穩定貨幣的決心和政策，以及美國經濟援助的挹注，直到四十一年，台灣的經濟才恢復到戰前的水準，物價漲幅也漸漸緩和下來，那年的國民所得僅僅八十六美元。<sup>82</sup>

大陸淪陷前後，二百萬人口在短短幾年間湧進台灣，供需極度失衡的情況下，全島百姓不分本省人、外省人，幾乎都過著貧窮的生活，也過著嚴格的軍政管制的生活。

志如一家到了台灣，至少還有落腳之處——早先買下的日式房舍，與小叔一家人同住，但兩家子人擠在一間小小的房子裡，王先生和二弟都沒有工作，沒有收入。火爆的脾氣，加上心裡長久累積的怒氣，現實生活的困境終於引爆王先生對二弟的攻擊，只要一想到他辛苦在台灣開創的棉布事業瓦解，所有資金被二弟敗光，心裡就有氣，他對二弟的極度不滿表現在言語上，動輒辱罵。王先生的二弟受不了兄長的責備，正巧一個住

<sup>82</sup> 陳正茂編著，《台灣經濟發展史》（臺北：新文京開發，2003），頁 162-185。

在新竹縣新潭門的朋友向他鼓吹養豬的好處，二弟全家很快就搬出大哥的勢力範圍，開始新生活。

在那個年代，農家爲了年節祭典的牲禮祭品、取得家禽家畜的排泄物以爲耕田的有機肥料，或是貼補家用，幾乎每家都有畜養數十隻的豬、雞、鴨、鵝等做爲副業。一般來說，在五十七年政府開放大宗穀物進口以前，畜牧養殖業多半屬於農村型的副業。四十一年度，潭門鄉的豬隻計有八八六七頭，三百四十二隻死亡，死亡率不到 4%，是未來十年中最低的時期，後來就逐年升高，最高的一年超過 5%。<sup>83</sup>

許昌街的房子裡，只剩下志如一家五口，王先生在台北還是沒生意可做。鼓吹二弟養豬的朋友，其實與王先生也熟識，他知道王先生仍然賦閒在家，力勸王先生何不到新潭門開農場投資養豬事業？四十一年度的春天，王先生盤算台北已沒有他的機會，抱著姑且一試的心態，隨著二弟的腳步，也領著全家人搬到新潭門。二弟住在朋友家附近，王先生則選在友昌村的眷村附近，自建包含住家以及三間豬舍的房子；房子建好之前，他們在建地旁租屋而居。<sup>84</sup>

新潭門的稱呼，起自昭和四年（1929）火車站及行政機關北遷到現址之後，迅速帶動周邊的禾曲村、宜曲村等村的經濟發展，商家林立，成爲潭門鄉最重要的政經中心。<sup>85</sup>友昌村緊鄰宜曲村的西北方，狀似一條沒有尾巴的熱帶魚，村內的三條河流像魚身上的斑紋，由東方向西南斜畫過去。最北的友昌溪，夾岸盡是草原，是村中主要的河流；上曲溪和河口淘溪分別從西南和西南邊緣流過。<sup>86</sup>遠離火車站的友昌村，放眼望去，還是一幅鄉下景色。<sup>87</sup>王先生和志如向來住在繁華的城裡，眼前的寂寥彷彿已在宣告，他們將展開不一樣的人生。

住進新潭門的新居以後，王先生開始了他遷到台灣以後的第一份工作——經營農場；搬到新潭門的第二年，志如的第三個女兒——也是最後一個孩子——出生了，志如一個人照顧四個孩子已分身乏術，王先生也就不要求她幫忙農場的工作，一切自己扛起。

<sup>83</sup> 《潭門鄉志》，頁 122-123。

<sup>84</sup> 「友昌村」是假名。

<sup>85</sup> 「禾曲村」、「宜曲村」皆爲假名。

<sup>86</sup> 「友昌溪」、「上曲溪」、「河口淘溪」皆爲假名。

<sup>87</sup> 《潭門鄉志》，頁 37-39。

王先生以時價一斤十塊錢買進五隻小豬仔，用豬菜和餵水餵養豬隻。豬菜就是地瓜葉，地瓜葉和地瓜都要剝碎，豬的食量大，剝豬菜的工作十分勞累。餵水的來源當然不限自家，一個家庭的餵水產量也不足以供應，所以王先生每天都到鄰近的眷村去收集餵水。辛苦養大了小豬，五條大肥豬總算可以賣出的時候，豬價卻大跌到一斤五塊錢。王先生覺得賣了划不來，就留著繼續養，但是母豬生小豬，很快地，豬隻的數量多到讓王先生無法負荷。

四十二年春天，新竹下起連綿不斷的春雨，造成豬瘟猖獗，潭門一帶最為嚴重。<sup>88</sup>碰上豬瘟，王先生養的一大窩豬全死光了，血本無歸。到了夏天，滿六足歲的長女入小學，王家的經濟開銷得要多上一筆教育支出。於是養豬之外，王先生也學著養雞，可是下場跟養豬一樣：

我們去新潭門養豬養雞。不會養啊，一養就死光了。……養雞也一樣，有一次要給小孩繳學費，第二天起來，雞都死光了。很苦啊！<sup>89</sup>

「不會養」，是王先生農場經營失敗的主因，正如志如自己說的：

我先生是大商人啊，他生意頭腦很好，但怎麼會養豬呢？我們從來就沒有養過啊！<sup>90</sup>

養豬、養雞原是一般農家的副業，既是副業，如果失敗，也還有主業農耕可做家庭經濟的後盾，但是，像王先生這樣純粹經營畜牧為生的，所承擔的風險就遠遠超過一般農家所能負擔的，更何況他們根本沒有這方面的知識和經驗。

面對新事業的不順利，敏銳的生意眼光讓王先生很快就從沮喪中振作起來，因為他找到新的投資方向。

## 戲院·苦難

新潭門的戲院生意鼎盛，看電影的客人都是阿兵哥，他們遠從老潭門而來。

如前所述，火車站所在的位置，左右了潭門政商中心地位的歸屬。相對於新潭門，

<sup>88</sup> 參考聯合報新竹訊，〈春雨纏綿，豬瘟猖獗〉，《聯合報》1953.04.22。

<sup>89</sup> 引自江志如的訪談稿，2007.10.14。

<sup>90</sup> 引自江志如的訪談稿，2007.10.14。



老潭門曾是潭門最熱鬧的政經文教中心，中心點涵括「大潭門驛」（今「天主堂」）以及潭門街區（今「潭門老街」）共構的商業區。老潭門的行政區包括潭肚村和部分的潭門村，整體地勢低平，除了商業街區之外多為稻田。潭肚村南緣一帶，當地人喚做「後山」，山上多茶園，還有軍營駐紮。<sup>91</sup>那是一處步兵基地，到新潭門看電影的阿兵哥就是從那兒的基地來的。

王先生的投資野心再起，他想：既然阿兵哥是戲院的主要客源，而阿兵哥來自老潭門的軍事基地，如果在老潭門開一家戲院，阿兵哥找娛樂會捨近求遠嗎？況且，自己的人面廣，過去在上海做生意的朋友中，有幾位在台北開影片公司，拿影片也方便。王先生深深相信在老潭門開戲院一定能成功，這份強烈的信心讓他變賣二間房子，投入僅剩的資產，甚至負債。

電影在當時還是時髦的娛樂，因為電影是二十世紀才興起的都市文明。台灣因為日治的關係，早在 1899 年即接觸到先進的電影娛樂，但是還不普及。<sup>92</sup>1930 年代以後的戲院，硬體建築較以前更豪華氣派，電影放映的設備也更講究，戲院搖身一變成了高雅的社交場所，上戲院看電影成了時髦的娛樂，象徵中產階級休閒活動的品味。<sup>93</sup>改治以後，一時之間社會混亂，民生艱苦，但電影娛樂不但未見衰退，戲院更是如雨後春筍，一家一家地成立，數量之多，僅次於上海市和江蘇省，佔全中國第三位。<sup>94</sup>

打定主意的王先生親自到老潭門探勘並物色合適的戲院地點。老潭門後山的步兵基地，士兵三個月調防一次，可以提供源源不絕的穩定客源；而老潭門最熱鬧、商業機能最好的地方是「新街」街區（今稱做「潭門老街」）。王先生到新街上尋覓，最後相中新街中段的一塊空地。日治時期，這塊空地上曾經矗立著「潭門郵便局」，光復以後，在民國三十五年時遷至宜曲村，原有建築也已拆毀。<sup>95</sup>這塊將要包括戲院和住家所在的地基，隸屬於潭肚村，分屬政府和當地宗族羅屋所有，所以王先生必須向財政部國有財產

---

<sup>91</sup> 《潭門鄉志》，頁 49。

<sup>92</sup> 葉龍彥，《台灣的老戲院》（台北：遠足文化，2006），頁 42-43。

<sup>93</sup> 葉龍彥，《台灣的老戲院》（台北：遠足文化，2006），頁 51。

<sup>94</sup> 葉龍彥，《台灣的老戲院》（台北：遠足文化，2006），頁 112-113。

<sup>95</sup> 《潭門鄉志》，頁 109。

局，以及羅家祭祀公業的管理人羅德義洽租。<sup>96</sup>潭肚村以羅、陳、葉姓為當地的宗族大姓，羅屋在當地更擁有大半的土地，村廟三元宮的廟地便是羅家祖先捐獻的。<sup>97</sup>此外，他登門拜訪潭肚村村長詹守和，向村長表達開戲院的意圖。<sup>98</sup>三十七歲、剛連任村長的詹守和，對於轄域內能開一家戲院十分支持，村長夫婦後來甚至親自到新潭門拜訪王先生一家人，表達歡迎之意，並且協助王先生辦理戲院開設的行政手續。詹守和總共連任九屆村長，近三十年的任期，對王家照顧頗多。<sup>99</sup>

為了有穩定的客源，王先生與駐紮老潭門的軍方單位——陸軍〇〇〇〇部隊洽談，該部隊以「本部駐防本鄉以來迄今數月，惟感潭門地區當無正當娛樂場所，以致官兵不能經常獲得正當精神上之調劑」為由，同意王先生的戲院「營業性質以服務甲方（按：陸軍〇〇〇〇部隊）官兵為主，對民眾營業為輔」，而且戲院「以放映電影為主」。<sup>100</sup>雙方並且議訂合約書，在四十三年七月一日戲院開張當天，正式簽約生效。

一切準備就緒，王先生賣掉香港九龍僅剩的一層樓，還加上他們在台灣的第一筆不動產——台北市許昌街的房子，將大筆的資金投入新事業。未料兩棟頗富價值的房子都已投入，戲院的營建仍然超支，王先生堅信自己的生意眼光，老潭門的戲院投資報酬率高，絕對是穩賺不賠的，於是在戲院開張的前一個月，毅然向朋友商借四兩多的黃金應急，並立下借據。然而，戲院的營建遠遠超出預算，並且負債，使得這場投資後來成為志如的夢魘：

建戲院超過我們的預算，丈夫只好去台北做事，我們一家六口，丈夫不在家裡，我一個人帶四個孩子住，生活實在苦，經濟很不好，日子過得很苦。在大陸的時候，我們就是做生意，生意很發達，到台灣做好幾種生意都失敗，十幾年，一、二十年的經濟很困難。<sup>101</sup>

<sup>96</sup> 「羅德義」為假名。

<sup>97</sup> 《潭門鄉志》，頁 49。

<sup>98</sup> 「詹守和」為假名。

<sup>99</sup> 依據《潭門鄉志》歷屆村長名錄所載，詹守和曾任第三至第十一屆潭肚村村長，民國六十八年任期內死亡，頁 65-68。

<sup>100</sup> 陸軍第「〇〇〇〇」部隊為匿名之故。理由引自陸軍第〇〇〇〇部隊發文給潭門鄉公所及新竹縣稅捐稽徵處之公函內容。戲院開辦形式引自光榮戲院與陸軍第〇〇〇〇部隊簽署的合約書內容。

<sup>101</sup> 引自江志如的訪談稿，2007.05.04。

戲院的興建，由王先生單方面負責，必須在四十三年七月一日前完成，七月五日起就要開始對官兵演映。爲了趕上合約裡的期限，戲院在租來的空地上一塊磚一塊磚建起來。這是一間座北面南的建築物，有兩層樓高、一樓設有五百人的位席，王先生打算等生意做起來，二樓再加二百個座位，擴充成可以容納七百人的戲院。

嶄新的戲院沒有掛招牌，但她取代了日治時期的郵便局，成爲改治後新街上的新地標，也在許多老潭門人的回憶裡佔有一個快樂的位置。沒有招牌的戲院，還是有一個對王先生而言富有意義的名字——「光榮戲院」，希望這個新事業能爲他重新帶來光榮。對老潭門新街的居民而言，光榮戲院的出現以及上海商人搬進安靜的小農村，是件茶餘飯後津津樂道的新鮮事。

王先生領著妻小從新潭門遷入老潭門，暫時住進戲院旁租來的民房裡，與戲院隔一條小巷子的空地上還在施工，那是他們未來的住家。離開大陸以來，短短四年之間，志如一家輾轉到香港和台灣，住了四個地方——九龍、台北市、新潭門和老潭門。三十年的老潭門歲月，讓志如從少婦升格做祖母，也是四個孩子長大成人的搖籃；老潭門是他們在台灣的家鄉。

依照合約書，戲院必須每天下午爲官兵放映一場電影，星期日除外，但星期日上午放映勞軍電影。每場次至少開放六百人入場，官兵票價商定爲新台幣五角。對部隊的演映場次免繳捐稅，且由部隊負責發公文給相關單位協助申請辦理。戲院每週一憑收取之票券向部隊結賬，收取現金，但戲院必須每個月按所收部隊官兵影劇票款總額，提撥百分之十的福利金做爲回饋。官兵的入場券由部隊印製及發放，票券印製的經費則由戲院負擔；義務慰勞部隊高級長官、事務有關人員及眷屬的招待券則由戲院印製，再交由部隊分配，每日六張爲原則。合約書中還有互惠條款，部隊同意戲院有資金週轉需求時得以寬限，但週轉期不得超過一個月；戲院則允許部隊借用戲院，但不能影響戲院正式營業時間，如佔用營業時間時必須先通知戲院。<sup>102</sup>

戲院硬體建築完成，電影放映的機器設備與放映師當然是不能少的，但電影放映機很昂貴，王先生就向新竹市的專業公司租用，要放電影時，他們派放映師過來操作機器，

<sup>102</sup> 依據光榮戲院與陸軍第〇〇〇〇部隊簽署的合約書內容。



也派人來寫廣告海報，但要另外收費。

戲院裡裡外外還有許多工作，王先生請了七、八個工作人員，有女工負責煮飯和家裡幫傭；男工，負責打掃戲院和貼廣告，主要是去後山的部隊基地張貼宣傳：

戲院要演電影時會貼海報，有一個男工會去貼，去軍營裡貼，最遠會貼到有個叫「○○」的地方吧，都是姓戴的人。<sup>103</sup>

有負責交際的先生，與公家機關交涉，也就是去潭門鄉公所和新竹縣政府辦理各項行政業務；有司機，專門負責去台北的影片公司拿片子。

經營一家戲院並不容易，成本之高令人咋舌。戲院只是一個空殼，觀眾願意花錢買票進戲院的目的是看一場值回票價的演出，所以，在戲院裡演出的電影和戲曲才是靈魂。因此，戲院和片商、劇團（或稱戲班）之間的關係就不言而喻了。雙方拆帳的比例有三七分、四六分或五五分，戲院要仰賴片商的影片供應和劇團的蒞臨演出，所以取分自然比較少。如果是請戲班來演出，還須負責其他開銷。在這有限的營收中，戲院還得支付相當沉重的開銷，基本的包括戲院本身的房屋設備、自營類房租、放映設備的購置或租用、廣告宣傳、營業用的水電消耗、員工的人事費等，還要比照一般商店繳交營業稅、所得稅、印花稅等。由於戲院被歸列為特種營業，額外的負擔特別多，娛樂稅、防衛捐、印花稅等是固定要繳的稅捐，還有勞軍救災款、大陸救濟款、國防臨時特別捐等臨時增加的稅目。此外，戲院每週還有勞軍演出。<sup>104</sup>戲院經營的成本雖高，但是如果有川流不息的人潮支持，那「放映電影就像在地上掃黃金一樣」。<sup>105</sup>

四十三年七月一日，光榮戲院終於在眾人期盼下開幕。營運之初，戲院前車水馬龍，阿兵哥源源不絕地湧入戲院看電影，生意鼎盛：

駐兵每三個月移防一次，來來去去的阿兵哥很多，生意特別好。<sup>106</sup>

頂著「戲院經理」頭銜的王先生信心十足，一掃先前農場經營失敗的陰霾，再次嚐到生意成功的滋味。志如也順理成了人們口中的戲院老板娘，家務瑣事交給幫傭，自己在與

<sup>103</sup> 「○○」為匿名之故。引自江志如的訪談稿，2008.01.16。

<sup>104</sup> 參考光榮戲院的稅單收據，以及葉龍彥，《台灣的老戲院》（台北：遠足文化，2006），頁134-138。

<sup>105</sup> 葉龍彥，《台灣的老戲院》（台北：遠足文化，2006），頁133。

<sup>106</sup> 引自江志如的訪談稿，2007.05.04。



戲院一巷之隔的家裡全心教養四個孩子。此時，長女已是小二的學生，另外三個稚齡的孩子才五歲、三歲和一歲。一時之間，志如和王先生彷彿回到過去在上海的輝煌日子，儘管還是今不如昔，但他們對未來充滿期待。

戲院依照合約，只放映電影，但部隊並沒有如合約書所載的一週六天都包一場官兵電影，在部隊發給潭門鄉公所及新竹縣稅捐稽徵處申請協辦免稅的公文函裡的說明是：

自九月廿日起，每逢星期一、三、四、五，四天下午八至十時一場，舉行官兵同樂晚會，并由本部（按：陸軍第〇〇〇〇部隊）付出院租及電費五十元為成本費。<sup>107</sup>

儘管軍方的包場未如預期的多，但每個場次以合約書裡所載至少六百人，每人票價五角，再加上部隊另付成本費五十元，一週共計放映四個場次來計算，戲院一週在軍方包場的營收就有一千四百元。一般場次的觀眾以百姓為主，軍人較少；休假的阿兵哥會另外買票進場看電影。軍方包場，因為免繳捐稅，戲院也給予票價優惠和放寬入場人數的限制；而非軍方包場的場次，戲院業者要主動向新竹縣政府稅捐稽徵處申報娛樂稅。以戲院在四十七年三月上期申報的娛樂稅來看，戲院在一般場次的收入很有限，兩週只賣出全票六百張、半票五百張，但事實上售出的票券數目絕對不只這個數字。戲院每半個月去鄉公所財政課領戲票，「領戲票要先繳稅款」，只要不再去領票，就能逃避一部分的稅金，壓低營業成本，當時各地戲院跑票的情形都很常見。跑票就是重複賣票，在入口處負責收票的收票員要很有技巧地回收一部分票券——不能撕下票根，再送回賣票處重複售出。一般場次的票價比較高，全票要價一元五角、半票一元。<sup>108</sup>雖然，戲院要付出的經營成本很高，但正如志如記得的：「當然還是有賺，不然就不做了」。<sup>109</sup>

成功的戲院必定是位在熱鬧的街區，比如日治時期，台北的「台北座」人氣最旺，因為附近新興的西門市場帶來了人潮。<sup>110</sup>光榮戲院初期的生意雖然好，但對軍方客源的依賴非常深，如前所述，軍方包場一週有一千四百元的營收，一般場次則是兩週才能有

<sup>107</sup> 引自陸軍第〇〇〇〇部隊發文給潭門鄉公所及新竹縣稅捐稽徵處之公函內容。

<sup>108</sup> 依據光榮戲院四十七年三月上期娛樂稅自動報繳書。

<sup>109</sup> 本段兩處標楷體引文均引自江志如的訪談稿，2008.01.16。

<sup>110</sup> 葉龍彥，《台灣的老戲院》（台北：遠足文化，2006），頁 30-31。

一千四百元的進帳，儘管實際情形與帳面數字有出入，但軍方客源幾乎佔有三分之二。這個狀況反映出王先生當初的眼光和判斷是正確的，和軍方簽署的合約似乎保障了戲院的生存，但對戲院而言，過度倚賴單一客源也隱藏著極大的風險，尤其是光榮戲院的所在地並非是人潮眾多的熱鬧商區。

戲院開張才一年多，陸軍〇〇〇〇部隊接獲調離的指示，四十五年的春天，老潭門基地成立永久的裝甲中心。雖然同樣是軍事單位，但裝甲營管束嚴格，裝甲兵平時不被允許離開營區；而且營區裡也開設了完善的娛樂場所，包括兩間名為「中心」和「迅雷」的戲院，和彈子房、軍樂園等等，康樂設施一應俱全，軍人的休閒娛樂在營區裡即可獲得滿足，根本不用出營區，特地到比較遠的、街上的光榮戲院。<sup>111</sup>

戲院需要人潮的支持，世界各國的一般標準是每三萬人口設立一家戲院。根據台灣省影劇公會的統計，民國四十六年六月時台灣共有五百四十家戲院，而當時台灣人口僅有九百二十萬人。顯然，超過人口數而設立的戲院高達二百家以上，供過於求的情況下，民國四十五年度關門停演的戲院就有六十四家，鄉村比都市多，新竹縣三十家戲院就有八家停演，戲院的經營十分激烈而困難。<sup>112</sup>

從光榮戲院開張的四十三年來看，全潭門鄉的人口數也只不過二萬三千五百人，連戲院設立最低標準的三萬人都不到，其後數年間也只陸續增加三千人左右，直到五十一年才勉強突破三萬人。<sup>113</sup>即使加上軍營官兵的人數，也頂多能支持一家戲院的生存，潭門卻有五家戲院。1950年代的戲院功能多，每個城鎮最大的戲院時常出租作為公共集會的場所，如學校畢業典禮的會場、後備軍人點閱召集的地點等。<sup>114</sup>新潭門的首席戲院和潭門戲院即兼具此一角色，潭門鄉的學校畢業典禮、座談會、補充兵的歡送大會等都選在新潭門的戲院舉行。<sup>115</sup>新潭門的戲院位在鬧區，有交通及商圈上之優勢；老潭門軍營基地裡又有兩家新戲院，佔盡「近水樓台先得月」的好處，光榮戲院在周邊戲院的夾殺

<sup>111</sup> 「中心」和「迅雷」戲院均為假名。

<sup>112</sup> 葉龍彥，《台灣的老戲院》（台北：遠足文化，2006），頁 131-133。

<sup>113</sup> 潭門鄉人口統計資料來源：《潭門鄉志》，頁 70。

<sup>114</sup> 葉龍彥，《台灣的老戲院》（台北：遠足文化，2006），頁 141。

<sup>115</sup> 「首席」戲院、「潭門」戲院為假名。參考資料來源：聯合報新竹訊，〈竹將開座談會商討改善民俗〉，《聯合報》1954.06.13。聯合報新竹訊，〈第五期補充兵定期分別入營各地籌備熱烈歡送〉，《聯合報》1954.07.02。

下，生存實在是岌岌可危。

基地裡的兩家戲院讓光榮戲院討不到好處，也失去先前合約的保障，但是戲院與軍方仍維持友好的往來。剛開始，裝甲兵一週還是會包幾場勞軍，戲院同樣給予包場優惠。裝甲兵演習有時需要商借戲院的院址給士兵暫住，軍方在演習結束後，會宴請相關有功人員，王先生夫婦也是座上賓。

無論如何，光榮戲院的靠山垮了，地理位置的優勢也不再，生意迅速大跌：「軍人在裡面不出來了嘛！生意差很多。」<sup>116</sup>戲院才開張，成本還沒回收多少，又還有沉重的債務，戲院生意就遇到極大的困境，對王家而言，無異是雪上加霜。

所謂「開源節流」，人事精簡是危機應變的第一步，原本僱用的七、八個工作人員，陸續遭到解僱，以節省人事成本。但遣散員工，並不能為持續失去客源的戲院止血，另謀財源才是積極的做法：王先生把戲院交給志如負責，自己上台北朋友的當舖裡工作，他的收入成為家裡經濟的主要來源，也幾乎是唯一來源，因為戲院的生意每下愈況，到後來更形同歇業。

王先生離家北上工作以後，只有假日才能回家。三十歲初頭的志如，一個語言不通的外省少婦帶著四個年幼的孩子，留在陌生的客家農村，孤苦地守著苟延殘喘的戲院。戲院的工作和家庭的照顧全落在志如的肩上。為了省廣告海報的委外製作費，專業公司派工人來繪製海報時，她在一旁偷看偷學；以後就自己寫海報，再交給工人去張貼。員工幾乎都辭退以後，她狠下心，拋下孩子去賣戲票；母親分身乏術，孩子們只好自立自強，大的照顧小的，而年紀最大的長女，當時也不過才八歲，跟志如當年聽母親說起家境衰變的年紀一般大。有一晚，志如在戲院的工作終於結束，拖著疲憊的身子回到隔壁的住家，卻發生令她驚恐又心酸的一幕：

我自己賣票，等工作完回到家，小孩子都不見了，他們去戲院看戲，就睡在那裡。<sup>117</sup>

原來，孩子們找不到媽媽，知道要去戲院找，但孩子看戲看入迷了，卻忘了找媽媽，而

<sup>116</sup> 引自江志如的訪談稿，2008.01.16。

<sup>117</sup> 引自江志如的訪談稿，2007.05.11。



晚場電影要十點才結束，乏人照顧的年幼孩子們怎受得了疲累呢？

戲院原來的主客層是阿兵哥，電影很受年輕人歡迎，如日本片「里見八犬傳」、「雙姝戀」，香港的國語片「梁山伯與祝英台」、「李三娘」，但軍人客層快速消失，電影放映只勉強維持兩年就慘澹結束。<sup>118</sup>戲院的生意轉而仰賴一般百姓：

潭門沒有年輕人，電影沒人看就不放了。一年三節演歌仔戲，老人家就會來看

。電影他們不看，都是國語片，有小白菜、武則天啊、金蓮花，林黛主演的。<sup>119</sup>

潭門基本上是個農業鄉鎮，工業發展並不高。四十四年度，全潭門鄉只有四十一家工廠，絕大多數是利用天然資源而生的工業，二十七家屬於食品工業，如依附稻穀、茶業的碾米廠、製茶廠，三家依賴河口淘山紅土的磚窯廠，三家木材工廠。大型工廠較少，兩家紡織廠、一家機械類工廠。<sup>120</sup>有限的工作機會，促使大多數村落的年輕人口向外流動，湧向都市謀生，老潭門亦是如此。

老潭門是個安靜的小農村，年輕人多到外地討生活，留下來的幾乎都是老年人和小孩子，而老人家偏愛看歌仔戲。歌仔戲是台灣獨有的本土劇種，不斷採借融合其他劇種的優點與特色，再轉化成俚俗易懂的演出形式而深受常民的喜愛。日治中後期到民國六十年左右是其黃金時期，歌仔戲劇團結合新興的西方戲院，在封閉的戲院空間內，進行售票演出，脫離傳統祭祀酬神的表演目的，被稱為「內台歌仔戲」。改治以後，內台戲再掀風潮，歌仔戲班也成為各戲院爭相邀請的對象之一。

光榮戲院決定轉型，邀請劇團演出歌仔戲、客家戲等戲曲。戲院試著與戲班接洽，引進歌仔戲的檔期，還特別聘請在桃竹苗客家地區非常有名氣、以客語發聲的牛車順劇團：

後來就演歌仔戲啊，不是講閩南語的，是講客家話。戲班都是我先生或交際去接洽的，我不知道戲班叫什麼，只記得有個姓賴的，是潭門人，還有一個戲班很有名，叫「牛車順」。<sup>121</sup>

<sup>118</sup> 《潭門鄉志》，頁 244-245。

<sup>119</sup> 引自江志如的訪談稿，2008.01.16。

<sup>120</sup> 《潭門鄉志》，頁 126-127。

<sup>121</sup> 引自江志如的訪談稿，2008.01.16。



聘請歌仔戲班來演出，雙方的酬勞事先議定好：

好像是四六分帳，戲院四、戲班是六。每天晚上演完了，就和戲班拆帳，錢當場就分一分。<sup>122</sup>

然而，分到四成酬勞的戲院，成本負擔比電影放映時還重。演員接送、服裝道具的搬運均屬於戲院負責的範圍，戲院要先提供一筆錢給戲班，戲班在約定的檔期前一天，才會載著道具、戲服等，浩浩蕩蕩地進駐戲院。但是，戲票都還沒開賣，就得先支付一筆錢，窮困的王家只能告貸：

我先生到台北去，家裡的事業，過年過節都由我做，吳先生（按：戲院對面的鄰居）陪我去借戲班，先借一部分錢給他們，吳先生拿錢借我，我再借給戲班，幫我很大的忙。<sup>123</sup>

除了「借戲班」的錢，還有戲班檔期內的食宿得要供應：

沒有宿舍，就借好幾個鄰居家給歌仔戲演員住，連自己家的客廳也給他們睡，廚房給他們開伙，大概有二、三十人。我們一家人就住一個小房間。<sup>124</sup>

戲班子來演戲時，租鄰居家給演員住，沒有租金。左右鄰居都是客家人，免費借住。利用戲院旁空地搭茅草棚和借住鄰居家。<sup>125</sup>

一個檔期大約是十天，戲院必須要為暫居此地的戲班成員向在地警察局申報臨時戶口，擔負戲班這段期間的保證人。

據葉龍彥的研究，大都市或大型戲院不喜歡聘用劇團，因為戲院的負擔重而收入少。<sup>126</sup>高成本無法迴避，戲院只有想辦法、找機會跑票，以賺取更大的利潤。售出的票券數目是雙方拆帳時唯一的依據，所以戲班會派人監督戲院的收票員，以防跑票，不過「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我負責賣票，收票就請一個鄰居太太幫忙。他們（按：指戲班）會派人來看，他們不能都相信戲院嘛！趁他們的人不注意的時候，就把票收回來，送到我這

<sup>122</sup> 引自江志如的訪談稿，2008.01.16。

<sup>123</sup> 引自江志如的訪談稿，2007.05.11。

<sup>124</sup> 引自江志如的訪談稿，2007.05.04。

<sup>125</sup> 引自江志如的訪談稿，2007.05.11。

<sup>126</sup> 葉龍彥，《台灣的老戲院》（台北：遠足文化，2006），頁 136。

邊再賣出去。跑票是一定有的啦！<sup>127</sup>

光榮戲院引進歌仔戲以後，一開始，一個戲班的檔期還能安排一、二週，一天演兩場，日場大約有一百個左右，晚場生意比較好，能有三、四百人。後來，生意愈來愈差，連歌仔戲也沒人看了。光榮戲院已是窮途末路。

民國四十年到六十八年是台灣戲院的黃金年代，各地的戲院一家接一家的開，然而在激烈的競爭和殘酷的現實之下，自然淘汰掉體質不夠健全的戲院。<sup>128</sup>猶自掙扎的光榮戲院，也將在這場野蠻遊戲中退場。

苦撐了一年多，戲院生意並沒有起色。四十五年六月，王先生只好賣掉新潭門的住家和豬舍求現；後來，甚至全家搬到戲院去住，把住家押給一位姓甘的朋友換取現金：

押掉是跟他借一大筆錢，房子抵押給他住，不收租金，等以後我們有錢還他時，再把房子收回。他們住了十幾年，後來我們把房子賣給旁邊開理髮廳的饒○○（按：鄰居）。<sup>129</sup>

平常不做生意，一年只在三節演出歌仔戲的光榮戲院幾乎已呈歇業狀態，家裡窮得令人害怕，長期的貧困使營養不良的長女甚至曾經在校園中暈倒：

有好長一段時間，母親（按：指志如）每天拿了五塊錢在菜場裡來回打轉，因為這五塊錢要買五人份的菜，怎不令她傷透腦筋呢！一度天主堂的救濟品，也成了我們餐桌上的美味食物，由於長期營養不良，我們個個面帶菜色。<sup>130</sup>

民國四十年左右，許多西方神職人員在大陸遭中共驅逐出境，民國四十一年年底，費濟時神父與另一名神父先到新竹，其他耶穌會教士也陸續抵達後，展開大規模的傳教。因為這些教士多從上海和揚州逃難而來，與外省人同病相憐，而且他們也只會說國語，比較能與外省人溝通，於是，天主教教堂就跟著外省人的足跡設立。目前位於新竹市北大路和中正路交叉路口的「天主教聖母聖心主教座堂」，即由費神父籌設，興建於民國四十六年，形似大陸揚州的教堂。民國五十年春天，成立新竹教區，包括桃園、新

<sup>127</sup> 引自江志如的訪談稿，2008.01.16。

<sup>128</sup> 葉龍彥，《台灣的老戲院》（台北：遠足文化，2006），頁 129-133。

<sup>129</sup> 引自江志如的訪談稿，2008.01.15。

<sup>130</sup> 引自江志如借用次女名義的投稿文章〈天助自助者〉，刊于《中華日報》。

竹、苗栗，由台北總主教區分出。新竹縣全是耶穌會神父，由費濟時主教領導。民國五十七年是新竹教區的黃金年代，教友增至六萬多人，分堂有一百零四所，其後因社會結構改變，人口集中至大城市和工業區，教友日漸遷出減少。<sup>131</sup>

在大規模傳教的行動中，朱神父在民國四十二年進入老潭門，先設立小型圖書館，一年後在老街買下三間房子做為天主堂，開始傳教。教友人數逐漸超過二百人，德依慈便在五十四年買下日治時期原是「大潭門驛」的天主堂現址，建起一座莊嚴宏偉的教堂，成為老街街區西側的重要地標。<sup>132</sup>與東側的村廟三元宮，中西信仰共同撫慰老潭門人的心靈。在物資缺乏的四〇、五〇年代，老潭門的天主堂曾經發起過幾次救助貧困的活動，發放許多美國運來的救濟品，像是麵粉、奶粉、糖、衣服、文具等，往往一家大小都去排隊領受。<sup>133</sup>領回來的麵粉做成了美味食物，粗糙的麵粉袋則克難地做成小孩身上的衣褲。

志如以每天五元的伙食費和領救濟品度日，絕不是節儉或是貪小便宜，從王家欠租的情形可以窺知一二。

攤開王先生繳給地主羅家的地租收據，可以發現三十年來，王家的地基坪數和繳納的租金雖然幾經變易，但羅家收取的地租並不高：四十四年度一百三十六坪的地基稅金收取蓬萊米二百七十二台斤，折合時價為新台幣三百一十二元八角；亦即一坪地收取二台斤米的租金。不過戲院在四十三年七月一日開張，在此之前尚需房子建造的時間，也就是說王先生在四十四年二月一日繳納四十四年度的地租一坪二台斤米，事實上很可能包含四十三年的地租，因此，隔年地租帳面上看似調降一半，其實是沒有改變的，也就是自四十四年度繳租開始，就是一坪收取一台斤米，折合現金由 1.4 元至 3.2 元不等，連續十六年都維持這樣的租金。六十年度才漲為一坪一點五台斤的蓬萊米，又持續八年，折合現金每坪由 4.8 元至 12.5 元不等。六十八年度開始，地租不再以穀租折合時價的方式計算，改成每坪 26.4 元現金計價，並繳納印花稅四至六元不等，一直到七十三年

<sup>131</sup> 參考資料：〈北大教堂簡介〉，書面資料感謝北大教堂張修女提供。李克勉，〈新竹教區簡史〉，網路資源，<http://catholic.org.tw/catholic/tc02-1.php>，2008 年 6 月 25 日。風的故鄉，〈北大教堂〉，網路資源，<http://www.cpmah.org.tw/2001/c90007/www/k-13.htm>，2008 年 6 月 25 日。

<sup>132</sup> 羅鵬華，〈老街講古〉（2004），頁 89。

<sup>133</sup> 《潭門鄉志》，頁 245-246。

王家搬離老潭門爲止。

雖然地租不算高，交不出來時，羅家也會通融讓王先生晚一點付清，但事實上，王家拖欠租金的情形很頻繁也很嚴重。王先生自四十四年開始繳租，但從四十六年度起就發生拖繳地租的窘境，直到六十四年度間，平均遲繳二年。以四十九至五十一年度，這三個年度最爲嚴重，竟然要五年後才能結清地租。可見王家經濟之拮据。

日子已經苦得過不下去，偏又「屋漏偏逢連夜雨」。有一年過年，戲院請了戲班演出三天的歌仔戲，戲院分到八百元。志如剛把拆帳分得的錢整理好時，家裡來了一位朋友——安徽籍的醫生，是王先生的同鄉。志如趕緊用布巾把錢包好，再塞在折好的棉被裡。急忙中，花布巾鮮艷的一角露在棉被外頭。那時正是午餐時間，王先生留這位醫生朋友一起吃飯聊天，醫生朋友坐的位置，正好可以清楚看見志如房間的棉被，以及露出來的花布巾角。飯後，醫生朋友告辭，志如趕回房間要取出得來不易的錢，但錢和花布巾都不翼而飛了。這對王家來說，又是一個沉重的打擊，也失去了一位朋友。

民國四十九年，又到了請戲班來演戲的節日。最後一場戲，戲開演了，但是一張票都沒賣出去。平常王先生都是在台北朋友的當舖裡幫忙，不在家，剛好那次他回來，親眼看到偌大的戲院裡沒有觀眾：

我記得最後一場的時候沒人，入不敷出，沒辦法打平，只好結束。戲班要回去了，我要給錢，那時候借戲班都要先給一筆錢。我家裡根本就沒錢了，還是鄰居先幫我出，陪我去借戲班。但是結束了，戲班要回去了還要算帳。我家裡真的是一毛錢都沒有了，連我先生坐車去台北的錢都沒有啊！<sup>134</sup>

沒錢支付戲班的尾款，連王先生要回台北的車錢也沒有，走投無路的王家實在看不出他們的未來在哪裡。戲班離開後，志如整理戲院，在院子裡拔草，赫然在水井草叢裡發現一枚演員遍尋不著的金戒指。志如心想也追不上戲班了，先生還得回台北，便拿戒指去換了車錢給王先生。經過那次的困局，王先生心裡就打算收掉戲院。那年的颱風把戲院的石棉瓦屋頂吹掉，整修要花上一筆錢。那時候戲院早就沒有營業了，但是戲院用電底數比一般家庭高，就算沒開演，還是要收一樣的錢，房屋稅又重。王先生終於做了

<sup>134</sup> 引自江志如的訪談稿，2007.10.21。



重大的決定，把戲院申請變更爲住家。

戲院再也不能爲王家帶來進帳，全家的生活完全依賴王先生在台北工作拿回來的錢，各差兩歲的四個孩子也都到了上學的年紀，王家的日子愈來愈難捱：

民國五十年間，外子因經商失敗，弄得債台高築、山窮水盡，致親朋好友均遠離而去。那時四個兒女都在就讀，真是求生不能卻也死不得啊！<sup>135</sup>

## 廚工·破繭

民國五十年，志如的小女兒剛上小學。在裝甲兵演習後的宴席上，志如結識了一位同姓同鄉的校長夫人，熟悉的家鄉口音讓她倆非常投緣。這位年長志如兩歲的校長夫人，是志如在台灣最要好的朋友，也爲她的困境開啓了一扇窗：

我們困難時，她是我們精神上的支柱。她幫我們，來看我們。<sup>136</sup>

校長夫人膝下無子，很羨慕志如有四個聰明伶俐的孩子，便時常到她家裡拜訪，享受孩子成群的快樂，但觸景傷情，也不時向志如哭訴無子的悲哀。眼見志如的窮困，校長夫人十分同情，她提議志如分一個孩子給她以減輕負擔，但志如不肯，只讓讀小學一年級的小女兒認了乾媽。兩家往來更加密切，校長夫人也更積極地推薦志如到她丈夫的學校工作。沒有高中畢業證書，志如當不成代課老師，最後，是去學校廚房當臨時工，卻引來許多質疑：

「電影院的老闆娘怎麼可以到我們廚房當臨時工？」校長開會宣布，老師不敢說什麼，但背後講閒話，認為老闆娘不會做粗事，只會吃飯。<sup>137</sup>

向來就是大小姐、少奶奶派頭的志如，自小成長於優越的環境，生活粗事從來就不是她擅長習慣的工作。比如剛搬到老潭門時，要她學著鄰居們晨起清掃門口的街頭和溝渠，志如覺得很不習慣：

我剛搬到那兒時感到很不習慣，老實說，要自己拿了掃把去掃街頭，總認為有失身份似的，還好一段時日下來，我發現有當醫生和中學老師的男士每天都掃

<sup>135</sup> 引自江志如的投稿文章〈靠主渡過難關〉，刊于教會的月刊。

<sup>136</sup> 引自江志如的訪談稿，2007.05.11。

<sup>137</sup> 引自江志如的訪談稿，2007.05.11。

得很起勁，於是我坦然了。後來我也參加義務勞動，跟鄰居們去修築石子路。<sup>138</sup>

或許是「蓬生麻中，不扶而直」，客家人勤奮勞動的觀念改變了志如，或許是生活的困頓迫使她不得不向現實低頭，也或許是「不服輸」的個性激勵著她。在眾人質疑的眼光下，志如並不是在廚房裡默默地埋頭苦幹，一個人切切洗洗，而是規劃、指導和檢查。她將每個工作規劃一套流程，將到廚房值勤的學生編組，以分工接力的方式完成。比如洗碗盤，第一組學生將廚餘沖淨，交給第二組以清潔泡沫刷洗，再傳給第三組用清水洗淨，第四組擦乾歸位；她穿梭在各組之間指導，檢查出洗不乾淨的碗盤即退回重洗，嚴格執行幾次以後，學生們知道她是認真的，不敢像以前一樣偷懶、隨便，學校的碗盤不再油膩。廚房工作繁雜累人，「但我用智慧把它做好」，徹底堵住了每張質疑的嘴巴，志如也拋開過去經營戲院時的挫折感和無力感，開始發現自己的才華。<sup>139</sup>

臨時工有工作才有錢領，學校放暑假休兩個月的空窗期，志如就上台北做有管吃管住的保母工作，學校開學再回來；母親不在家的日子，家裡只好交給已讀竹女的長女，四個孩子相依為命，互相照顧。

## 兒女·希望

戲院結束以後，全家人的生活都仰仗王先生在台北工作的收入，但是王先生在台北朋友處其實不怎麼好，能拿回來的錢有限。儘管志如持家已盡力儉約，該說是刻苦吧，但四個成長中的孩子實在需要充足的營養，還有對窮人家來說，為數不小的學費是心頭揮之不去的夢魘：

在那時，有一件最令我們全家擔憂的事，那便是一期期的註冊費，每次註冊，對我們來說無異是一道難關，這一次過了，又要愁下一次，我曾有過幾次沒有註冊先去上課，以後再分期付款，那完全是承學校師長的同情，才得以破例而為。<sup>140</sup>

交不起補習學費，還有熱心的老師義務授課，但學校學費不能不交，勉強交了一期，還

<sup>138</sup> 引自江志如的投稿文章〈學人之長〉，刊于《中華日報》。

<sup>139</sup> 該處標楷體引文引自江志如的訪談稿，2007.05.11。

<sup>140</sup> 引自江志如借用次女名義的投稿文章〈天助自助者〉，刊于《中華日報》。

有下一期。讀書與籌錢似乎給畫上等號，志如咬著牙，去學校當臨時工，去台北當短期保姆，付出的一切只爲了等待將來出頭的日子。

上台北的那兩個月，總是教志如放心不下家裡「飯來張口，茶來伸手」的四個孩子。那時儉樸勤奮的客家農村裡，哪個女孩不會燒飯洗衣？哪個男孩不會做工荷重？但志如的四個兒女就是不會！志如曾經是金枝玉葉，傭人環繞，對於日常家務並不擅長，她四個兒女在窮苦的環境下成長，竟然也對家務一竅不通：

開戲院的時候，我都在家，家事都我做，不要他們做，他們只要好好讀書就好

，所以現在他們家事都不會，都是結婚以後才學著做。<sup>141</sup>

家務由志如一手包辦，「讀書」是王家孩子們最重要的、也是唯一的工作。回顧王家的背景，王先生和志如都是出身商人家庭，在大陸動亂的時代下還是能有富裕的生活，學歷對商人來說並不重要，王先生本身不就是一個好例子？王先生確實曾經叱咤商場，但那是在大陸的時候，僅供緬懷的輝煌時期，那時王先生是「做什麼都賺錢」。<sup>142</sup>然而，到了台灣以後，「無論幹什麼行業，到頭來總要賠上幾個」。<sup>143</sup>昔日還瞧不上眼的商場朋友已個個發財，王先生卻是一蹶不振，連要找個「吃人頭路的差事」也受限於學歷而讓人摒棄於門外。經驗告訴志如「做生意大起大落的，日子很不穩定」，面對當下極其窮困的生活，更讓志如堅信讀書很重要，讀書才能出頭。<sup>144</sup>

在困境中，人是需要一個希望、一份執著，尤其志如對丈夫「失去信心，於是將希望完全寄託在四個兒女身上」，只有等孩子們都能闖出一片天時，她也才見得到生命的曙光。抱持著這樣的信念，志如督促孩子非常嚴格：<sup>145</sup>

我家斜對面是賣豬肉的，每天凌晨三點多鐘傳來豬叫聲，母親（按：指志如）

便將我們幾個孩子喊醒來讀書，然後她再回床睡覺，至五時，我們又將母親叫

起來生焦炭爐做早餐和便當。<sup>146</sup>

<sup>141</sup> 引自江志如的訪談稿，2008.01.16。

<sup>142</sup> 該處標楷體引文引自江志如的訪談稿，2007.10.14。

<sup>143</sup> 該處標楷體引文引自江志如借用次女名義的投稿文章〈天助自助者〉，刊于《中華日報》。

<sup>144</sup> 該處標楷體引文引自江志如的訪談稿，2008.01.16。

<sup>145</sup> 該處標楷體引文引自江志如借用次女名義的投稿文章〈天助自助者〉，刊于《中華日報》。

<sup>146</sup> 引自江志如借用次女名義的投稿文章〈天助自助者〉，刊于《中華日報》。



天還未亮，王家的孩子就得摸黑起床讀書，對於成長期的孩子來說，這需要多大的毅力呢？夏天清爽的晚風裡，街坊上，鄰家小孩玩得不亦樂乎，王家的孩子就沒有這個權利：

暑假的夜晚，街上不時傳來孩子的嘻笑聲，可是我家的大門卻早已關得緊緊不許通行了。<sup>147</sup>

志如一刻都不放鬆，連家裡的牆上都貼了激勵的標語：「不勞而獲的東西只有一樣，便是貧窮。」<sup>148</sup>從出生就在貧窮刻苦環境下成長的四個孩子，抬頭就見到這怵目驚心的因果警句，能不教他們咬緊牙根，埋首苦讀嗎？

所好我們也能體諒她（按：指志如）的苦心，為了不使母親失望，唯有分秒必爭的啃書本。<sup>149</sup>

在民國五十七年以前，國民義務教育只有小學六年，因此國小五、六年級的學童就已面臨很沉重的升學壓力，更別說初中的學生了。鄉下學校的孩子為了與城裡的學生在聯考上一較長短，幾乎都得花錢補習，但貧窮的王家哪裡拿得出餘錢去補習？潭門中學教英文的張秀水老師知道王家的困境，免費幫他們補習功課，還有傅中興老師也一樣令志如和王家的孩子銘記在心。<sup>150</sup>這些有愛心的老師都是在地的客家人，志如對客家人的好感就在這些雪中送炭的經驗裡，一點一點地增加著。當然，有耕耘就有收穫，王家的四個孩子都考取新竹首屈一指的新竹女中和新竹高中，日後都是高學歷的知識份子。

在那生活溫飽都有困難的年代，一般家庭哪捨得花錢送孩子去讀書？那時小學的入學率高達八成以上，因為接受義務教育是國民應盡的義務，不讓孩子上學，父母會受罰，因此農家子弟多半讀完小學就算了。所以中等教育的入學率，男性只有四成多，女性更是不到三成；能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更稀有，男性大約一成上下，女性只有百分之五。<sup>151</sup>在那學歷普遍不高的小農村裡，王家成了一種典範：

○○（按：指長女）是潭門鄉第一個唸大學的女孩子，後來隔鄰的客家人啊，女兒也考上大學，但是家裡不給唸，她媽媽就幫她爭取說：「為什麼不能唸？」

<sup>147</sup> 引自江志如借用次女名義的投稿文章〈天助自助者〉，刊于《中華日報》。

<sup>148</sup> 引自江志如借用次女名義的投稿文章〈天助自助者〉，刊于《中華日報》。

<sup>149</sup> 引自江志如借用次女名義的投稿文章〈天助自助者〉，刊于《中華日報》。

<sup>150</sup> 「張秀水」、「傅中興」皆為假名。

<sup>151</sup> 李國鼎，《台灣經濟快速成長的經驗》（台北：正中，1978），頁387。



王家那麼窮，都還供女兒唸大學，為什麼不能唸？」後來就讓女兒也去唸大學了。沒想到還能影響別人去讀書，也是好事啊。<sup>152</sup>

要升學必須經過嚴格的考試機制，也需要足夠的經濟能力。當時一般農家，往往只能勉強供應一、二個比較聰明的孩子讀書升學，通常是男孩子才有機會。貧窮如王家，竟然支持三個女兒讀書？但他們做到了。志如四個兒女，兩個碩士、兩個大學，街坊鄰居莫不嘖嘖稱奇，四十年後，王家長子還獲頒母校百年紀念的傑出校友，特地回潭門去領獎。志如的期待在兒女身上得到滿足，也是她引以為傲的成就。

### 基督·力量

戲院歇業以後，志如忽然發現她的生活少了一些東西，那是深埋在心底的一個種籽，在她生活最困苦無望的時候，破土而出。

環顧四周，當初滿載希望與光環的戲院，終於在吞盡他們的錢財，壓垮了她的生活後，無聲的結束。眼前是四個營養不良的羸弱孩子，往後的日子要怎麼過下去？志如徬徨無依，父母不在身邊，丈夫不在身邊，她能依靠誰？

短短的老潭門街，由東西方神明共同守護著。

街頭矗立著主祀三官大帝的三元宮，是這個小農村最重要的信仰中心，也是典型的客家村廟。透過題丁，幾乎全村的村民都被整編進這個信仰網絡裡。村民在享受神明庇祐的同時，也必須負起祭祀活動與組織。但志如不曾進廟堂裡參拜祈福，她與她的丈夫在大陸時期就已是基督的信徒。

與戲院同一年成立的天主教天主堂，還棲身在街上的三間民房裡，朱神父在那裡傳播福音。五十四年，德依慈神父將天主堂搬到街尾原來車站的舊址，聖母瑪利亞聖潔的塑像慈愛地立在莊嚴的教堂外，迎接著每個來此的人們，不論他們的目的是什麼。志如曾經帶著孩子領過天主堂的救濟品，卻無法領受福音，而志如的長女則因為成長過程中與天主堂較接近而受洗，志如也未干涉。

「父親！」志如想起童年時與母親參加的佈道會，想起醫好她母親的牧師與天父：

<sup>152</sup> 引自江志如的訪談稿，2007.05.11。

在走投無路之際，我才想到天上還有位父親，祂必不撇下我，於是我接受了主耶穌作我的救主。<sup>153</sup>

基督教才是她熟悉的，也是她與逝去的歲月、離別的鄉土、牽掛的母親的聯結。

基督教傳入中國，最早的記載可上溯到唐朝的景教，其後因文化、國情或內部紛爭等原因，歷經多次教難，以及反教運動。民國成立以後，憲法保障宗教信仰的自由，而且開國元勳如孫中山、蔣介石等人，多為基督教徒，因此基督教在中國有長足而快速的發展。改變過去帶有侵略性質的傳教方式的基督教，除了廣設教會，推動社會慈善活動，普設各級學校、孤兒院、醫院等多項社會事業，也成立國民拒毒會等組織，推動戒煙禁賭，輔導妓女從良等社會改良工作，逐漸博得中國人民的好感與信任。<sup>154</sup>民國二十四年，信徒已有五十萬人之多。<sup>155</sup>抗日戰爭後期，中國戰亂嚴重，基督教在中國大陸的宣教受阻，轉而往香港、台灣、南洋等地發展，其中長老宗更在一百多年前就已先登陸台灣宣教。民國三十八年大陸轉赤，許多人離鄉背井隨國民政府遷台，生活困苦，心靈惶然，基督教適時提供撫慰，教會倍增，教徒日眾。

那時，老潭門沒有基督教會，新潭門才有。新潭門的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成立於民國四十五年，每週的禮拜日有客語及國語發聲的宣道。

第一次進教會，志如還是十三歲的少女，時光飛逝將近三十年，四十歲的志如重返教會，只是這回陷在困境中的人從母親換成了她自己，兩間教會也隔了一重海洋。

戲院停業前後，是志如最絕望的時期，她一定得去教會尋求慰藉，她一定要坐公車去新潭門才行。

民國四〇、五〇年代，連腳踏車都是奢侈品，每輛腳踏車都有牌照號碼，而且還必須繳納乙種車輛使用牌照稅，一般家庭能擁有一輛就很了不起了。因此在那窮困的年代裡，尤其是鄉下地方，鄉民進出除了以腳踏車代步，就是搭乘客運。新竹地區的汽車運輸始於日治時期，約略是大正八年（1919）左右，當時「台灣軌道株式會社」從昭和四

<sup>153</sup> 引自江志如的投稿文章〈靠主渡過難關〉，刊于教會的月刊。

<sup>154</sup> 李道生，《聖經與中國文化》（台北：基督教中國主日學協會，1987），頁 211-230。

<sup>155</sup> 查時傑，〈一百七十年來的基督教〉，收入林治平編，《基督教入華百七十年紀念集》（台北市：宇宙光，1987），頁 24。

年（1929）開始兼營客運的業務，昭和十五年（1940）專營桃竹苗地區的客運業務，光復後隔年即更名為「新竹汽車客運有限公司」，並改組為公、民營，民國三十七年再改組為純民營公司。民國四十一年，新竹客運在潭門設站，站房及車票代售處均位於要道上，有通往潭門各村落的班次，也通往鄰近的桃園及新竹市。<sup>156</sup>

戲院停業前後，是志如經濟最拮据的時期，要挪出上教會的車錢談何容易？車錢不夠，志如只帶了長子同去。志如在新潭門教會裡，由莊音成牧師為她施洗。<sup>157</sup>長子受母親影響，日後在台北就讀國防醫學院時，也被吸收到地方教會，即聚會所。至於三個女兒，因為沒有這個因緣而未信仰基督教，志如也不強求，像長女信仰天主教，次女則信奉一貫道。

受洗後的志如，彷彿重生。面對逆境，她不再只是抱怨，不再只是惶恐。她試著讓自己相信眼前的艱辛，是神的考驗，是神的磨練，在困局之後必有神安排好的出路，只是必須先渡過這道關卡才能看到路指向何方。持著光明和希望的心境，志如熬過黎明前的黑夜：

自從我信靠了祂，內心裏便有了一股無比的力量，使我有勇氣去面對一切困難，並充滿了信心與希望。<sup>158</sup>

困苦的日子並沒有因志如虔誠的祈禱而改變，不同的是，志如除了寄託在孩子身上的希望，又多了一分穩定的心境。這樣又過了二、三年，志如終於得到一份正式的工作，而且月薪頗豐，逐漸改善了家境。

有一天，王先生巧遇故友，老友相見自然格外關心對方處境。在知道王先生到台灣以後的不順心，故友立即表示可以幫忙安排工作，原來他是台元紡織竹北廠的人事主任。五〇年代，紡織業受惠於政策的保護，成長快速，員工工作平穩，紡織界是一片欣欣向榮，當時社會上普遍將紡織廠工人視為「高尚」的職業。不過，王先生學歷不高，手會抖，字寫得不好，沒辦法在工廠裡安插位子。被拒於門外的王先生馬上就帶學歷較

<sup>156</sup> 參考資料來源：《潭門鄉志》，頁 101-103。新竹客運股份有限公司，2007，〈新竹客運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簡介〉，網路資源，<http://www.hcbus.com.tw/fpage01.htm>，2007 年 5 月 16 日。

<sup>157</sup> 「莊音成」是假名。莊音成牧師，新竹縣峨眉人，1895-1984。1957 年至 1964 年受聘至潭門教會傳教。

<sup>158</sup> 引自江志如的投稿文章〈靠主渡過難關〉，刊于教會的月刊。

高、寫字端正秀麗的志如去報名。

民國五十五年，剛過完農曆新年，志如被通知在正月初十報到上任。那是一份管理女工宿舍的舍監，職稱是書記工，月薪八百元。這份薪水對當時的王家來說，算是非常豐厚的，但是有個棘手的問題，因為舍監的工作性質特殊，不能天天回家，那孩子們怎麼辦呢？雖然一週只能回家一天，但窮困的日子真的是過怕了。說不定這就是天父指點的出路啊？怎能不抓緊這難得的機會呢？爲了貼補家計，志如狠下心腸選擇了工作。

那時，老潭門的家裡，或說是戲院裡，只剩下三個孩子住。雖說孩子們不是第一次面臨這種父母都不在家的情況，但是得長期自立自強卻是頭一遭。王先生仍在台北工作，放假才回家。四個孩子，長女在台北讀大學，早住校去了，可是還有三個孩子需要媽媽的照顧。長子當時還是新竹中學二年級的學生，必須每天早起從潭門通車到新竹市上學；次女唸潭門中學，才初中的年紀；么女連小學都還沒畢業。爸媽不在，姐姐不在，長子只得充當起「家長」，放學回家煮飯給妹妹們吃。三個半大不小、尚需母親照料的孩子，就這樣「自己吃、自己住」地過了一年半的「獨居生活」。<sup>159</sup>而長子在大學聯考上依然表現得令人喝采。

因爲校長夫人的護航，志如才得以進學校當約聘廚工，但她決定接受舍監的工作後，便向學校辭職：

臨時工有工作才有錢，做得好，但沒辦法升正式編制，暑假休兩週上台北找工作，當有管吃管住的保母，學校開學再回來。去台元當舍監，辭去臨時工，老師還說「斷了我的左右手」。<sup>160</sup>

志如對自己的能力與信心，將在新工作中將得到更大的發揮與實質的回報。

## 鄰里·印象

去當舍監的志如，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幾個孩子，雖然說「遠親不如近鄰」，但志如並沒有麻煩鄰居代爲照顧：

<sup>159</sup> 該處標楷體引文引自江志如的訪談稿，2008.03.14。

<sup>160</sup> 引自江志如的訪談稿，2007.05.11。



沒有，沒有麻煩鄰居，他們自己吃自己住。我們做人不要想去佔人家便宜，人家才會願意跟你往來。<sup>161</sup>

與鄰居相比，志如家的貧困在鄰里間是出了名的，她不願意讓別人說閒話，而且在那艱苦的年代，大家都不好過，怎能將自己的責任加諸到別人肩上去呢？

街上都是客家人，他們很勤儉，每個人都有工作，沒有人閒著。像對面的吳家，就是借我錢的吳先生，他白天上班，下班了還賣醬油，他太太在家裡也種菜、做家庭副業的，都沒有閒著。那些客家人每家都有種菜，養雞養豬，養在家後面，沒有種田，白天有工作，家裡還有種菜，他們都很辛苦，生活是比我們好過得多。<sup>162</sup>

志如的嚴守分際，包括鮮少到鄰家串門子，只在街上打招呼或是聊天，避免逾越那道無形的牆。但是客家鄰居的友善，讓貧困的志如感到自在與自尊：

客家人很好，因為他們不會勢利，不會因為你窮就瞧不起你或是疏遠你。外省人比較會。<sup>163</sup>

在街上還是有少數的外省人居住，志如與開牛皮工廠的一家較為熟稔，也有比較好的情誼：

外省人不多，有軍眷但不多，我們沒有來往，他們住潭門街上比較遠。有個外省人開牛皮工廠，有來往。<sup>164</sup>

開牛皮工廠的，也是外省人，他們的生意也是不好，後來撐不下去要搬到台北，我就拿救濟的麵粉做了幾十個饅頭送給他們，讓他們在路上有得吃。後來，他們到台北生意做起來了，而且做得很好，他們跟我說很謝謝我，因為我送他們饅頭嘛，饅頭是發的東西，代表「發」啊。其實那是我家鄉的習慣，有鄰居要搬走的時候，我們要做糕，讓他們帶去新的地方分送鄰居，幫他們在新地方打好關係，有好鄰居。<sup>165</sup>

<sup>161</sup> 引自江志如的訪談稿，2008.03.14。

<sup>162</sup> 引自江志如的訪談稿，2008.03.14。

<sup>163</sup> 引自江志如的訪談稿，2008.03.14。

<sup>164</sup> 引自江志如的訪談稿，2007.05.11。

<sup>165</sup> 引自江志如的訪談稿，2008.03.14。

街上大多是客家人，爲了與左鄰右舍保持禮貌而友好的往來，志如努力學習語言融入當地生活：

我們剛到台灣的時候講家鄉話，不會說國語，是小孩上幼稚園學ㄅㄆㄇ，我們才跟著學，跟著學講國語，到現在都還講得不好啊，不標準。跟鄰居聊天，他們都講客家話，我就跟著學，我講得不好，只能講一些，但我會聽，都聽得懂，他們講，我就聽；我先生他也聽得懂，不會講；小孩子都會講。他們上學，上課的時候，老師講國語，學校同學下課都講客家話，所以他們都會講，講得很好。<sup>166</sup>

語言是溝通的重要工具，也是分享深層文化的重要媒介。志如也從客家美食學起，比如端午節鄰居與她分享客家粽，她就做福州粽回敬，只是客家鄰居吃不習慣；又如鄰居做「水粄」送她，她就知道「水粄」這孕涵豐富文化意義的食物。

生活是潛移默化的，志如眼見斜對門的蘇姓醫生大清早就拿著掃把掃街道，還有初中男老師清溝渠，這樣的畫面讓她相當震撼：<sup>167</sup>

我們那個年代比較傳統啦，我覺得男人怎麼會做家事呢？他們不做的，我先生就不做啊，從來不做，很大男人，都是我做。<sup>168</sup>

志如曾是千金之軀，家事既不是夫人小姐的事，更不會是老爺少爺的工作，落難之後，志如不得不挽起袖子做家事，但心裡總覺得是件丟人的事：

我學著鄰居拿掃把出去掃門口，掃了一下，遠遠看見有熟人走過來，我嚇得趕快跑進家裡面。很丟人啊，我覺得這樣很難為情，居然自己拿著掃把掃地。<sup>169</sup>

但客家鄰居的勤奮、踏實、愛清潔，也說服了志如放下身段，將這些日常灑掃視爲生活裡自然的一部分，而且這個習慣一直保持下去。志如對客家人的好感，從街坊鄰居延伸到日後宿舍裡的客家女工身上，她深深相信客家人在這些方面遠勝過閩南人和外省人。

<sup>166</sup> 引自江志如的訪談稿，2008.03.11。

<sup>167</sup> 就田野調查所知，潭門老街上有三名醫生，分別是邱、蕭、范姓醫生，並無江志如所言的蘇姓醫生，依其所指可能是范姓醫生。

<sup>168</sup> 引自江志如的訪談稿，2008.03.11。

<sup>169</sup> 引自江志如的訪談稿，2008.03.11。

### 第三節 飛躍的經濟・落地的家族

#### 舍監・蛻變

民國四〇年代的台灣，是苦難的年代，也是黎明前最黑的夜。日治時期，日本對台灣的殖民政策是「工業日本，農業台灣」，因此，光復後的頭幾年，台灣還是傳統的農業社會，人民生活普遍窮困。日本雖然將台灣經濟產業定調在農業上，但不論在基礎建設、社會治安、金融制度、教育制度等都已有了初步的基礎。民國三十八年（1949），國府播遷台灣以後，經濟形勢仍十分惡劣，政府推動一連串土地改革，花費八年的時間才告成，改善農家生活，也提高農業生產力，為社會安定及接下來的工業發展做好準備。土地改革是台灣經濟和社會結構轉變的決定性因素，政府也將經濟發展方向規劃為「以農業培植工業」，並採取進口替代工業，以節省外匯，並增加就業機會。四〇年代土地改革的努力和美國經濟的援助，成功將台灣推進五〇、六〇和七〇年代的工業社會。<sup>170</sup>

民國五〇年代，台灣開始進入經濟起飛的階段，層雲間已透出希望的晨曦。台灣最大的優勢就是高素質又廉價的人力資源，當時的世界政經局勢恰好對台灣有利，使得大量的外資和訂單湧入，助長了台灣走進以勞力密集為主的工業社會。需要大量人力的輕工業加工廠進駐農村周邊，迅速吸收了農村的多餘人口，但工廠的工資優於務農所得，使得工廠像個磁力超強的磁鐵，農村裡連基本的農業勞動力也守不住，往往一個家庭只剩一、二個人專事農耕，其他人紛紛投向工廠的懷抱，造成農村人口嚴重外流，向都市集中。

當時全島都陷入工業化的洪流中，潭門自然也無法置身事外，村裡的年輕人如螞蟻般成群結隊地往城市移動，這也是為什麼光榮戲院經營不下去的一個原因之一。終於，這股工業風也吹進志如家裡去。

民國五十五年，大年初十，過年的喜氣還沒遠離恬靜的小農村，窮到谷底的王家，

---

<sup>170</sup> 陳正茂編著，《台灣經濟發展史》（臺北：新文京開發，2003），頁 169-193。

喜憂交織。志如提著行李，再三囑咐，萬千叮嚀，才依依不捨地揮別孩子們，離開寂寥的街，坐上開往竹北的客運。客運載著她奔向她夢寐以求的正式工作，也拘著她衝向她不敢多想的挑戰。志如五味雜陳的心情，就像當年紅遍大街小巷、由葉俊麟作詞的閩南語歌「孤女的願望」，離鄉背井只爲了求一個希望，爲了將來，現在必須忍耐。<sup>171</sup>忐忑不安的志如反覆咀嚼著當初說服自己來的理由：每月固定而豐厚的薪水對家裡的經濟助益不小，而且聽說舍監的工作非常輕鬆。志如更不忘在心裡祈求天父幫助她。

民國五十五年，四十一歲的志如，進入台元紡織公司竹北廠，開始她十八年的舍監生涯。

光復初期，台灣的紡織業並不成熟，自通貨膨脹時期到大陸淪陷前，許多上海資本流入台灣，連機器也運來台灣，短短幾年間，台灣的紡織業興盛起來。當時有六家紡織廠都是大陸資本：公營的中國紡織公司、上海來的「台元」、「申一」；湖南湖北來的「大秦」、中國銀行的「雍興」、交通銀行的「台北」。<sup>172</sup>那時國家的外匯不夠，政府決定發展進口替代工業，紡織業就是政府積極培植和保護的工業之一，另外還有電力和肥料工業。<sup>173</sup>其中就屬紡織業引起最多爭議和攻擊，當時擔任台灣區生產事業管理委員會副主任暨中央信託局長的尹仲容甚至被污蔑爲「官商勾結，圖利大陸資本」。<sup>174</sup>但後來證實紡織業的成就影響台灣經濟最爲深遠，直到民國七〇年代，紡織業都還是台灣最大的出口產業。<sup>175</sup>

台元紡織公司曾是台灣紡織界的龍頭，是由上海來台的大陸人士嚴慶齡、吳舜文夫

<sup>171</sup> 「孤女的願望」歌詞如下：

請借問播田的田庄阿伯啊，人塊講繁華都市台北對叨去，阮就是無依偎可憐的女兒，自細漢著來離開父母的身邊，雖然無人替阮安排將來代誌，阮想要來趕都市做著女工度日子，也通來安慰自己心內的歎微。／請借問路邊的賣煙阿姐啊，人塊講對面彼間工廠是不是，貼告示要用人阮想要來去，我看你猶原不是幸福的女兒，雖然無人替咱安排將來代誌，在世間總是著愛自己打算恰合理，青春是不通耽誤人生的真義。／請借問門頭的辦公阿伯啊，人塊講這間工廠有要採用人，阮雖然也少年攏不知半項，同情我地頭生疏以外無希望，若是少錢也要忍耐三冬五冬，爲將來爲著幸福甘願受苦來活動，有一日總會得著心情的輕鬆。

<sup>172</sup> 溫曼英，《吳舜文傳：中國最有影響力的女企業家》（臺北市：天下，1993），頁 211。

<sup>173</sup> 王作榮，《我們如何創造了經濟奇蹟》（臺北市：時報文化，1978），頁 23-26。

<sup>174</sup> 溫曼英，《吳舜文傳：中國最有影響力的女企業家》（臺北市：天下，1993），頁 212。

<sup>175</sup> 溫世仁，《台灣經濟的苦難與成長》（臺北市：大塊文化，1997），頁 30。



婦所創辦，由吳舜文出任董事長。民國三十八年，國民政府遷台時，一批批大陸商人隨政府登陸台灣，嚴慶齡、吳舜文夫婦也是其中之一。嚴慶齡在上海經營泰利機器製造廠，開發出整套性能良好的紡織機器，正當他們想自辦高獲利的紡織廠時，共產黨的魔掌已伸向上海，他們決定到台灣設廠。經過勘察與評估，嚴慶齡夫婦向新竹縣議員范糧進買下竹北的十甲腹地平坦、後有靠山的土地，未來很有延展性，不過，竹北在當時尚未開發，既沒電也沒有公路，他們分擔了部分基礎建設的經費。台元紡織廠最初的工作母機、一萬零三百六十八紡錠和紡錠設計圖樣等都來自上海泰利，民國四十年九月正式揭牌運轉。<sup>176</sup>

台元能在紡織界獨領風騷二十年，固然有主客觀因素，但與吳舜文的領導理念也有明顯的關係，對員工而言，最切身的當然就是員工福利。

紡織廠工人的待遇雖好，但紡織工廠的廠房溫度相當高，夏天的溫度甚至有攝氏四十二度之譜，工人得在有如烤箱的廠房裡汗如雨下的工作十小時，甚至加班到十二小時，體力不佳的女工甚至會昏倒。吳舜文為員工的健康、生活品質著想，民國四十九年，首創八小時三班制，而且薪水不變，結果工作效率反而提升。又考慮到工廠有八成以上的年輕單身女工，公司提供交通車接送，保障安全。此外，還建一棟設備齊全又舒適的宿舍，配有中央空調，每樓設有交誼廳以及昂貴的電視——民國五十一年台視開播時，一台黑白電視要價台幣五千元，一般家庭根本買不起。十二人一間的房間，粉紅、淡藍的牆壁顏色令女工居處其間更覺舒適愉快。<sup>177</sup>員工餐廳備有大型冷凍庫，提供新鮮飲食。廠區裡還有籃球場、排球場、圖書館、美容院和電影放映室等休閒設施。提供免費的在職訓練外，也與高職建教合作，鼓勵初中學歷的工人利用工餘時間至高中進修，以提升工人素質。吳舜文能夠將心比心，重視員工福利，普遍得到員工的向心力，有位廠房主管曾對同業說：「我們的工人覺得，待公司好就是待自己好。」這也就是為什麼同業即使用高薪都挖不走台元的工人，台元也因優質穩定的人力資源而日益茁壯，公司成立三十年後，達到顛峰，廠房、員工和紡錠數量都增加八倍，業務範圍也由上游的紡紗、

<sup>176</sup> 溫曼英，《吳舜文傳：中國最有影響力的女企業家》（臺北市：天下，1993），頁 97-139。

<sup>177</sup> 溫曼英在《吳舜文傳》中提及宿舍是六人一間房，但根據江志如的說法是一間房有六組上下舖的床，是十二人一間房。見溫曼英，《吳舜文傳：中國最有影響力的女企業家》（臺北市：天下，1993）。

織布，擴展到下游的針織、成衣、製線和染整。<sup>178</sup>台灣經濟發展不斷轉型，屬於傳統產業的紡織業終將走向沒落，但台元以其前瞻性和多角化的經營而成功轉型，並與嚴慶齡創辦的裕隆汽車合併成裕隆集團，至今仍屹立不搖。台元與台灣經濟一同成長，也見證台灣經濟的起飛。

五十五年到台元的志如，眼前的女工宿舍還是一棟平房的建築，她將要在此管理一百多名女工，從生活內務到心理輔導全都得包辦。志如原是一名家庭主婦，雖然經營過戲院、做過廚房臨時工等，但不曾與那麼多人密切的接觸；現在她每天都得在來自各地、不同背景、心細易感的女人圈中共同生活，而且是與她們對立的管理者，這日子該怎麼過呢？志如這才嚐到舍監工作的箇中滋味，人家說的「輕鬆」，「僅止於不做粗重的工作罷了」。<sup>179</sup>

志如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思量著該如何發揮「舍監」這個角色。嚴以律己的志如心想：宿舍是來自各地員工在異鄉棲身的家，應該讓宿舍像一個和樂的大家庭才好。如果宿舍是一個家，那麼舍監就是這個家的家長，是這百來名女工在外地的監護人。志如期許自己「以慈母的心情帶給宿舍溫馨」，不過自我要求高的人當起管理者來，自然也成了求好心切的「嚴父」，她盡全力改善宿舍裡的缺失：

當時最令人頭疼的事，是員工的生活習慣不良，愛亂丟紙屑果皮，而且有些人

對我懷有敵意——由於立場不同，我是管理的人，她們是被管理的人。<sup>180</sup>

立意是良善的，但現實上要干涉、約束、改變眾人習以為常的行為，哪有這麼容易呢？

俗語說：要自己做好，容易；要別人做好，卻難了。因此，精神上我受著很大

的壓力，好像有個無形的十字架，日夜揹在身上，我感到好累！好苦！<sup>181</sup>

爲了家庭經濟，志如不得回家，一顆心掛慮著孩子，強忍著相思之苦，勉強自己面對工作上的挑戰，但不時受到女工們的刁難閒語，心裡累積的情緒逐漸滿溢。每逢週六休假

<sup>178</sup> 溫曼英，《吳舜文傳：中國最有影響力的女企業家》（臺北市：天下，1993），頁210-221。

<sup>179</sup> 該處楷體引文引自江志如的投稿文章〈以慈母的心情帶給宿舍溫馨 從四個孩子的媽媽到成爲數百人的家庭人生舞台演好自己角色做什麼像什麼 看重自己關心他人發揮潛能〉，刊于《工廠之友》。

<sup>180</sup> 引自江志如的投稿文章〈以慈母的心情帶給宿舍溫馨 從四個孩子的媽媽到成爲數百人的家庭人生舞台演好自己角色做什麼像什麼 看重自己關心他人發揮潛能〉，刊于《工廠之友》。

<sup>181</sup> 引自江志如的投稿文章〈以慈母的心情帶給宿舍溫馨 從四個孩子的媽媽到成爲數百人的家庭人生舞台演好自己角色做什麼像什麼 看重自己關心他人發揮潛能〉，刊于《工廠之友》。

回家，志如如逃難一般地逃離宿舍，委屈、焦躁的情緒也在安全的家裡宣洩，甚至潰決：

有一次跟他（按：指王先生）大吵一架，責罵他沒有出息讓太太外出工作受苦

。182

擔起「家長」職責的長子，雖然還是個高中生，但已頗為早熟地安慰志如，給她畫了一片可預見的藍天：「這是過渡期，等姊姊大學畢業，媽媽就可以辭掉工作了。」看著被環境磨練成才的乳臭孩子都比自己勇敢，一心想逃避的志如也只能把苦往肚裡吞。牢騷歸牢騷，再多的不滿碰到現實的貧困，也只能「認命」。<sup>183</sup>

每月八百元的薪水，家庭經濟的重擔也就逐漸轉移到志如肩上，成為經濟支柱。面對工作上的不順遂，又因為經濟壓力而無法逃避，「天父」依然發揮著支持的力量：「好在我是個基督徒，我常常祈求主耶穌幫助我，賜給我力量」。過去幾年的苦難都能熬過來，難道這點磨折就要把我逼回原來的生活，讓孩子們繼續過無望的日子嗎？想當初去學校廚房當臨時工，不也是被大家看衰？被大家敵視嗎？我還不是讓那些人心服口服？志如那股不認輸的能量又醒來了，她謹奉著八字箴言：「看重自己，關心別人」，咬著牙繼續前行：<sup>184</sup>

我不做任何辯解，只讓時間來告訴她們，我不是兇神惡煞，而是母親的化身。<sup>185</sup>

重整心態以後，志如的潛力慢慢地展現，與女工們的隔閡消除了，在大家的合作下，宿舍裡的髒亂無容身之地，各項改進工作也順利推動。久而久之，女工們養成自愛、自律的習性，在這樣的氣氛中耳濡目染，新進成員也更受教、樂於配合。志如成功地將工作推上軌道，第二年的薪水竟然調漲成一千二百元，這可是別人要花三年才能累積到的調幅。每週休假回家的次數也增加為兩次，每週三、六都能回家與家人相聚。

讓自己從四個孩子的母親「晉升」為數百人的家長，志如愈來愈樂在工作，五十八

<sup>182</sup> 引自江志如的投稿文章〈以慈母的心情帶給宿舍溫馨 從四個孩子的媽媽到成為數百人的家庭人生舞台演好自己角色做什麼像什麼 看重自己關心他人發揮潛能〉，刊于《工廠之友》。

<sup>183</sup> 該處楷體引文引自江志如的投稿文章〈以慈母的心情帶給宿舍溫馨 從四個孩子的媽媽到成為數百人的家庭人生舞台演好自己角色做什麼像什麼 看重自己關心他人發揮潛能〉，刊于《工廠之友》。

<sup>184</sup> 該處楷體引文引自江志如的投稿文章〈以慈母的心情帶給宿舍溫馨 從四個孩子的媽媽到成為數百人的家庭人生舞台演好自己角色做什麼像什麼 看重自己關心他人發揮潛能〉，刊于《工廠之友》。

<sup>185</sup> 引自江志如的投稿文章〈以慈母的心情帶給宿舍溫馨 從四個孩子的媽媽到成為數百人的家庭人生舞台演好自己角色做什麼像什麼 看重自己關心他人發揮潛能〉，刊于《工廠之友》。



年，長女終於大學畢業，可以分擔家計時，志如的工作早已上軌道，捨不得放棄這份工作和工作所帶來的成就感與自信。

民國五〇年代是國內外經濟的黃金年代，受到高度保護的紡織業更是蓬勃發展，台元又因為率先實施三班工作制，工人需求增加三分之一，所以工廠的員工快速增加，宿舍不敷使用。民國六十年，原本的平房拆除，改建一棟有冷氣空調的五層樓房舍，可容納四百多人，宿舍的設備良好，住宿環境也更優質。不過光是硬體好是不夠的，生活裡盡是細膩感受的累積，軟性的生活空間也扮演成敗的關鍵，志如將宿舍經營得雅致又整潔，讓女工們切身感受到公司的確與眾不同，而對公司報以更多的信心與忠心：

臺元廠能有今天這個規模，與人方便的交通車和一流的宿舍管理，實在是功不可沒。<sup>186</sup>

搶著進台元的工人愈來愈多，有時房間床位不夠睡，交誼廳還圍起來當房間使用。後來，有了建教班的女學生，又增建一棟相同形式、規模的宿舍，住宿的女工激增到七、八百人，最多的時候，兩棟宿舍加起來高達一千零一十三人。公司蒸蒸日上，志如的工作量也大增，還因此增加兩名管理人員。

這麼多人，要管理起來可不容易，在那沒有電腦的時代，光是要找個人都要費上一番工夫，但志如腦筋清楚，做事有條不紊：

要管那麼多人是不容易的事耶，可是我管得很好。那麼多人，誰叫什麼名字、住哪一棟哪一房哪一床，我通通清清楚楚，像電腦一樣都在我腦袋裡。<sup>187</sup>

原來，志如就是電腦，不過她之所以能如此神通，可不是光坐在辦公室就能做得到。志如事必躬親，在安排新進成員時，便很聰穎地整合了新生講習、內務訓練、楷模學習等技巧，來協助新成員適應以及遵守宿舍規範，同時也幫助自己對新成員有基本的了解與掌握：

有新的人進來，我一定會親自給她上一課，告訴她該注意的事。我們工廠不是包伙，是自助餐，就是每次吃飯都要拿錢，我告訴她如果妳沒有錢，可以跟我

<sup>186</sup> 引自羅〇〇（按：台元工廠建教班畢業學生）的投稿文章〈嚴師亦慈母台元紡織江阿姨 照顧員工溫暖了大家庭 工讀生來文獻上誠摯的祝福〉。

<sup>187</sup> 引自江志如的訪談稿，2007.10.21。



借，但不能偷。我也趁這個時候把她這個人記在我腦袋裡，然後帶她去寢室，她住哪一棟哪一層哪一室哪一床，我都記得清清楚楚，還教她怎麼折棉被才會整齊。……我一定會挑一個最好的，每個寢室都有一個室長，我會挑最好的室長來帶她，讓她養成好習慣。<sup>188</sup>

有的舍監會利用上班時間打毛線衣，當班時的志如很專注於工作，她坐在櫃檯後方，每有人進出宿舍或上下樓梯，她一定刻意張望，確認那個身影屬於誰，住哪層樓哪房哪床，她不斷利用各種機會訓練自己。因此，她自己主管的那一棟宿舍，她沒有不熟識的。

數百名女工當中，建教班的女學生特別惹她憐愛，因為志如喜歡她們努力、認真的精神：

建教班，就是國中畢業就來的，是高職學生，光復中學的。她們也是三班制，

下班就去上課，很忙。宿舍是一間十二個人，建教班的孩子比較乖，很好管。<sup>189</sup>

台元爲了提升員工素質，在工廠裡闢設教室，與新竹市私立光復中學建教合作，聘請該校老師到工廠裡授課。這群女學生都很年輕，工餘還要上課，壓力很大，更需要人照顧與關心：

據我所知，她除了暗地裏為孩子們理蓋被子外，還私底下關心一些心靈空虛的

女孩們，規勸善誘，無不用心致志，十年如一日。<sup>190</sup>

也許是「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心態吧，對待這些與自己女兒年紀相仿的女孩，志如不但以母親的慈愛來照顧她們的起居，也同時扮演嚴父，總是以「保持現狀，就是落伍」來鞭策她們，希望她們能吃苦耐勞，完成學業，不要誤入歧途。<sup>191</sup>

那時的女性都很早婚，宿舍裡多的是適婚年齡的女工，喜帖也就滿天飛。志如相信「禮多人不怪」，十分注意人際間的禮尚往來，總在女工們喜洋洋的時刻致贈一個微薄小禮，讓女工們感到窩心。錦上添花，固然博得大家的好感；雪中送炭，更能得眾。不

<sup>188</sup> 引自江志如的訪談稿，2008.01.16。

<sup>189</sup> 引自江志如的訪談稿，2008.01.16。

<sup>190</sup> 引自羅○○（按：台元工廠建教班畢業學生）的投稿文章〈嚴師亦慈母台元紡織江阿姨 照顧員工溫暖了大家庭 工讀生來文獻上誠摯的祝福〉。

<sup>191</sup> 該處標楷體引文引自羅○○（按：台元工廠建教班畢業學生）的投稿文章〈嚴師亦慈母台元紡織江阿姨 照顧員工溫暖了大家庭 工讀生來文獻上誠摯的祝福〉。

管是自小的家教觀念，或是基督教教她要「懂得愛人」，志如更不吝惜付出她的愛心，並且拋磚引玉：<sup>192</sup>

我工廠裡那麼多女工，喪事是比較少啦！但訂婚啊、結婚啊，不能不有所表示嘛！她們送我餅，我就送她們一個小禮物……有的舍監是不管、不送的，那麼多人送不完啊，但我覺得應該要有表示。還有，如果有生病住院的，我就去探望，送點慰問品。我就送一盒麥片，然後讓她們每個寢室自由樂捐一點，讓她們寢室的七、八個人這樣子拿去。<sup>193</sup>

諳於人情世故的志如，雖然以嚴格聞名，但也比其他舍監更受歡迎、更讓人懷念。不過，爲了這樣的人情交誼，志如每個月花在公關的開支可不少，引起丈夫的不滿，責罵她浪費、亂花錢，兩人時有爭吵，但志如不管，她自有想法。

雖然志如卯足全力面對五花八門的問題，多管齊下地經營這個大家庭，使宿舍呈現嶄新的氣象，但還是有許多隱藏的風險存在：

我運氣很好，十八年都沒出事。有四次很驚險，還好最後都沒事。年輕女工最常碰到感情問題，就會鬧自殺。有一次最驚險。有個做常日班的女工，常日班就是每天早上八點到下午五點半，和她同時進來的另一個女工，是輪轉班，就是早中晚三班輪，一個禮拜早班，一個禮拜中班，一個禮拜晚班，她們兩個很要好。我們舍監每天晚上要點名，十一點做常日班的女工躺在床上睡了，這很正常嘛，第二天早上檢查內務，她還躺在床上睡，也不奇怪，我就沒管她。後來她的好朋友也不知為什麼，就覺得一定要下來找她，才發現她服毒自殺，趕快來辦公室喊我。先送醫務室，再送醫院，醫生給她灌水啊洗胃，還好撿回一條命。<sup>194</sup>

還有一次令志如餘悸猶存，是護士在房間裡用電鍋煮藥，自己卻睡著了，電鍋燒乾，差點失火，還好醫務室正好要找護士才及時發現，沒有釀成悲劇。志如不但要解決問題，還得懂得「預防」的觀念。人多，問題也多，容易因細故而起摩擦，或是因繁重枯燥的

<sup>192</sup> 該處標楷體引文引自江志如的訪談稿，2007.10.21。

<sup>193</sup> 引自江志如的訪談稿，2007.10.21。

<sup>194</sup> 引自江志如的訪談稿，2008.03.14。

工作、想家、交友等各種心理壓力而鬧情緒，休閒的調劑能發揮穩定的力量，也提升宿舍的素質：

在她的管理下，……嚴格的內務要求，使得每位住宿人員養成廉潔、勤儉的好習慣，在工作之餘，更為提高生活素質，充實精神生活而舉辦國畫、書法、插花、縫紉、舞蹈……等社團活動，不僅有益身心，更調劑員工們緊張的工作生活。她曾以此為榮的說：「誰說我們這是『女工』宿舍呢？」<sup>195</sup>

工廠裡的不斷操作的工人是公司的寶，他們的付出為公司賺進驚人的盈餘；志如默默的付出，無形中為公司留住更多的人力資源。

志如七年來的優異表現並沒有被忽略，工廠的總務主任非常肯定她的能力與貢獻，打算將她拔擢為職員：

總務主任覺得應該要讓我升職，在每週一次的主管會議裡曾為我爭取，他說別的工廠的舍監都是職員，為什麼我們江小姐還是書記工？應該要升職員。<sup>196</sup>

廠長向人事主任諮詢志如的升遷案，人事主任卻默不作聲，志如的升遷也就胎死腹中。人事主任與王先生是朋友，也主動為志如安插工作，還告訴她「好好做，以後每年都會調薪」，隔年志如也的確得到大幅調薪。人事主任對志如仁至義盡，當然志如的傑出表現也沒失了人事主任的臉面，況且升遷案是由總務主任主動提出，也避免風言風語；而且，工人升職員，十分難得，人事主任卻在關鍵時刻退縮，工廠裡有人因此為志如抱不平。絆倒志如的小石子，其實是工廠內部人事上的複雜。原來人事主任手下有兩名年輕又能幹的女將，志如若是升遷，人事主任就無法對他的左右手交待，所以阻斷了志如的升遷之路。人事的複雜與紛爭浮上檯面，卻又迅速落幕，志如還是升上了職員：

事就有那麼巧，後來那個人事主管生病，不到四十天就死了，肝癌。總務主任又提要給我升職的事，因為換了人事主管，所以也就通過了。我就從書記工升到職員，那時工人要升到職員是少有的事。在我之前，工廠裡有一個男工人，也是我們基督教教友，他也升到職員，就我們兩個升，都是基督教的。你說巧

<sup>195</sup> 引自羅○○（按：台元工廠建教班畢業學生）的投稿文章〈嚴師亦慈母台元紡織江阿姨 照顧員工溫暖了大家庭 工讀生來文獻上誠摯的祝福〉。

<sup>196</sup> 引自江志如的訪談稿，2007.10.21。



不巧？所以很多事都是注定好的，強求不來的。<sup>197</sup>

這次的升遷終究是有了圓滿結果，志如歸功於是信仰基督的福報，也就更堅定她虔誠的心。熬過任職初期的苦楚，志如在工作上可謂春風得意，儘管一路上還是有許多荊棘待伐，仍然有無力感與倦怠感的浮現，但宗教力量繼續扶持著她，使她能穩健地在工作領域中耕耘與收穫。曾經寄望在孩子身上的一片天，不靠兒女，志如親手彩繪她自己的天空。

孩子曾是志如的天，在擔任舍監之前，一顆心全在孩子們的身上。她的管教嚴格，期望他們讀書、出人頭地。長期苦心的家教，使得孩子們即使沒有父母的督促，依然能在軌道上運行。志如離家到台元工作的頭一年半裡，當起「家長」的長子，兼顧了家務與課業，民國五十六年，順利地考取國防醫學院。

長女和長子都唸公費學校，免學費，每月還有些微的零用金，不用志如操心。他們兩人都離家住校，連同父親，三人都暫居台北。老潭門的家裡只剩下兩個小女兒，志如不放心，便把家門鎖了，在工廠旁租了屋，安置她倆，以就近照顧。週末放假時，全家人都回家相聚。那時，次女已從新竹女中休學一年，改讀私立中學，她每天從租屋處步行上學，不過時常蹺課，回家自己讀書，後來考取私立淡江大學。她昂貴的學費變成志如沉重的負擔和比較煩惱的事。

次女考上大學也離家了，只有小女兒還在志如身邊，志如乾脆把她接到工廠宿舍同住做伴，既可節省開支，也好照顧。跟著兩個姐姐腳步的小女兒，也唸新竹女中，每天坐台元公司的交通車，跟著其他員工的孩子一起進城讀書，為志如省下一筆交通費。但是，放學回到宿舍的小女兒並沒有合適讀書的環境。宿舍裡人多嘴雜，總是靜不下來；她要找母親也找不到，因為母親總是在忙。結果，小女兒的大學聯考考了三百多分，並不理想，為了不再增加母親的負擔，她選擇唸國立的台北藝專。

兩個小女兒都深知家境困難，讀大學時並沒有享受過大學生多彩多姿的生活，而是辛苦的工讀。平時在學校當工讀生，寒暑假就由救國團安排至工廠打工，收入都交給母親運用。當兩個小女兒剛成為半工半讀的大學生時，長女已公費赴美留學，在夏威夷大

<sup>197</sup> 引自江志如的訪談稿，2007.10.21。



學進修碩士；接著，長子也從國防醫學院畢業，繼續攻讀研究所。民國六十三年夏天，當兩個小女兒戴上學士帽，步出大學校門，志如長期背負子女的教育債終於畫下句點，家庭經濟也終於轉虧為盈。

## 高薪·支柱

民國六〇年代，台灣整體經濟比五〇年代更好，那時工廠工人的月薪約台幣四百元，大家都漸漸有些餘錢，中小企業崛起，經濟產業也有了些變化。紡織工業與塑膠工業帶動了石化工業的成長。<sup>198</sup>政府的經濟發展重心也轉向重化工業，並著重改善投資境，積極發展電力、交通等基礎設施，推動「十項建設」、「十二項建設」等重大工程，為台灣第二波經濟高峰預備了良好條件。<sup>199</sup>過去，台灣只能做代工，經過財富、經驗與人才的累積，台灣開始嘗試研發；在傳統工業之外，具有前瞻性的電子計算機工業也在此時出現。政府設立一系列的產學單位，積極推動資訊產業：在民國六十二年成立工研院，六十三年成立電子所，六十四年至六十八年設立 IC 示範工廠，六十八年政府與民間合資成立資訊工業策進會，同年年底成立新竹科學園區。<sup>200</sup>

不過，這個時期，台灣受到世界經濟因素的影響，經歷了兩次經濟成長停滯與成長滑落。民國六十二年十月，中東以阿戰爭爆發，阿拉伯國家以石油作武器，石油受到禁運及限運，並抬高石油價格，以致發生第一次石油危機，加上糧食輸出國旱災，造成全球性的缺糧，種種原因引發全球通貨膨脹，台灣在民國六十三年經濟成長率就從前一年的十三%直墜到一%。民國六十八年起是另一波長期的衰退，因為第二次石油危機以及世界性的經濟不景氣，經濟成長率從十四%溜滑梯到七十一年四%。不過，台灣的經濟成長率，還是高於美國或全球的平均成長率。<sup>201</sup>所以，六〇年代雖然發生許多令人憂心的大事件，包括兩岸第一代領導人——蔣介石和毛澤東的去世；美國與台灣斷交，

<sup>198</sup> 溫世仁，《台灣經濟的苦難與成長》（臺北市：大塊文化，1997），頁 38。

<sup>199</sup> 陳正茂編著，《台灣經濟發展史》（臺北：新文京開發，2003），頁 194-195。

<sup>200</sup> 溫世仁，《台灣經濟的苦難與成長》（臺北市：大塊文化，1997），頁 38-44。

<sup>201</sup> 趙文衡，《台灣崛起：從停滯到高飛的經濟躍升》（臺北市：御書房，2003），頁 128-129。

其他國家也相繼離去。在風雨飄搖中，台灣人民雖然惶恐，但更加努力。這個年代，仍稱得上是台灣的黃金年代，人民的生活條件已有大幅度的改善，而且基本的民生開銷已不再是家庭經濟的最大支出。人人充滿希望，而且幹勁十足地打拚。

志如到台元工作後，對家庭經濟的助益非常明顯，長女則是家庭經濟的另一支柱：

我去台元的時候，長女已經在台北唸師大，學費不要錢。後來她公費留美，來

回機票不用錢，食宿也不要錢，每個月還有一百美金零用金，她都寄回來給我

當家用，那時候一百美金合台幣四千多塊，很多啊！<sup>202</sup>

長女大學畢業後，雖未立即就業，但她公費留學時刻苦自己，而將零用金全數支援家裡。所以，不過兩年多的時間，拖欠一堆債務的王家，已有能力償還甘姓友人的債款，收回當初抵押掉的住家，並轉賣給街坊饒姓鄰居。王家從此漸漸脫離過去不堪回首的苦難日子。

民國六十年，長女學成歸國，在空運公司擔任進口部門的經理，擁有留美碩士的她工作能力很獲老闆賞識，薪水很優渥，而且她並不藏私，全數交給家裡使用。相較於長女，長子軍職的薪水並不高，加上早婚，自組小家庭，對家裡的經濟沒什麼貢獻。民國六十二年，努力了七年的志如，獲得升遷，在公司站穩了腳步，原本書記工的年薪只有十二個月，擢升職員後年領十八個月月薪，收入大增。而且孩子們也陸續大專畢業，有能力養活自己，甚至回饋家裡。民國六十三年，兩個小女兒同時大學畢業，投入職場，婚前工作的薪水也交回家裡。志如的經濟重擔終於卸下，王家過去的負債很快就還清，也不再拖繳地租的情形。王家的經濟自此轉虧為盈，有餘錢可存、可運用。

少女美在姿色，成熟的女人美在智慧與自信。進了台元以後，志如愈來愈有才幹、有自信，而且升任職員以後，總是一個小主管，因此，她非常重視自己的形象，將秀麗的容貌，出眾的氣質和優雅的裝扮結合得十分完美，讓女工們對她也心生孺慕之情：

認識她六年以來，對於她那淡雅合宜的裝束，舉手投足間都流露著中國婦女典

型的風範與韻味，以及她細膩的心思，深思熟慮，雅緻絕倫的氣質，真是佩服

得五體投地。<sup>203</sup>

---

<sup>202</sup> 引自江志如的訪談稿，2008.01.16。

所謂「人要衣裝，佛要金裝」，形象多少還是需要合宜的衣服打點，所以志如將收入挪出一部分做為治裝費，這看在丈夫眼中，又成了夫妻吵架的原因之一：

我那時候在台元，我先生常怪我愛買衣服，可是我是個主管啊，不能沒有幾件像樣的衣服穿。<sup>204</sup>

從王先生的眼光來看，志如很浪費，因為她時常買東買西，買衣服、買小禮物和補品送人，開銷很大。但以志如的立場來說，她這些開銷是必要的，因為她在努力經營她的事業，這些開銷是一種投資，得到的報酬不一定是有形可見的，也不一定是立即回饋的。夫妻倆的價值觀有落差，看不順眼的王先生，臭脾氣又發起來：

他就罵我亂花錢，罵得很兇，那時候○○（按：指次女）護著我就說離婚、離婚，其實我才不要離婚咧，那麼苦的日子我都熬過來了，我幹嘛要跟他離婚？<sup>205</sup>

志如的花費多，讓王先生不高興；志如的自信，更讓王先生恐慌：

他還懷疑我有外遇。有一次啊，他偷藏著凶器，可能是榔頭什麼的，準備把我敲昏。他在我要放假回家的禮拜六，提早從家裡出來坐車到工廠，偷偷跟著我回家，我都一個人走嘛，根本不知道他偷偷跟在我後頭。我在辦公室忙都忙死了，我一個人要管幾百個人啊，哪有空做什麼，我下了班就一個人啊，一個人回家啊，他看看沒什麼，後來才告訴我他當初偷偷跟蹤我。<sup>206</sup>

經濟支柱的角色對換，也使得夫妻間氣勢、地位都跟著改變。與其說王先生不信任妻子的堅貞，倒不如說是他對自己的不滿、無力與憤怒，而做出打壓妻子的心理投射。

王先生打從戲院生意不好，就離家在台北朋友的當舖工作了差不多二十年的時間，在志如到台元之前，他是家裡的經濟支柱。志如去台元幾年以後，收入遠超過丈夫，他們夫妻的角色也互相調換。民國六十幾年，王先生辭去台北的工作，終於回到潭門的家，志如一個禮拜可以回家兩次，夫妻總算是團聚在一起。沒有債務壓力，也沒有孩子學費的負擔，王先生又開創了事業的第二春，苦盡甘來，這是王先生和志如到台灣以後，所

<sup>203</sup> 引自羅○○（按：台元工廠建教班畢業學生）的投稿文章〈嚴師亦慈母台元紡織江阿姨 照顧員工溫暖了大家庭 工讀生來文獻上誠摯的祝福〉。

<sup>204</sup> 引自江志如的訪談稿，2007.10.21。

<sup>205</sup> 引自江志如的訪談稿，2007.10.21。

<sup>206</sup> 引自江志如的訪談稿，2007.10.21。



能享受最安穩無懼的日子了。

## 投資·起飛

是老天作弄嗎？回到潭門，王先生在家裡養雞，而且養得很好，不過這回他不是要經營農場，只是養來自家吃；更重要的是，他是家庭資金的操盤者——志如和長女的收入都交給他管理、投資，他教志如以打會的方式錢滾錢，快速累積財富：

我到台元的時候還只是個書記工，升遷後到我退休的時候每個月有兩萬五千元，那是二十四年前的事，算是高所得了。我的錢都交給我先生管，我先生做生意的，很會理財，他就教我在工廠裡來會，怎麼做怎麼做，我就聽他的……家裡開銷就用大女兒的，我的就拿來打會，賺了不少錢。<sup>207</sup>

打會，就是「民間互助會」，俗稱「合會」，是中國特有的民間金融制度。顧名思義，就是有一人發起，找幾個人出資，籌措一筆小額款項以為急用，事後發起人必須支付利息給其他襄助的成員。會的發起人稱為「會首」或「會頭」，其他跟會的成員稱為「會腳」。習慣上，會首有優先取得第一期會款的權利，不必競標，也負責收齊往後各期的會款交給得標人，所以起會對會首而言，具有較大的資金籌措空間。第二期以後，就由會腳競標，標金高者才能取得會款。得過標的會員稱做「死會」，不能再參加會期內的競標，而且必須在剩餘的會期裡支付利息。未曾得過標的會員稱為「活會」，才有權利參加競標，也可以一直收取利息。所以，如果沒有籌款需求者，就可以賺取利息；需要籌措一筆錢的人也能獲得滿足，可謂各取所需。

合會最早就是以籌措小額資金，解決急用為目的而產生，演變到後來，雖然原來救急的目的仍然存在，但功利目的也逐漸被挾帶進這個立意良好的方法裡，許多人將它當成高利率的儲蓄，貪圖高於一般金融機構的利息。既然貪求高利率，就有高風險。因為在民國八十九年五月立法管理以前，合會是一種不具法律效力的非正式契約，沒有強制力，會員各憑良心，彼此間也只能互信。如果會首收了會款沒有交給得標會腳，或是得

---

<sup>207</sup> 引自江志如的訪談稿，2007.10.21。



標的會腳收了會款後卻不見踪影，就稱為「倒會」。一旦被「倒會」，很可能血本無歸，然而限於沒有法律強制力，只能認賠。合會最常存在於親戚、朋友、同事之間，因此，一旦有倒會情形發生，不但錢財損失，往往連情份也賠進去，導致受害者產生個人及家庭問題，甚至可能引發社會問題，因此付出高昂的社會成本。雖然合會的風險如此之大，但在民間仍盛行不輟，倒會的案例也屢見不鮮。

志如很幸運地靠合會創造出資金，六〇年代全球性的通貨膨脹，讓王先生開始買黃金保值，後來王先生在長子自行購屋時，資助十五兩黃金。雙管齊下的投資，又逢上台灣經濟起飛的良好投資環境，短短數年，王家就累積可觀的財富。除了合會、買黃金外，王先生的另一項投資更是眼光獨到。六〇年代兩次石油危機引發通貨膨脹，也促使房地產買氣大增，因為投資房地產是抗通貨膨脹最好的方法，保值性高，更有增值空間。那時，王先生不但有能力將光榮戲院七十幾坪的地基買回，將近民國七十年的時候，還買了一間台北市房子。

民國七〇年代，台灣的外匯存底有五十三億美元以上，資金已然形成，許多產業都已是國際規模，台灣社會已徹底工業化，此外資訊工業崛起，帶領台灣經濟發展邁向更高層次。還有台幣從 40：1 升值到 26：1，許多存放在國外的資金回流，造成過多的游資，炒作土地與房價，走向奢侈的生活，追逐金錢遊戲，治安惡化，不過人民也因此有餘錢出國，走得遠，看得廣，社會風氣愈來愈開放，思想言論也追求自由。七〇年代的台灣，政治、社會各方面都轉變劇烈，包括黨外運動、示威、解嚴、開放大陸探親、蔣經國去世、國會諸公打架等。這是一個有錢卻混亂，容易令人迷失的年代。

王先生曾經是個成功的大商人，有生意頭腦，也有敏銳的生意眼光，到台灣以後卻時不我與，蟄伏了二十年。熬過漫漫寒冬，王先生以錢滾錢的方式，快速累積財富，開創保守穩健的新事業——投資不動產：

我們的錢就是買黃金啊，跟會啊，還有買房子。沒有貸款，都是付清，不是大房子，都是社區的小房子，不要一百萬。<sup>208</sup>

雖然房子總價不高，但王家在短短幾年內不只買一棟房子，而且不必借貸，可以推想其

<sup>208</sup> 引自江志如的訪談稿，2008.01.16。

累積的財力比起過去，已不可同日而語。將近七十年的時候，王先生以長女的名義，在台北市松山區，長女工作地點附近買下第一間毋須貸款的房子，往後幾年內，他又陸續為每個孩子留下一筆不用繳遺產稅的財富：

我們的房子都買在松山，這棟房子用我大女兒的名字，因為她幫家裡很多。後

來，我先生又買了其他的房子，都用孩子的名字，四個小孩每個人都有一棟。<sup>209</sup>

王先生落魄在香港時曾經說過：「我們做父母的沒辦法給小孩穿好的、吃好的，怎麼還可以打孩子呢？」他對孩子總有份愧疚，總有份責任，現在他鹹魚翻身，便積極為孩子們置產，但他也沒忘記相伴一生的老妻，他雖以孩子名義買房子，但並不立即交給他們，而是都出租：

雖然房子是給小孩的，但我先生說房租都要給我，等我去世以後，房子才是小孩的，或是房租再給他們。<sup>210</sup>

年輕時的志如曾經對丈夫失去信心，不論是夫妻恩情或是經濟能力，但老年的志如對於先生慢慢有了體諒、包容與感謝：

所以，我說我現在能享老福都虧我先生，我靠這些房租，扣掉外勞一年三十萬、看病啊，還可以過得去，不用小孩的錢。<sup>211</sup>

## 尾聲·退休

民國七十三年二月，志如退休。

將近六十歲的她光榮地卸下舍監的身份，開心揮別工作十八年的台元：<sup>212</sup>

我退休的時候是哈哈大笑，別人說我異常，人家退休，要離開工作那麼久的崗位，一定會捨不得，我居然是哈哈大笑。我要走的那天，另一個小姐（按：指舍監）在前面，後面的建教班學生從樓上排到樓下，我走出去的時候，她們全

<sup>209</sup> 引自江志如的訪談稿，2007.10.21。

<sup>210</sup> 引自江志如的訪談稿，2007.10.21。

<sup>211</sup> 引自江志如的訪談稿，2007.10.21。

<sup>212</sup> 江志如是民國十四年出生，但當初來台報戶口時，小叔誤報成十三年，所以依身分證上的生日計算，民國七十三年二月時，志如已屆六十歲的退休之齡。

部都鼓掌，我就哈哈大笑。做舍監太累了，可以退休了，我當然要哈哈大笑。<sup>213</sup>

打從志如到台元工作，她的生活重心就從家庭子女轉移到工作上，她全心全意地付出與奉獻，不當班的時刻也好，休假在家也好，她的心還是不停地轉著如何讓宿舍更好。心總是懸著，十八年全心的投入是夠累了，對於工作，志如沒有遺憾也不眷戀。這就是她，永遠向前看。

同年年底，無事一身輕的志如和丈夫鎖了家門，也曾是戲院的門。回首來時路，年輕不堪回首的困苦歲月，中年自信的高跟鞋叩叩聲，還有含飴弄孫的幸福相片，都在這老潭門街上，這曾是戲院的家。王家永遠的離開老潭門了，已邁入老年的志如和丈夫，搬到台北，與都在都市為生活奮鬥的子女們相聚。

民國七十六年起，台灣的政治環境起了重大的轉變。七月台灣解嚴，隔年開放大陸探親，多少拄著拐杖、鬢腳斑白的外省人絡繹於途，顫抖著身軀，踏上久違的故鄉。這一波波回游潮裡，也閃著志如的身影，她終於見著睽違三十多年、牽掛三十多年的娘家至親，她才明白當年他們夫妻離開上海，那幢大宅子不但給娘家一個安身立命的空間，還能靠收租金讓娘家弟弟妹妹有很好的發展與成就，甚至避過共產黨的清算：

我大妹……只有小學畢業，本來是小醫院的護士，她進補習班再讀書，後來當到北京○○醫院的護理長……因為信基督，就跟著醫療隊去韓國服務，回來得到共產黨的表揚，家裡還掛著毛澤東像。共產黨鬥爭的時候，我家是要被鬥的，他們說我家人不多，不能住那麼大的房子……他們本來還要鬥我弟弟，還好進到家來看到毛澤東相片，知道我妹妹是共產黨表揚的就算了，那時候我妹妹還在韓國。他們也要鬥我先生，我家人說我們已經到台灣來了，鬥不到了，他們又去找我先生的前妻，要鬥她。我先生前妻拿出我先生當初登報警告逃妻的報紙給他們看，說「我們已經離婚很久了」才沒被鬥到。<sup>214</sup>

逃過一劫的弟弟，也是讓志如最不放心的弟弟，當年從香港回上海以後靠著大妹在醫院籌措來的資金拜師學彈詞，竟也成了家喻戶曉的名伶，甚至因此覓得良緣，也改善了全

<sup>213</sup> 引自江志如的訪談稿，2008.03.14。

<sup>214</sup> 引自江志如的訪談稿，2007.10.21。「○○」醫院為匿名之故。

家人的生活：

我弟弟學了八個月就登台表演，在上海的小碼頭登台，很賣座，……那時候共產黨不准有電影什麼娛樂，只可以說書，所以很多人去聽書，就這樣一炮而紅，……錢多得他當枕頭來睡，每天抱著一包一包的錢。我的弟媳跟我弟弟是同事，也是說書的，很有名，……他們兩個結婚後一起登台，賺了更多錢，家裡生活也好過了。<sup>215</sup>

小妹在兄長的照顧之下，順利中學畢業，當了老師，也找到好的歸宿；連早逝哥哥的那一房都發展得令人欣慰，孩子都讀了書，在氣象台有一份很好的工作。娘家終於是出頭了，可惜志如的母親沒享到幾年清福。

分隔了三十多年，志如慶幸娘家的擔子終於可以真正的放下，但是弟弟卻向她抱怨：後來我弟弟還跟我抱怨他紅了以後照顧媽媽和小妹，結果小妹……都沒有回饋他。我想我這樣照顧家裡，照顧他，也沒有要他回饋啊！他應該要照顧媽媽，小妹那時沒出嫁，本來就應該由他這個哥哥照顧。<sup>216</sup>

雖然志如對弟弟的抱怨頗不以爲然，但她還是重新接續三十多年前照顧娘家的責任，雖然父母早已過世：

一開始我每年兩次，每次託香港的朋友轉寄一千美金給家人，一共五家，一個侄兒——我有一個哥哥，死了，是他的兒子；兩個妹妹，一個弟弟，還有一個是我先生的侄兒——是小弟的兒子。每家兩百美金，一共是一千。<sup>217</sup>

爲了匯錢支援娘家，志如夫妻倆的生活再起波瀾：

說到這事，我先生也罵我，說我一天到晚只想著娘家。是這樣沒錯，我是一直照顧娘家。後來想想，還好共產黨來了，我們去香港，才能把上海的房子送給我娘家，讓他們有地方住。<sup>218</sup>

三十多年前在上海，志如的娘家是他們夫妻不和的根源，未料已是白髮夫妻的兩人在台

<sup>215</sup> 引自江志如的訪談稿，2007.10.21。

<sup>216</sup> 引自江志如的訪談稿，2007.10.21。

<sup>217</sup> 引自江志如的訪談稿，2007.10.21。

<sup>218</sup> 引自江志如的訪談稿，2007.10.21。



灣再度爲此而爭吵，但不同的是，當年的志如只能忍氣吞聲，偷偷地恨在心裡，而今的她已非當年依賴丈夫的女人，她現在有本事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光明正大的照顧娘家。如果，當年沒有狠下心離開娘家、離開上海，志如不知道自己和娘家能有現在這樣好的光景嗎？

回鄉探親過後的外省人，幾乎都已不認得自己的親人和家鄉，變的不只是容貌的老殘，還有讓返鄉遊子說不出來的陌生感，許多人失望而回，更熄滅了長久以來落葉歸根的心願。台灣海峽分隔了兩岸，不只是地理上的、行政上的界線，更是文化上的、生活價值思惟的界線。阻礙回鄉的政治牆已經倒下，志如也沒有遷回上海，她仍然留在台灣這個打拚一生的地方，繼續打拚，她將約莫一百萬元的退休金，讓丈夫投進房市，爲孩子們投資第二棟、第三棟的房子。後來，這些房子乘著台灣七〇年代飆升的經濟發展，不停地增值，王先生在台灣的新事業終於是成功了，但沒幾年他就撇下志如離開人世。丈夫過世以後，志如重新整理她與丈夫長久以來的惡劣關係：

我現在想想，我先生以前也很苦，他的負擔很重，要養他的兩個弟弟，還要養我們，世道又不好，他的壓力很大，也不能怪他嫌我家的人，或是怪他脾氣暴躁。他父親、他奶奶的喪事也都是他在負責，負擔很重啊！他罵，就給他罵吧，我就忍啊，不然怎麼辦呢？我現在已經不恨他了。他死了，才不恨他啦！後來有想嘛，覺得不能怪他。<sup>219</sup>

對丈夫重新拾回一點信心，志如對孩子出人頭地的期望也開花結果：長女留學歸國即被延攬至空運公司當經理，直到榮退，只可惜「紅鸞星不動」。<sup>220</sup>長子讀完研究所，也被禮聘到大學任教；他的一雙子女在紐西蘭求學定居，女兒是自己開業的律師，兒子是復健醫生，皆已移民紐西蘭。次女與大學同學結成連理，夫妻倆都是老師，婚後，他們育有一對女兒；大女兒克紹箕裘，也成爲一名老師，小女兒從美國留學歸國後，在各級學校和補習班教授英文。至於小女兒與同校學長結婚，後來仳離，育有一女；她的小女兒是志如最小的孫女，台大畢業後赴美留學，在香港的銀行上班。

<sup>219</sup> 引自江志如的訪談稿，2007.10.21。

<sup>220</sup> 該處標楷體引文引自江志如的訪談稿，2008.01.16。

一對上海夫婦，因為大時代的變亂，落腳台灣的小農村，他們的光榮戲院為民國四〇年代的老潭門寫下一方印記，他們的家族也為民國五〇、六〇年代的老潭門留下一頁逆境奮鬥的傳奇。更重要的，你找不到他們，因為他們喝台灣的水，吃台灣口味的菜，說道地的客家話，浸淫在台灣的文化裡，他們已自然地成為台灣的一份子，只是移民歷史尚短，目前到第四代。雖然有的子孫到國外發展，但是大多數的子孫還是會在台灣繁衍下去.....第十代.....第十七代.....第二十三代.....。

江志如的生命敘事暫時至此，從下一章起，我們將進入理性分析的層面，分別從移民適應、接納移民的地方社會，以及女性主體性的角度，更透徹地理解江志如生命圖像所傳達出的意義。



### 第三章 「竹籬笆」內外的移民適應差異

在前面，我們花了相當長的篇幅嘗試勾勒出一位上海女性移民的生命故事，試圖宣告一個鮮為人知的外省人典型。

「外省人」原本是相對於「本省人」的客觀稱呼，而且在中國任何省分都存在，但特殊的歷史時空脈絡，使得外省人在台灣成為一個專有名詞，指稱那些台灣光復以後數年間自中國大陸來台的漢族移民。他們之所以被稱為「外省人」，只是因為政府的戶籍管理規定在身份證上加註本籍，非台灣省各縣市及台北市、高雄市者即成了「外省人」。然而，此一集合體的成員差異性極大，來源遍及中國各省，個人背景及社會位置也具有多樣性，他們被納進外省人族群，不過是在同一時期裡做出同樣的遷移行動。所以，外省人是一個高度異質的集合體，他們之間並未產生我群的感受與認同。<sup>221</sup>既然我們說「鮮為人知」的典型，必然是有一個相對應的普遍性或代表性的典型，是的，不論社會認知或是學術研究都會同意最具有代表性的外省人是眷村。這樣說來，這批移民至少被粗分為兩類，住眷村的外省人與不住眷村的外省人，也就是集居與散居的外省人，而這也正是移民適應新居地的兩種相對的典型。

本章我們嘗試回歸移民適應的層面去理解外省人，我們將看到適應策略不同所產生的發展與限制；從集居的移民能輕易被指認，我們將能明白眷村為何會成為外省人的代稱；最後，江志如是散居移民的一種典型，它存在的意義正是使我們認知外省人是異質的集合體，是移民。

---

<sup>221</sup> 張茂桂指出，解嚴前後，台灣緊張而對立的政治環境，以及本土化的呼聲與行動，強化了「外省人」一詞的特別意涵，令已在台落戶安居幾十年的「外省人」產生被排斥、被污名化的負面感受與危機感，反而開始產生我群的意識與認同。見張茂桂，〈省籍問題與民族主義〉，收入張茂桂主編，《族群關係與國家認同》（台北：業強，1993），頁 233-278。

## 第一節 移民適應的概念

遷移，是一個歷時性的行動，它並非只是從甲地移動到乙地而已，整個過程從「決定」即開啓了遷移的歷程，接著是「離開」、「定居」、「適應」以及「同化」。不同學者雖有不同的劃分階段，基本上有三個主要過程：定居、適應、同化。「定居」是移民初入新居地，經歷了文化震撼，也安頓好居住、生活、工作，維持住生活的步調與規律。「適應」是有目的的一連串行動，以使自己成為新社會系統及其次級系統中的一份子，是長久而艱鉅的任務。「同化」是移民已經適應新居地，與新居地居民的界限消失於無形，而且與原居地不再有關係。<sup>222</sup>

其實這三個階段並不能清楚切割，它只是表示適應程度的深淺不同，比如「同化」是遷移歷程中的尾聲，但是「同化」是個理想狀況，移民要如何才能被視為「完全同化」也很富爭議，不過這不是本研究關心的範圍，姑且不論，我們關懷的是移民在適應異地時的對策，以及對策實踐下的發展方向。

### 一、遷移的先決條件與「定居」的基礎：移民網絡

有人類就有遷移，因為人類有追求更好的生活的欲望，但移民之所以產生，絕不是隨機的發生，而是理性的選擇，只有特定的人們會離開。<sup>223</sup>移民之所以成為移民，其實是結構因素和個人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結構性的環境條件在人口遷移中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人口遷移理論先驅拉文斯坦（E.G.Ravenstein）的推拉理論簡單又明瞭，他主張遷移是原居地產生推力、新居地產生拉力，而且拉力對遷移的影響是大於推力的，因為人們有改善生活的動力，並且相信遷移後能滿足這種期待。<sup>224</sup>比如國共內戰使中國像一個壓力鍋，國府的挫敗使中國內部的壓力逐漸升高，強大的戰爭推力、經濟推力和政治推力迫使中國大陸泛起移民潮。絕大多數外移人口選擇遷到台灣，因為台灣有較多

<sup>222</sup> 廖正宏，《人口遷移》（台北：三民，1985），頁 170-176。

<sup>223</sup> Saskia Sassen 著，黃克先譯，《客人？外人？遷移在歐洲（1800～）》（台北：巨流，2006），頁 2。

<sup>224</sup> 廖正宏，《人口遷移》（台北：三民，1985），頁 94-99。



的拉力使然，包括與大陸一道海峽之隔的地理位置與交通因素、國民政府偏安之處的政治考量、光復以後台灣成為許多大陸商人投資的平台、或成為媒體報導的旅行新樂園等等。

但是，並非所有人都會對大環境中的推拉力量產生反應，個人因素還是相當關鍵的，尤其是個人的移民網絡。已存在的移民網絡會決定哪些人選擇移民，以及他們會移民到何處，鮮少移民是在完全沒有計畫和個人可依靠的移民網絡下就貿然行動。<sup>225</sup>而且，移民網絡後來往往成為移民們在新居地建立社會網絡的基礎，這個網絡愈堅實，他們所能憑藉的資源就愈充分，遷移適應的情況也就愈樂觀。

所謂「移民網絡」，就是鍊鎖式的移民，先移民者將成功經驗傳回原居地，並代為安排後移民者初入新居地的居住、工作、人際和心理支持等需求，是降低移民風險的一種策略。這個網絡時常以親族、同鄉、朋友等關係密切的人為核心，於是後移民者在新居地時常與先移民者比鄰而居，謀得的工作性質也很接近、甚至同行。<sup>226</sup>可見得移民網絡是移民決定遷移、展開遷移行動，以及在新居地定居謀生的基礎，能提高在異鄉的生存機會。

## 二、「適應」階段的討論

移民適應是移民與新居地雙向互動的過程，在這過程中彼此都會有不同程度的改變，來自大環境的系統因素和個人的因素不斷影響移民的適應和認同傾向，這個歷時性的過程不見得是單向流動，它們互為因果，形成一個遷移適應的循環系統（請見下頁圖3）。

### 1. 遷移適應的典型：改變自己或改變環境

為了確保在異地的生存，移民在新居地會採取許多適應的行動，每個行動都會影響後來的適應方向，適應方向又回過頭來影響行動，以致於時常難以分辨其因果關係。也

<sup>225</sup> 轉引自徐勃毓引用 Tamar Diana Wilson 對人口遷移理論的說法。見徐勃毓，《美國墨西哥裔移民發展之研究》，台北：淡江大學拉丁美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

<sup>226</sup> 廖正宏，《人口遷移》（台北：三民，1985），頁 170-171。

可以說，眾多的適應對策交相作用，也互為因果。不過，在初期的定居階段裡，選擇適應的典型是適應對策的基石，深深影響後來所有的適應行動，也影響移民在新居地的發展。

移民為了適應新環境必定要改變，改變自己去迎合新居地，或是改變環境來遷就自己。所以，從改變自己或環境以求適應來看，可以分為兩種極端的適應典型：完全改變自己，不改變新居地；完全改變環境，不改變自己。事實上，不可能只有單一向度的改變，實際的情形是介於中間的兩種典型。比如集居外省人是把新環境改造成近似大陸生活的縮影，但他們還是得做出一些改變，比如適應台灣濕熱的天氣。<sup>227</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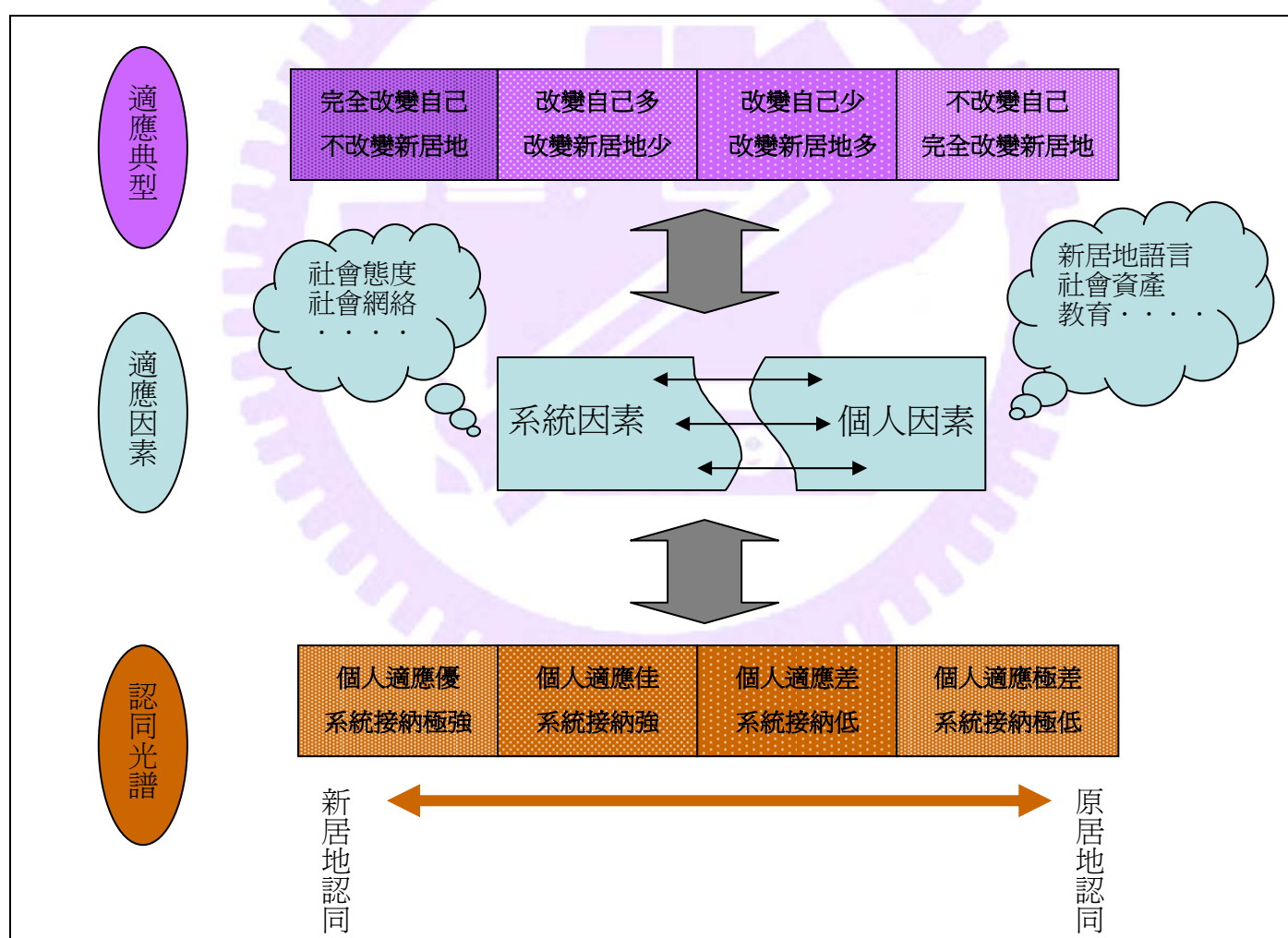


圖 3 遷移適應循環系統示意圖

<sup>227</sup> 廖正宏，《人口遷移》（台北：三民，1985），頁 172。

## 2.影響適應的因素：系統因素及個人因素

遷移適應不是單向的，而是雙向的互動結果。從移民的角度來看，移民脫離原居地的社會結構，進入新居地的社會結構中，爲了讓自己被接納並求得能滿足自我的位置而做出相應的行動；對新居地的社會而言，移民是入侵的「外人」，爲了降低潛在的危機與威脅感，有可能將他們排斥在外，也可能期望把他們同化成一體。<sup>228</sup>所以，影響移民適應的因素，可以分成移民可操控的個人因素，以及不可操控的系統因素，這兩類因素會互相影響。<sup>229</sup>

個人因素是移民先天條件、經驗和可以操控的部分，前者如性別、年齡、個人過去的歷史，後者如教育、新語言、社會資產。系統因素是新居地的社會制度結構、文化觀點、社會事件、社會態度、社區接納「外人」的能力、個人的社會網絡等等。事實上，個人和系統因素有某些部分的重疊，因爲它們時常互相影響，因果關係難以釐清，比如個人的社會網絡，個人可以建立拓展，是可操控的個人因素，但有時候它又是個人不能掌握的系統因素。

個人和系統會不斷互動，而廖正宏所謂的「系統」就是社會文化的外環境，對於移民實質的生活和心理層面都會發生影響，其結果可能使移民趨向與新居地同化爲一體，也可能是移民不可承受的壓力而導致移民適應失敗。

## 三、「同化」：雙重認同的光譜

適應歷程的尾聲是「同化」，也就是移民與新居地的人、事、地緊密結合，分不出界線，與本地居民逐漸變得相似或相同，這是同化的最高程度，也是最理想的狀態。

族群同化有不同的融合形式，比如熔爐式同化是各族群在平等、自願且自然發生的情況下，更新成同質團體。教化式的同化是弱勢族群被要求學習優勢族群的單向教化過程。而高登（Milton Gordon）所提出的結構多元主義，則以爲族群間的文化差異容易消弭，但是族群間的結構上的界線仍然可能存在。王甫昌在分析台灣的省籍融合時，指出

<sup>228</sup> Saskia Sassen 著，黃克先譯，《客人？外人？遷移在歐洲（1800～）》（台北：巨流，2006），頁 149。

<sup>229</sup> 廖正宏，《人口遷移》（台北：三民，1985），頁 176-179。

單向教化和結構多元式的同化較合乎台灣的歷史經驗，所以，他以語言、通婚、認同的同化做為同化向度的三大指標。<sup>230</sup>

語言是一個不可忽視、也顯而易見的指標，因為語言是文化的代表，也是價值觀的入口，因此，移民對新居地語言的學習與持有，甚至放棄自己文化的語言，都是遷移適應的積極表現，也是土著化的重要指標之一。

通婚是最高層次的同化，高登(Milton Gordon)認為是七個同化層次中最難達成的。<sup>231</sup>通婚使兩個族群或團體在生物血緣上融合，再也無法區辨出各自的體質、祖先，進而降低彼此的界線，帶動族群變遷。<sup>232</sup>由於本研究對象江志如是已婚才遷居到台灣，故在此不做討論。

認同新居地也是一個重要的指標，但它是抽象且難以檢測的心理傾向。移民對原居地的原初情感會一直牽繫著他們，但也會逐漸萌生對新居地的認同。新的認同產生時，並不表示移民必須放棄原有的認同，雙重認同還是可能的，只是隨著遷移時間愈長、適應程度加深、與原居地日益疏離，原有的認同程度可能會逐漸降低，相對提高對新居地的認同。如果移民在新居地的適應情況不佳，或感受到新居地的排斥，他的新認同也可能折損，而再度提高原有的認同。所以，對原居地與新居地的雙重認同有如光譜，移民的認同是可以改變，而且不斷在不同的認同對象間移動。

同化，是一個理想狀況，不易達成，而且通常「第一代移民較難有好的適應，第二、三代以後，除了特殊的種族原因之外，在適應上較無問題。」<sup>233</sup>也就是說，移民適應除了前述的系統因素和個人因素，還需要時間的淡忘或發酵。

談完遷移適應的概念，接下來我們將從遷移的三個階段，去審視集居外省人和散居外省人江志如遷移適應的情形和發展。

<sup>230</sup> 王甫昌，〈省籍融合的本質——一個理論與經驗的探討〉，收入張茂桂主編，《族群關係與國家認同》（台北：業強，1993），頁 56-77。

<sup>231</sup> Milton Gordon 提出同化的七個層次：文化的、生物的（通婚）、心理的（認同）、社會的（結構）、態度的（沒有偏見）、行為的（沒有歧視）、公民（沒有價值及權力的衝突）。見自王甫昌，〈省籍融合的本質——一個理論與經驗的探討〉，收入張茂桂主編，《族群關係與國家認同》（台北：業強，1993），頁 53-100。Joan Ferrante 著，李茂興、徐偉傑譯，《社會學：全球性的觀點》（台北：弘智，1998），頁 502-504。

<sup>232</sup> 王甫昌，〈省籍融合的本質——一個理論與經驗的探討〉，收入張茂桂主編，《族群關係與國家認同》（台北：業強，1993），頁 78。

<sup>233</sup> 廖正宏，《人口遷移》（台北：三民，1985），頁 175。



## 第二節 集居外省人的遷移適應

本章試圖提出「散居外省人」的概念，故在本節先討論外省人研究中常見的集居外省人（或說是眷村），期望呈現他們在遷移適應層面的情形，以做為下一節散居外省人江志如的對照。

過去漢人族群自中國大陸的原居地，自發性的遷移至台灣，無論是情感依賴、合力開發或是防衛所需，漢人均依血緣與地緣而居，形成緊密、穩定且高認同度的社會網絡。然而民國三十八年（1949）前後上百萬的外省人因政治變局遷移到台灣，在主客觀條件均不充分的情況下，無法依循前述模式發展成自然而穩定的聚落或族群，其中一大部分靠政府力量的介入，形成集居的社區與社群，包括眷村與榮民社區，他們以改變環境來降低適應生活的壓力，土著化的腳步較緩慢，以致在後來台灣本土化的潮流中，心理壓力陡升。

### 一、「定居」的基礎：憑藉國家力量的移民網絡

前面說過，移民網絡是移民決定遷移、展開遷移行動，以及在新居地定居謀生的基礎。台灣戰後湧進的移民潮，軍人（姑且不論其個人意願）與公務員皆是藉由國家公權力所架構的網絡遷移，他們的家眷亦然。抵台以後，公務員通常接收日人房舍或較好的居住環境，也沒有被要求集中居住，但數量龐大的軍人與軍眷就不同了，國家基於穩定軍心與政權的需要，「集中居住，集中管理」的政策從此左右了他們的適應與發展。

大批政治移民抵台後，集居者都是軍人及其家眷，因為他們是「吃國家的」，所以初抵異地時就被安置在一起，一開始是集體借住學校、寺廟或空地搭帳篷等克難方式，吃是吃大鍋飯。後來眷村陸續興建才得以入住，產生「家」的安定感，生活步調也才逐漸規律起來，但還是集中居住。

集居的眷村與榮民社區，前者是安置有眷的軍人及其眷屬，後者是單身的低階士官兵在退伍後輔導就業或就養的安置。上述兩種類型皆是依靠國家機器而圍起的「竹籬

笆」，另有一種榮民社區是自發性的集居，劉益誠研究中所稱的「散戶」，就是這種集居類型，看似與國家無關，但深究其成份皆是提早退役而必須自謀生活的榮民，與昔日軍中同袍佔據公有地的集居，他們仍是倚仗與國家的特殊關係而享有某種「特權」。<sup>234</sup>所以集居的外省人都與國家保持直接或間接的關係。隨政治性移民網絡遷移的軍人和軍眷，到台灣以後，不論是工作、居住等「定居」階段的生活需求都持續以這個網絡為基礎，而且，因為是政治性的強勢力量，使集居的外省人在後來的「適應」階段與這個網絡產生既依賴又受限的緊密共生關係，相對地，也與新居地的本地社群保持疏離。

安置型的眷村或榮民社區，先是資格限定上篩選了具有同樣社會位置的外省人，也就是男主人的職業都是軍人，國家機器再以制度性手段介入其私領域，長期下來，這些集居的外省人逐漸同質化。至於自發性榮民社區，政治力量雖然沒有直接的涉入，但由於初始集結的力量是「同袍」情感與相同的社會位置，在社區成形之前已具有我群、軍隊和家國的認同基礎，所以自發性榮民社區基本上是延續軍中的認同。安置型與自發性的軍系社區，因為具有近似的社會位置與類似的生活型態，而產生相仿的國家認同，只是程度上的差別，但都形成可指認的特殊社群，也簡單的化約多樣性移民群的事實。

## 二、「適應」的層面：

### 1.同質性社會網絡

集居的移民背景來自中國各省，異質性相當高，但入住資格限定軍人，甚至是單一軍種、同一單位、軍階也相仿，這群人因此取得近似的社會位置。社會位置近似的人基於安全感會主動聯結相似者而發展出社會網絡，於是集居如眷村的成員，男主人在軍隊的職業領域中與同袍發展出一套網絡與資源，回到家的私領域，家所在的鄰里網絡還是相同或相似的一群人，同質性社會網絡更加緊密地繫住每個份子。公私生活所需的人際關係和發展在封閉的生活場域與社群結構中都能獲得滿足，內求的社會網絡就不斷被強

---

<sup>234</sup> 此種「特權」在於國家對他們是睜隻眼、閉隻眼，但自發性集居的榮民畢竟是違法佔地，生活上並沒有保障，如果政府要收回土地，他們都能「溫馴地接受」，劉益誠稱他們為「隨時會被驅離的都市吉普賽」。見劉益誠，《竹籬笆內外的老鄉們－外省人的兩個社區比較》（新竹：清華大學社會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

化，使集居的外省人缺乏與外界交往的動力和需求。

在社會結構中所佔的位置攸關一個人所能享有的經濟能力、社會地位、社會網絡與社會資源，這些因素彼此纏結且被圈限在封閉的社群和場域裡，使得眷村和榮民社區的成員，不但是擁有相同的社會位置、經濟能力和社會地位，連社會網絡與社會資源都高度重疊，整個社群的同質性愈來愈高，我群意識愈來愈深，益發封閉而排外。然而，同樣是近似的社會位置，個體若非置身在一個封閉性的場域和社群裡，他的社會網絡和資源會有各種可能性，也就是擁有異質性社會網絡以及社會流動的機會。所以，安置型的眷村和榮民社區成員在「密集叢聚的“同質性網絡”」下，圈限了他們發展的機會，也阻礙他們土著化的腳步。<sup>235</sup>

自發性榮民社區的成員，由於是提早退役而須自謀生活者，在經濟能力和社會地位方面可能較為不利，但由於該社群的封閉界線比較模糊，外界刺激容易進入，相對地有較彈性和寬廣的社會網絡，但不表示他們就有比較樂觀的資源和發展，因為初始社會位置的高低還是不易突破的關鍵。呂秀玲認為軍人初職、集居的封閉結構，以及缺乏異質性社會網絡是造成榮民社會不流動或向下流動的主因，強大的結構性因素更是完全抵消個體因素，亦即個體無論怎麼努力都難以逃出制度、結構的魔掌，但是異質性社會網絡還是提供流動的可能性，扮演積極的角色。<sup>236</sup>

一般而言，集居外省人建立的社會網絡都限於軍中同袍、同鄉等，難以突破外省人圈子而建立本地的社會網絡。族群通婚是突破此一壁壘的有效方法之一，婚入外省人的本省女性能為丈夫打開本地的社會網絡，成為中介者。然而，當時的社會情境下，本省人對於嫁給外省人持負面的看法，女方若在家裡不支持的情況下仍執意結婚，婚後與原生家庭的關係非常疏離，甚至斷絕往來。<sup>237</sup>因此，本省籍妻子的原生家庭網絡不一定能被納入外省丈夫的本地社會網絡，但是妻子所操持的本地語言卻能成功協助丈夫跨越族群的藩籬，建立起異質性的社會網絡，所以，語言才是資源網絡的關鍵，也是族群融合

<sup>235</sup> 呂秀玲，《眷村的社會流動與社會資源——一個榮民社區之田野研究》（台中：東海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8），頁 84。

<sup>236</sup> 呂秀玲，《眷村的社會流動與社會資源——一個榮民社區之田野研究》（台中：東海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8）。

<sup>237</sup> 郭苑平，《眷村台灣媽媽的自我與認同研究》（新竹：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



的媒介。<sup>238</sup>

集居外省人因為近似的社會位置和封閉的生活場域，使他們成為一個封閉性的社群，社會網絡也趨向同質性。同質性的網絡固然能提供移民心理層面的支持，但長久而言，居住場域的封閉性一旦瓦解或是卸下原初軍職，他們將立即面對本地社群，而重回移民適應典型中的左端，也就是得改變自己以適應新環境，但通常當這種情形發生時，他們年齡已長，各方面條件皆不利於適應，以致於社會地位向下流動，並產生嚴重的心理危機，甚至於適應失敗。

## 2.本地語言的短缺

集居的外省人藉由封閉的生活場域，把異地的生活環境改變成舊日熟悉的模式，以幫助自己適應遷移，而且雖然成員祖籍不同，但長久在制度性的安排中共同生活，發展成次團體和次文化，不過語言、文化和認同意識才是真正區隔社區內外的「竹籬笆」。<sup>239</sup>

集居社區中，來自中國大江南北的居民，家鄉語言各不相同，為了溝通，他們選擇以在大陸時期就被頒定為「國語」的北京話溝通，由於不是原生語言，所以帶有濃濃的鄉音，南腔北調的國語在社區裡此起彼落，造成特殊的聽覺感受。封閉的生活場域、同質性的社會網絡，讓置身其中的移民沒有學習本地語言的急迫性與壓力，再加上在大環境中，偏安政府以中國政權的正統地位自居、以中原文化為尚、以國語為強勢推行的唯一語言，附麗在主流文化下的集居外省人，無論在日常生活空間和工作場域都不需要、也沒機會接觸本地語言，因此對本地語言很自然地產生隔閡，甚至排斥感。

本地語言的短缺，使集居外省人的社會網絡不易擴展到本地社群，對新居地的文化了解有限，認同感難以萌生，而且，兩個社群不易有交集，對彼此也就容易存有不實的想像。

---

<sup>238</sup> 呂秀玲，《眷村的社會流動與社會資源——一個榮民社區之田野研究》（台中：東海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8）。

<sup>239</sup> 謝高橋，〈台灣大都市原住民的居住隔離——以台北市為例〉，收入曹俊漢、柯瓊芳主編，《中西都會區之發展與面臨的問題》（台北：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1995），頁 203-204。



### 3.教育是脫離眷村的途徑

教育是移民非常重要的個人資產，它提供就業市場所需的知識、技術、工作態度，也影響其社會參與和適應程度。總結來說，教育是移民在新居地的晉身良方。<sup>240</sup>

林忠正、林鶴玲的研究指出外省人的平均教育程度比較高，在經濟差異中也有較佳的表現。至於為何外省人的教育程度會比其他族群高，研究推論包括：軍公教人員有子女教育補助費、過客心態下的理性投資、第一代外省父母的教育程度較高等。<sup>241</sup>

二林的量化的研究是以全體外省人為母群體，集居的外省人自然也包括在內。但我們知道集居的外省人有安置型的眷村和榮民社區，也有自發性的榮民社區，並非都能享有子女教育補助費；父母教育程度較高的說法，也不見得適用在眷村中的中下階的士官兵，而且他們還是大多數；至於理性投資，與其說是肇因於過客心態，不如說是移民考量自家沒有土地資產、社會網絡薄弱之故，只能利用體制內公平的教育、考試機會創造個人資產。<sup>242</sup>關於這部分在下一節有更詳細的討論。

但是，教育的確是眷村中非常重要的面向，父母對子女的管教上，時常以督促讀書為主，吳忻怡從眷村文學的文本分析，以及眷村文學作家（皆為眷村第二代）的質性訪談，發現眷村的確是外省人有意識地把握向上流動的機會，但後面隱藏的原始動力竟然是為了脫離眷村。外省人對集居的生活是愛恨交織，他們一方面有強烈的我群意識，一方面因為居住品質惡劣、社群氛圍封閉、家庭經濟條件不佳，使他們產生離開的欲望，但政治性的集居帶給他們無力逃脫的限制，讓他們產生極為矛盾的心情。只有教育能累積他們的個人資本，提供他們獨立生活的能力與機會，因此，眷村子弟對於接受教育有比較高的主動性和認同。<sup>243</sup>

不過，要取得教育成就，升學考試是一道關卡，如果集居的外省人子弟本身無法突破這一關，意味著向上流動、向外逃離的主要途徑被封死，對未來無望、對自己失去信

<sup>240</sup> 廖正宏，《人口遷移》（台北：三民，1985），頁 177-178。

<sup>241</sup> 林忠正、林鶴玲，〈臺灣地區各族群的經濟差異〉，收入張茂桂主編，《族群關係與國家認同》（台北：業強，1993），頁 101-160。林忠正與林鶴玲在其後的討論中，簡稱「二林」。

<sup>242</sup> 吳忻怡，《「多重現實」的建構：眷村、眷村人與眷村文學》（台北：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頁 64。

<sup>243</sup> 吳忻怡，《「多重現實」的建構：眷村、眷村人與眷村文學》（台北：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頁 66-68。

心等心理狀態下，很可能轉而強化原本的我群意識，與同樣背景的外省子弟集結，形成所謂的「外省幫派」。所以，集居外省人的第二代常有兩種極端的發展，一是透過教育向頂端的社會位置移動，一是無法創造自身價值而向下移動，使自己和社會付出代價。

#### 4. 逐漸升高的心理危機

遷移，意味著切斷舊關係，開啓新關係。遷移造成生命的斷層，過去的支持系統與自我概念都被歸零，且新環境迫使移民必須重新建立心理的認知圖，種種壓力使移民產生高度的心理危機。<sup>244</sup>

然而集居的外省人因為工作有保障、生活場域的封閉，以及同質性社會網絡，使他們在遷移之初，除了思鄉外，在異地求生存的威脅感不大。也就是說，他們較少改變自己以求適應新居地，形成一個界線明顯的次級團體和次級文化，有別於社區外的本地社群。但是，隨著時間的流逝，個人生涯的推進，政治環境的改變，集居外省人在遷移的數十年後必須面對接納態度更為嚴苛的台灣社會，而自身所能擁有仗恃的條件和資源卻更薄弱了。也就是說，他們被迫重回適應循環系統中的起點，所以，移民皆有的心理危機，在他們身上不但沒有逐漸降低，反而急遽升高。

如果移民沒有採取適當的對策，很可能造成遷移失敗，使移民返回原居地或在新居地痛苦一生。以政治移民來說，受限於現實的政治環境，往往不得返回原居地，只能在新居地痛苦地度過餘年。集居的眷村移民就容易陷入這種困境。處在封閉的生活情境裡，經過日常生活中反覆的回顧過往相似的背景，強化對原鄉的認同感，一再彰顯移民身份，在過客的氛圍裡，第一代無法融入台灣的生活，連帶地使第二代也與生長的台灣土地疏離，產生無法落地生根的危機感，造成心靈上無以承受的矛盾，甚至終究選擇離開台灣。<sup>245</sup>

<sup>244</sup> 廖正宏，《人口遷移》（台北：三民，1985），頁 184-185。

<sup>245</sup> 吳忻怡，《「多重現實」的建構：眷村、眷村人與眷村文學》（台北：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頁 40-43。

### 三、「同化」的障礙：強烈的「我群」認同與區隔意識

在早期的眷村或榮民社區，你可以輕易察覺某些明顯與社區外不同的圖像，比如載運糧食補給品的卡車定期到社區發放物資、三五步就有政策宣傳的標語、戶戶懸掛的國旗迎風飄揚、選舉時期樹起特定候選人的旗幟等。眷村並非單純的居住場域，生活在其中，不單軍人必須聽令於國家，連軍眷也受到嚴密的監管，雙重的箝制以確保軍人的忠心與穩定。政府以微薄的福利補助，交換國家對他們的控制權，包括政治意識的教化、特定政黨的擁護等，眷村可以說是政府刻意形塑的政治樣板。孤立在台灣社會中的樣板社區，眷村內外是兩個截然不同的社會氛圍。由於與國家有權利與義務的雙向關係，安置型集居的社區在日常生活中時時可見國家機器的存在，公私領域在這裡是分不清的。自發性的榮民社區由於與國家的距離較遠，國家介入的痕跡不深，但政治性的圖像與符碼還是沒有缺席，主要是延續昔日軍中的習慣以及認同。

吳忻怡認為外省人對中國文化特別喜愛，因為那是鄉愁，也是自我身份的肯定，同理，中國大陸與台灣、外省與本省的斷裂二分法，使「外省人居住的聚落」（指眷村）同時包含空間與原鄉的因素。<sup>246</sup>換言之，集居的生活場域像一個溫床，讓有相同離鄉背景、或逃難經驗的移民，藉由日常生活中的各種儀式，選擇、重組、塑造、強化共同的集體記憶，對祖籍的情感認同也轉化擴大成對整個中國大陸的認同。<sup>247</sup>所以，外省人對家鄉的原初情感是我群認同的基礎。

到了人生地不熟且欠缺資源的新居地，為了求得生存的機會和空間，只能安於國家機器的支持和支配，發展出嚴密的科層組織、自給自足的人際網絡，產生由相似的戰爭經驗與離鄉背景所昇華出的，以蔣氏父子為中心的「圖騰」式的親屬關係，凝聚了黨國認同。<sup>248</sup>

集居外省人在生活場域中不斷地操演象徵他們身份的各種認同。在封閉的生活與社

<sup>246</sup> 吳忻怡，《「多重現實」的建構：眷村、眷村人與眷村文學》（台北：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頁34。

<sup>247</sup> 胡台麗，〈芋仔與蕃薯——台灣「榮民」的族群關係與認同〉，收入張茂桂主編，《族群關係與國家認同》（台北：業強，1993），頁321。

<sup>248</sup> 胡台麗，〈芋仔與蕃薯——台灣「榮民」的族群關係與認同〉，收入張茂桂主編，《族群關係與國家認同》（台北：業強，1993），頁313。



群中，因為分享相似的戰爭與逃難記憶、制度結構、生活經驗、社會地位與利害關係，因此，這些認同基礎使集居的外省人之間產生了一種擬親屬的連帶關係，逐漸發展出我群的概念與認同。

遷移到新居地的移民者，若是在經濟、情感或社會網絡等方面都能自給自足時，他們不會有向外發展的動力和需求，一如許多移民到美國華人社區的華僑。所以，社區內自足的生活機能與社會網絡，以及對我群的高度認同，強化集居外省人對社區外所持有的區隔意識，降低社區內外交流的機會，即使來往，也只是暫時性的，無法發展出深切的關係。

事實上，造成集居外省人無心發展在地社會網絡，還有「過客」的心態。政府「反攻復國」的口號使他們相信新居地只是暫時落腳的避難之地，他們隨時都要捲起包袱回鄉去，強化了他們游離的心情，也使他們與本地社會產生隔閡。<sup>249</sup>胡台麗也指出多數「不得已」而隨部隊來台的榮民，因為沒有長久居住的心理準備，無法「正常」地與新居地人民往來。榮民在新居地也欠缺生存所需的力量與資源，因此無論在情感或經濟上，不得不仰仗國家的照顧，因而與國家形成緊密共生的形勢，榮民也以軍旅生涯中的「區隔」意識與外界交往，深切的關係自然不易建立。<sup>250</sup>

在職軍人與軍眷，或是榮民，雖獲得生活的安置與補助，但受到更大的限制與控管，有形、無形的「竹籬笆」挾制了他們的思想、行動與土著化的速度。所以，無論安置型或自發性集居的榮民都有類似的認同與區隔意識，不過因為與國家的距離不同而有積極或消極的程度差別。<sup>251</sup>

集居外省人透過集體記憶而產生擬親屬的連帶關係，具有強烈的「文化親親性」，這種非血緣的「親親性」是文化性的建構，選擇性和虛構性較高，也容易隨社會情境的變遷和群體利益的改變而轉變認同。<sup>252</sup>所以，與國家保持密切關係的集居外省人雖然起

<sup>249</sup> 吳忻怡，《「多重現實」的建構：眷村、眷村人與眷村文學》（台北：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頁 40-43。

<sup>250</sup> 胡台麗，〈芋仔與蕃薯——台灣「榮民」的族群關係與認同〉，收入張茂桂主編，《族群關係與國家認同》（台北：業強，1993），頁 315-316。

<sup>251</sup> 劉益誠，《竹籬笆內外的老鄉們——外省人的兩個社區比較》（新竹：清華大學社會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

<sup>252</sup> 王明珂，〈過去、集體記憶與族群認同：台灣的族群經驗〉，收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輯，《認



初是抱持過客心態與區隔意識，但隨著時間的流逝，政府「反攻大陸」的口號不能再取信於他們，於是原本堅實的界線也逐漸鬆動；解嚴以後，重返魂牽夢縈的家鄉，不但沒有滿足他們的企盼，反而因現實中兩岸長期分治，讓他們驚覺家鄉不再是家鄉，而重新看待本是異鄉的台灣；時至今日，集居形態的眷村面臨拆遷重建，現代化的社會也破壞了昔日孕育的溫床，我們可以相信，那條區隔的界線已變得更模糊，土著化也相對地積極起來。

至此，我們對集居外省人所能仗恃的資源和受到的限制，以及適應的歷程與成果，已有相當的理解，下一節我們即以此做為對照，分析以江志如為例的散居外省人。

### 第三節 散居外省人的一種典型

如果說，1949年前後佔移民人口最大比例的「隨部隊來台」的軍人與軍眷，都能分化出主動或被動的移民意願，那透過各種管道到台灣的移民，他們的動機和意願恐怕就更為多樣與複雜了，趙彥寧的研究即證明這一點。<sup>253</sup>趙氏將訪談過的一百二十三位「中國流亡者」（一般的說法是「外省人」）細分為幾種類型，包括光復初期奉命來台接收的官員、懷著好奇而來的旅人、拓展海外市場的投資者、反共義士、輾轉由香港或菲律賓等地來台者，因此，當年的移民並非全是逃難的難民，他們移民的動機、享有的資源、適應的情況也各不相同。<sup>254</sup>集居外省人因為在特殊時空下接受了政治性網絡的安排，從適應到同化都走在一條相似的道路，江志如因為散居，初始承受的適應壓力較大，適應行動較積極，因而更能接近在地社會，土著化較深。

---

同與國家：近代中西歷史的比較》（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頁 249-274。

<sup>253</sup> 見胡台麗，〈芋仔與蕃薯——台灣「榮民」的族群關係與認同〉，收入張茂桂主編，《族群關係與國家認同》（台北：業強，1993），頁 279-325。

<sup>254</sup> 趙彥寧，〈戴著草帽到處旅行：試論中國流亡、女性主體、與記憶間的建構關係〉，收入趙彥寧主編，《戴著草帽到處旅行》（台北：巨流，2001），頁 203-245。

## 一、「定居」的基礎：縮合生意網絡和親人網絡的移民網絡

在百萬的政治移民潮中，不具軍人和公務人員身份者，想踏上遷徙之路必有其親疏不等的移民網絡，與網絡較密切者，初到台灣還能有所依靠，若關係間接而疏遠的人，很可能一登岸即面臨困境。一個引人關注的現象是，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之下，女性移民幾乎都是依親，也就是依附丈夫的移民網絡而來台，高比例的軍人及公務員家眷如此，本研究的江志如也是如此。那麼，江志如的丈夫有何移民網絡呢？

江志如的丈夫當時是上海布商，棉布生意已拓展到台灣，建立起在台的生意網絡，別人可能從未聽聞過「台灣」這個地方，江志如的丈夫不但曾經親自造訪台灣，還在台灣購置房產，也派了二弟夫婦留守台灣的莊口，在台的社會網絡得以持續擴展。所以，江志如丈夫的潛在移民網絡是縮合生意網絡以及先移居當地的親人網絡所交織而成的。

當共產黨佔領上海，政治推力增到最強，但並非所有上海人都選擇移民，只有感受到這股推力的人才會興起離開的念頭。江志如丈夫因為批發布商的身份而被共產黨視為必要整肅的眼中釘，他們判斷生命、財產的安全受到極大的威脅，上海已沒有他們的立足之地。那麼，要走去哪裡呢？潛在的移民網絡發揮了力量，而且，遷移的前期因為文化震撼最易使移民產生挫敗與調適困難，若對目的地有充分的瞭解較易渡過這個困局。<sup>255</sup>所以，江志如丈夫所熟悉的台灣是他們遷移的選擇。一邊是政治推力，將他們推出上海，一邊是經濟因素的拉力，將他們拉進台灣，結構環境的推拉，移民網絡的篩選，以及精密的評估，他們的目的地是台灣而非香港，其實是頗為理性的選擇。

一到台灣，江志如一家立即進入遷移適應中的「定居」階段，他們必須有安身之處，然後謀求一份工作維生。透過移民網絡，他們在基隆下船即直驅位於台北市的自有房舍，與先在台定居的江志如小叔共同生活了一小段時間。雖然江志如丈夫與弟弟因故不和，但他還是間接透過弟弟的在地社會網絡，得到工作的消息而搬去新潭門開農場養豬，與弟弟的朋友同行。從抵台到謀得工作，江志如丈夫大約耗費了近半年的時間，才讓全家人的生活進入一個相對規律的生活，勉強完成「定居」階段的要求。

---

<sup>255</sup> 廖正宏，《人口遷移》（台北：三民，1985），頁 180。

## 二、「適應」的層面：

### 1.異質性社會網絡

關於移民適應的個人因素很多，包括性別、教育、婚姻、家人對遷移的態度、對目的地的瞭解等，其中以在目的地建立新社會關係是適應期發展的關鍵。<sup>256</sup>呂秀玲也有類似的結論，她認為封閉性高的眷村易於形成同質性網絡，而族群互動與異質性網絡卻是開啓榮民社會流動的關鍵性變項。<sup>257</sup>這樣看來，移民在新居地建立起本地的社會網絡，有助於移民的適應與發展。不過，以 1949 年前後政治移民潮的歷史時空來看，只有本地的社會網絡是略嫌不足的，同時兼有「外省人圈子」和「本省人圈子」更能調適現實的生活和同化的進展。

江志如丈夫在移民前是上海批發布商，比起一般農工或公務員家庭，他在原居地的社會網絡相對複雜得多。由於是政治移民潮，資源雄厚的上海商人遷移到台灣的比例相當高，這提供江志如丈夫在新居地還能享有一部分原居地的社會網絡，而且因為其特殊的社會位置，他原初的社會網絡有較高的異質性、較多的經濟能力和社會資源。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江志如丈夫到台灣以後，雖然無法繼續他的棉布生意，但他到新潭門開農場、到老潭門開戲院，投資的事業都不順利時，他去朋友的當舖工作；後來，江志如能去台元公司工作，也是透過丈夫的老朋友介紹。尤其是投資戲院，戲院在當時屬於列管的特種行業，從開設到經營都不是單純而容易的事，土地取得、打通軍方與地方行政的管道、影片的來源、電影放映的周邊知識、技術與經營等，這背後是一整套複雜的學問，對一個生手、又是個初來乍到的移民，如何做得到？江志如當時雖然沒有參與，知道得不多，但她記得：「我先生以前在上海做生意的朋友，有幾個在台北開影片公司，拿影片比較方便。」我們可以合理推測江志如丈夫會選擇開辦戲院，必然是借助他原初的社會網絡，也就是上海朋友的幫忙。所以，江志如丈夫遷台以後，主要的社會網絡仍是原初的社會網絡，也就是「外省人圈子」。

江志如與丈夫不同，她的社會網絡是以「本省人圈子」為主。這並不奇怪，不同的

<sup>256</sup> 轉引自廖正宏引用謝高橋的研究，見廖正宏，《人口遷移》（台北：三民，1985），頁 180。

<sup>257</sup> 呂秀玲，《眷村的社會流動與社會資源——一個榮民社區之田野研究》（台中：東海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8）。



研究都顯示女性移民的遷移型態多是依親或因婚姻而遷移，其適應的對策與調適情形比起男性為佳，她們較易與本地人相處，也有較高的調適能力。<sup>258</sup>而且，我們檢視江志如的生命經驗就知道這個結果也與她所處的環境脈絡有關。

當戲院經營不善時，江志如丈夫長年離家工作，江志如獨自帶著四個年幼的孩子在老潭門生活，並且接手戲院的生意。落戶在本地族群間成為少數，鮮少操演原鄉認同的空間與機會，移民身份就會逐漸淡化，退到心裡角落，而且無論是日常生活或工作需要，江志如都必須密集地與客家鄰里接觸，為取得鄰里間的認同，積極實踐對新居地文化及語言的模仿與認同，也就是王甫昌所謂「自然產生的同化」，來自現實生活所需，而非制度性的壓力。<sup>259</sup>她的生活圈主要是客家鄰里，她因此學會客語，正向循環下，她在台灣建立起屬於她自己的、本地的社會網絡。後來她去台元擔任舍監十八年，工作場域中也幾乎都是本地族群，包括客家人和閩南人，更加擴大且深化她的本地社會網絡。我們從早期她借戲班能向鄰居告貸，和後來在台元宿舍裡打會集資，可以發現她的本地社會網絡已穩定成一個可信賴的非正式經濟網絡，協助她度過財務難關，甚至是累積財富。能擁有這種互助的非正式組織的管道，對於移民來說是很重要的適應對策。<sup>260</sup>

事實上，江志如個人所建立的社會網絡，不只是本地網絡，還有外省人網絡。由於是依附丈夫的移民網絡來台，江志如雖然在台灣沒有初始的外省人網絡，但她還是有幾位在潭門認識的外省朋友，形成她自己的「外省人圈子」。在這個外省人網絡中，同姓同鄉的校長夫人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位，不但是心理的支持力量，更實質地提供江志如工作的機會。

若以一個移民家戶所能擁有的社會網絡來看，江志如掌握的社會網絡，同時包括本地與外省，而她的丈夫維持「外省人圈子」的關係，夫妻所共有的社會網絡充滿異質性，且能兼顧特殊時空下的兩股社會資源而從中獲取所需，對其異地適應提供極大的助力。

---

<sup>258</sup> 廖正宏，《人口遷移》（台北：三民，1985），頁 177。

<sup>259</sup> 王甫昌，〈省籍融合的本質——一個理論與經驗的探討〉，收入張茂桂主編，《族群關係與國家認同》（台北：業強，1993），頁 72。

<sup>260</sup> 廖正宏，《人口遷移》（台北：三民，1985），頁 182。



## 2. 操持本地語言

國際移民要克服的困難很多，語言是首要障礙。<sup>261</sup>雖然 1949 年的政治移民屬於境內移民，但台灣與中國大陸分治已久，當時台灣通行的語言是日語和族群母語，雖然政府強勢廢行日語，推行國語，但台灣社會還是以族群母語為主，所以，對外省人來說，語言障礙還是必須克服。

「適應」是長久、艱鉅而有目的性的任務，為了使自己成為新社會系統及其次級系統中的一部分，散居的外省人因為人口數量上的弱勢以及自然的接觸，會採取改變自己以適應新環境，特別是文化及語言。<sup>262</sup>江志如就表示：「跟鄰居聊天，他們都講客家話，我就跟著學。」所以，生活在客家村三十年的江志如會聽、會說客語，而她的丈夫因為僅假日回家，就只能聽卻不會說了。

移民與新居地的人民操持相同的語言能成功拉近彼此的距離，移民也能理解新居地的文化與價值觀而不致產生誤解，因此，學習本地語言是遷移適應的積極行動。江志如具備能聽會說的客語能力，不過她自認講得不好，但第二代在自然的客語環境裡成長，擁有良好的客語能力：「我四個小孩都會講客家話，而且沒有腔調。」江志如的孩子與土生土長的本地居民一樣，移民者的界線已無從分辨，這就是同化，是經由行動實踐對新居地的認同。

在新居地學習和不斷操持本地語言的同時，也意味著移民逐漸放棄其原本使用的語言，所以，國語的推行，對習慣講母語（閩、客、原）和日語的台灣人而言，既是巨大的變化，也產生被壓迫的屈辱感。然而，外省人南腔北調的國語，表示學習講國語對他們來說又何嘗不是一股壓力？胡台麗在榮民研究中提及榮民離開家鄉已久，已講不出流利的家鄉話，而是帶有家鄉口音或多省混合口音的國語。<sup>263</sup>榮民或許因轉戰大江南北而在部隊中提早接觸、學習國語，但一般百姓並沒有這樣的機會與需要，江志如就說：「我們剛到台灣的時候講家鄉話，不會說國語，是小孩上幼稚園學ㄅㄆㄇ，我們才跟著學，

<sup>261</sup> 廖正宏，《人口遷移》（台北：三民，1985），頁 173。

<sup>262</sup> 王甫昌，〈省籍融合的本質——一個理論與經驗的探討〉，收入張茂桂主編，《族群關係與國家認同》（台北：業強，1993），頁 72。

<sup>263</sup> 胡台麗，〈芋仔與蕃薯——台灣「榮民」的族群關係與認同〉，收入張茂桂主編，《族群關係與國家認同》（台北：業強，1993），頁 291。

跟著學講國語，到現在都還講得不好啊，不標準。」遷移到台灣的江志如，必須放棄家鄉話，切斷與原鄉的聯繫，情感上已是一種割捨，面對政府制度，她又必須學習國語，面對新居地鄰里相處的生活，也必須學習客語。在異地，強迫自己同時學習兩種語言，這種壓力並不小於台灣民眾面對強勢的官方語言，所以相關研究與一般印象皆認為大陸移民擁有國語優勢的說法，似乎還有討論探究的空間。

### 3.投資教育以取得向上流動的機會

林忠正與林鶴玲研究台灣族群間的經濟差異，指出外省人在專業取向的服務業和公共部門的比例都比較高，位於經理階級也比較多，原因很可能是外省族群平均教育程度高。<sup>264</sup>然而，移民通常在非正式的部門找到第一個工作，如街上小販、建築工、手工藝等，也就是無關乎學歷的工作。<sup>265</sup>

江志如丈夫在台投資的生意屢屢失敗，必須轉進正式部門求取工作時，他小學的學歷和四十多歲的年齡就成為障礙，只能透過非正式的管道，到朋友開設的當舖謀生而且無法轉換其他正式工作，二十多年後東山再起，仍是不需學歷的房產投資。至於江志如，原本是家庭主婦，自家戲院經營、廚房臨時工、短期保母都是貼補家用的非正式工作，但能在台元紡織公司謀得一份正式工作，靠的就是她初中的學歷（實際上是高一肄業，身份證上登記為初中畢業）。不過，依中央研究院的調查，台灣地區民國三十八年以前、不分省籍的出生者，教育程度為小學畢業者佔 43.9%，江志如丈夫的教育程度並沒有優勢；江志如初中畢業，佔 10.7%，整體來說有 27.9%的人教育程度高於她，54.2%的外省人超越她。<sup>266</sup>也就是說，江志如夫妻的教育程度並不算高。但江志如對下一代的教育投資非常重視，所以四名子女都擁有大學以上的學歷，在他們各自的世代裡屬於前百分之十的佼佼者。由於女性受高等教育的比例比較低，江志如的三個女兒更是擠進百分之五

<sup>264</sup> 林忠正、林鶴玲，〈臺灣地區各族群的經濟差異〉，收入張茂桂主編，《族群關係與國家認同》（台北：業強，1993），頁 101-160。

<sup>265</sup> 廖正宏，《人口遷移》（台北：三民，1985），頁 171。

<sup>266</sup> 本處直接引用林忠正、林鶴玲研究中所使用的同一樣本，「表七 一九四九年前出生者之教育程度，按省籍分」，該資料來源為「台灣地區社會意向調查」八十年度第二次定期調查，中央研究院社會意向研究小組，民國八十年八月出版。林忠正、林鶴玲，〈臺灣地區各族群的經濟差異〉，收入張茂桂主編，《族群關係與國家認同》（台北：業強，1993），頁 126。

的頂端。較高的教育程度保證了他們後來的就業機會與較高的薪資所得，也掌握住向上流動的機會，江志如一家因此擺脫移民者低落的經濟困境與社會地位。

表面上看起來，江志如在教育投資的想法、行動和成果都符合林忠正與林鶴玲「外省族群平均教育程度較本省族群為高」的研究結論，但二林以量化研究所做的去脈絡化的推論不但導致某種程度的失真，更嚴重的是該文因資料、概念和分析架構的嚴重扭曲，而強扣外省人是經濟強者的大帽子。趙剛以為二林的核心問題在於將族群與階級絞纏在一起，而陷入族群民族主義論述的罩門，讓外省人成為現實經濟利益分配不均的代罪羔羊。<sup>267</sup>本文嘗試以江志如的真實個案拆解二林的論述，還原教育之於外省人的意義，以及外省人在經濟結構裡的位置。

首先，二林以為外省人是公共部門的主要人力，而軍公教人員享有子女教育補助費，故助長對教育的需求。<sup>268</sup>但是，該研究無法解釋非軍公教背景的外省人願意投資教育的原因。江志如夫妻均非軍公教背景，當年他們困窘的經濟環境不但繳不出學費，甚至使孩子營養不良到昏倒的地步，卻仍然堅持孩子必須讀書，原因何在？恐怕不是有沒有教育補助費可以簡單解釋的。

再者，二林指出外省人沒有長期定居的打算，使他們理性地選擇易於遷移的教育投資。<sup>269</sup>關於這一點，我們以為「過客」心態的推論是輕忽了移民生存的現實困境，因為在早期農業社會裡，較晚來台的外省人已沒有土地墾殖，家庭不需大量農力，也供養不起過多人口時，只能向外尋求工作機會，而正式工作又以學歷為門檻時，咬牙投資教育是不得不然的選擇。況且民國四〇、五〇年代的教育費對中下階層的家庭而言雖是不小的負擔，但與其他經濟商品的投資成本相比仍是相對低廉，投資報酬率也相對穩健。

還有，二林分析第一代來台的外省人平均教育程度較高，使子女也有較高的教育成就。<sup>270</sup>如前所述，江志如夫妻的教育成就並不算高，雖然有初中學歷的江志如因丈夫長

<sup>267</sup> 趙剛，〈錢、「謊言」、統計表：體檢族群民族主義的利益政治〉，收入《告別妒恨：民主危機與出路的探索》（台北市：唐山，1998），頁 71-96。

<sup>268</sup> 林忠正、林鶴玲，〈臺灣地區各族群的經濟差異〉，收入張茂桂主編，《族群關係與國家認同》（台北：業強，1993），頁 121。

<sup>269</sup> 林忠正、林鶴玲，〈臺灣地區各族群的經濟差異〉，收入張茂桂主編，《族群關係與國家認同》（台北：業強，1993），頁 122。

<sup>270</sup> 林忠正、林鶴玲，〈臺灣地區各族群的經濟差異〉，收入張茂桂主編，《族群關係與國家認同》（台北：



年不在家是有可能主導了孩子的教育決定權，但也必須獲得丈夫的支持。由此看來，父母教育程度的影響論仍有待討論。

其他諸如外省人享有城市較佳的教育資源、官方語言對外省人升學有利等推斷也都與江志如案例相違。關於前者，他們長期居住在客家小農村，如果說他們享有特別的教育資源，那只是他們有幸遇到有愛心和熱心的老師；而後者，江志如夫妻與孩子也都是國語的初學者，甚至要同時學習客語，在兩種新語言的擠壓下，他們無從得利。

二林的多項推論都無法解釋江志如的案例，我們以為唯有回歸江志如本身的脈絡，才能真正理解箇中緣由。在吃不飽的苦難日子裡，江志如不但堅持兒子讀書，對三個女兒也一視同仁，她全心全力投資教育的理由何在？我們以為促使她做出這樣的行動，有個人的因素，也有大環境的誘因；有顯性的理由，更有隱性的成因：

#### (1)以商業眼光來看，教育的投資報酬率高

據江志如的說法，她投資子女教育的動機是對丈夫「失去信心，於是將希望完全寄託在四個兒女身上」。江志如如何突破當下難以承受的苦難生活？她選擇的方式不是賣孩子或把女兒送人養，也不是把孩子送去當童工，這些方法或許能立即獲利，解決燃眉之急，長期而言，投資報酬率卻不高。出身商人家庭、也是商人婦的江志如以精準的商業眼光認為：「讀書很重要，讀書才能出頭。」因為讀書是社會流動最重要而有效的管道，尤其在那個升學率和教育程度普遍不高的年代裡，高教育程度就能保證高就業率、高薪及高社會地位。扣除當時法定的義務教育，一個孩子從初中到大學畢業要有十年的無償投資期，雖然時間漫長，不過熬到回收期卻能倍數成長，況且，江志如的四個孩子各間隔二歲，排序前面的孩子大學畢業就能回饋家庭，協助父母分擔弟妹的教育費和生活費。此外，江志如的長女、長子都讀公費大學或軍校，兩個小女兒大學時期則是半工半讀，因此，江志如的投資期比預期縮短一些。而且，長女公費留學美國並取得碩士學位，當時有「喝過洋墨水」更值錢的社會現象，讓江志如在子女教育投資上獲得驚人的實質回報。



## (2)早年正向的讀書經驗強化讀書的價值感

如果撇開現實觸發的動機和市儈的計算，江志如早年生命的某個部分必定隱隱震動，影響著她的價值觀與決定。江志如自陳喜歡讀書，功課很好，而且家裡也供得起她讀書，童年美好而正向的讀書經驗，以及孺慕父親「文人」的形象，都使她對讀書這件事充滿好感。而且，江志如的兩個兄弟都不愛讀書，勉強讀完小學，相形之下，她更清楚自己在讀書上的才能。在混亂的年代，她因為「書讀得多，字寫得好」而被追求成婚；反觀丈夫的前妻，因為「沒讀過書，也不認得字」而被有中學學歷的她取而代之；弟弟因小學學歷而找不著工作，在丈夫號子裡工作又被嫌棄；上有長兄，長兄卻因為不愛讀書而隨父母沉淪鴉片癮，無法扛起破產的娘家。這些深刻的對比經驗強化了江志如對讀書的價值感，並深入潛意識中，在日後適當的時機發揮作用。

## (3)延續父母未完成的求學之路

江志如愛讀書，也能讀書，但她美好順利的求學生涯卻是硬生生地被切斷，因為國家戰亂、娘家破產，她也因此墮入風塵。成為富商太太後讓江志如再度飛上物質生活的雲端，卻又重重摔落地面，這回雖然不至於重操舊業，但生活之困苦令她恐慌。當丈夫生意失敗，得彎下腰來求一份工作時，卻受限於學歷而沒有選擇，只能忍氣吞聲在朋友處「幫忙」。經歷過娘家與夫家的經濟挫敗，「做生意大起大落的，日子很不穩定」讓她重新評估從商的利弊得失，也讓她不得不相信「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而過去讀書中斷的遺憾與不滿足被現實逼進心裡的深處，至於沒走完的求學之路，就由延續父母生命的子女代為實現。

## (4)孩子能讀，老師能容

即使有前述的個人經驗或理由，結構性的因素還是不能忽略。做父母的希望子女讀書，也願意投資，但孩子本身是否具備符合期望的能力也十分重要。還有，教育是師與生的互動與緣分，有愛心又熱心的老師往往也是左右的關鍵。江志如就坦言，以他們的家境，連學費都繳不出來，更別說加強升學的補習費，但他們遇到數位好老師，因為他

們的包容才有孩子的成功。

#### 4.穩定心理危機

漫長的遷移適應歷程中，心理危機一直潛伏在移民心中，它能產生正向的動力促使移民做出相應的行動化解危機，若對策不當也可能惡化危機，使移民適應失敗。它是一體兩面的催化劑。

江志如來台的方式與途徑和多數移民不同，他們不是直接進入台灣，而是階段性的遷移，他們到台灣前，先居留香港一年多，這段緩衝期相當有意義。因為離開原社會，移民原有的社會地位也隨之瓦解，而受限於新社會系統的適應歷程，社會地位往往向下流動，而地位斷層帶來的危機又會影響適應情況。<sup>271</sup>江志如離開原居地的第一年，不復大陸時期的奢華生活，下降成自力更生的階級，劇烈的變化難免產生怨懟等負面心態，初期適應的急性問題在中介地香港已獲得緩和，之後獲准進入台灣，雖然又要重新適應新居地，但已有過渡期的經驗和期待入台的心理，看待台灣的心態較客觀而正面，有利於後來的適應。

遷移初期的「定居」，最重要的就是找到安身之處，然後才能有規律的飲食，進而謀得一份工作，維持生活。<sup>272</sup>在異地，能有安穩的家是安全感的重要來源，攤開江志如的生命故事，我們發現他們在遷移行動中始終嚴守「安家」這件事：江志如的丈夫先赴香港，安排好居處，江志如再帶幼小的孩子會合；後來他們到台灣亦然。一登岸即可奔赴早先在台北購置的房子；之後，從台北到新潭門，再到老潭門，他們總是先買地蓋屋，不是因陋就簡的湊合。相較於當時許多移民借校舍、搭帳篷做為遮風避雨的棲身之所，像樣的「家」多少發揮穩定江志如漂泊的心理危機感。

還有一個因素也不能忽略，就是漢人對血親的心理依賴。對政治移民來說，親情的切割是一生的遺憾，尤其是江志如與原生家庭有非常緊密的關係，所以初赴香港的三個月，至少有胞弟陪伴，而後到台灣又有江志如的小叔，都是心理的穩定力量。雖然江志

<sup>271</sup> 廖正宏，《人口遷移》（台北：三民，1985），頁 187-188。

<sup>272</sup> 廖正宏，《人口遷移》（台北：三民，1985），頁 170。

如丈夫對弟弟投資失敗非常不滿，但在異地能有血緣至親可以依靠，有困難可以互相商量支援，比起許多在台舉目無親的移民來說，心理上還是踏實得多。再者，遷移到台灣的大陸商人以上海最多，江志如丈夫擁有同樣的地緣與身份，讓他們比一般移民在台灣擁有更多的人際網絡，也算是一種「泛地緣」關係。

謝高橋在高雄市人口遷移研究中建立了一個因果路徑模式，來驗證遷移適應程度轉變的過程，該模式顯示移民初期適應程度是隨後適應程度的有力因素，而初期以對目的地的瞭解最重要。<sup>273</sup>江志如舉家移民台灣，是經過理性的選擇，而且，在台灣他們有自己的房子足以遮風擋雨，有所剩無幾的生意資金得以暫時支撐生活，也有血緣關係的親戚和泛地緣關係的同鄉商友，他們移民台灣的初始條件算是相當具有優勢的，不過，還必須有其他條件幫助他們適應遷移生活而落戶生根，這個條件就是胡台麗從榮民的口述生命史中歸結出的：「他們必須與臺灣社會其他族群接觸才能為生命添加意義」。<sup>274</sup>沒有對新居地產生莫名的排斥或忽視，奠基於直接而自然的生活接觸，逐漸形成一股來自在地社會的拉力，協助江志如更能積極面對異地生存的挑戰。

江志如選擇與孩子一起在台灣成長、重新學習，這就是散居的大陸人必須面對的現實環境，他們努力讓自己土著化，讓自己盡量與當地人一樣。舉家輾轉從香港到台灣的江志如，不論是在台北、新潭門，或是老潭門，他們必先建屋安家，抱著長居的打算，這樣的心態也有助於他們土著化，發展出與人、與地的長遠關係。

### 三、「同化」的指標：游移的雙重認同

吳乃德認為族群意識的產生必須包括三個要素：群體的認同、群體利益的認識和行動的可能性，而群體認同是族群意識的基礎。<sup>275</sup>那麼，如果「外省人」是一個族群的話，他們必須要先有我群的意識和認同，前一節我們看到集居的外省人因為有合適的場域使他們產生我群與他群的明顯界線，也提供他們實踐我群認同的機會，但他們認同的「我

<sup>273</sup> 轉引自廖正宏引用謝高橋的研究。見廖正宏，《人口遷移》（台北：三民，1985），頁 179-180。

<sup>274</sup> 胡台麗，〈芋仔與蕃薯——台灣「榮民」的族群關係與認同〉，收入張茂桂主編，《族群關係與國家認同》（台北：業強，1993），頁 301-302。

<sup>275</sup> 吳乃德，〈省籍意識、政治支持和國家認同——臺灣族群政治理論的初探〉，收入張茂桂主編，《族群關係與國家認同》（台北：業強，1993），頁 29-30。

群」是眷村背景的外省人，同樣被圈限的一群人。由於沒有區隔的意識從中阻撓，江志如與客家族群處在對等的地位上，生活中真實而密切的接觸，化解對他者不實的想像或指控，並產生親切而友善的認同感；相反地，對同樣來自大陸的群裔，她的觀感卻是「很勢利」、「生活習慣很不好」，更表示「沒有什麼往來」。江志如無法對外省人的群體產生認同感，因為這批政治性移民本來就是異質性的，她也沒有適合的日常場域（即集居）讓她能不斷實踐、操演「身份的認同」，她對同批移民自然無從產生出擬親屬的關係。所以，我們發現散居的江志如欠缺根本的群體認同，遑論更高層次的族群利益的認識和行動。即使我們假設她對該群體仍有相當程度的情感認同，但族群認同是可以改變的，不同族群間社會互動的程度愈高，族群界線愈容易鬆動，族群認同也愈容易產生變化。<sup>276</sup>所以，散居的條件與環境，充分提供她趨向密切往來的客家族群而產生新的認同。不過，產生新的認同，並不表示江志如就必須放棄原有的認同，雙重認同還是可能的，我們以為江志如即具有雙重認同，只是在沒有特別的外在刺激時，她的「外省人認同」比較不明顯。

如果我們能理解有「中國結」與「台灣結」的雙重認同，那麼我們可以將它們視為認同程度不同的光譜（請見圖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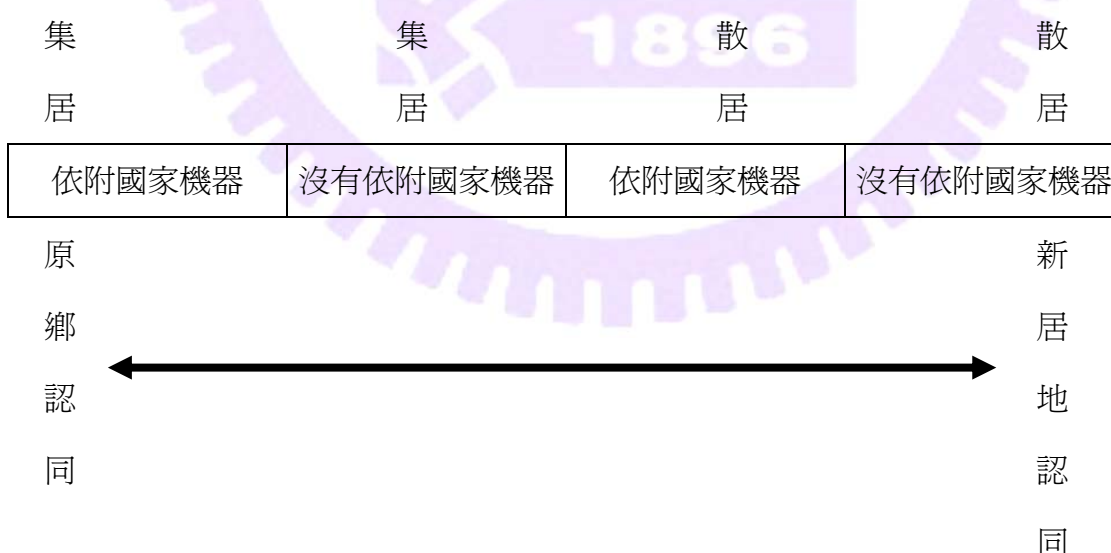


圖 4 雙重認同光譜

<sup>276</sup> 吳乃德，〈省籍意識、政治支持和國家認同——臺灣族群政治理論的初探〉，收入張茂桂主編，《族群關係與國家認同》（台北：業強，1993），頁 36。



一端的背景是集居並依附國家機器，站在這個位置上的移民群有足夠的政治外力使他們不斷再生產相似的族群認同和國家認同，相對的另一端則是散居且沒有依附國家機器，原初的家鄉情感與背景不會再被強調，而退居心靈一角，也因生活空間和高度互動而不斷增強對在地族群的新認同。當然這是這兩種認同的極端，受系統因素和個人因素的交互作用，實際上的認同或多或少都會兼具兩種認同，而且很可能在光譜中不斷來回移動，不過通常第一代移民對原居地的認同相對來說是比較高的，這也是他們適應較為困難的結果，但隨著時間的推移，移民，尤其是第二代以後的移民，對於新居地台灣的認同比重將會愈來愈大，而終至完成整個遷移行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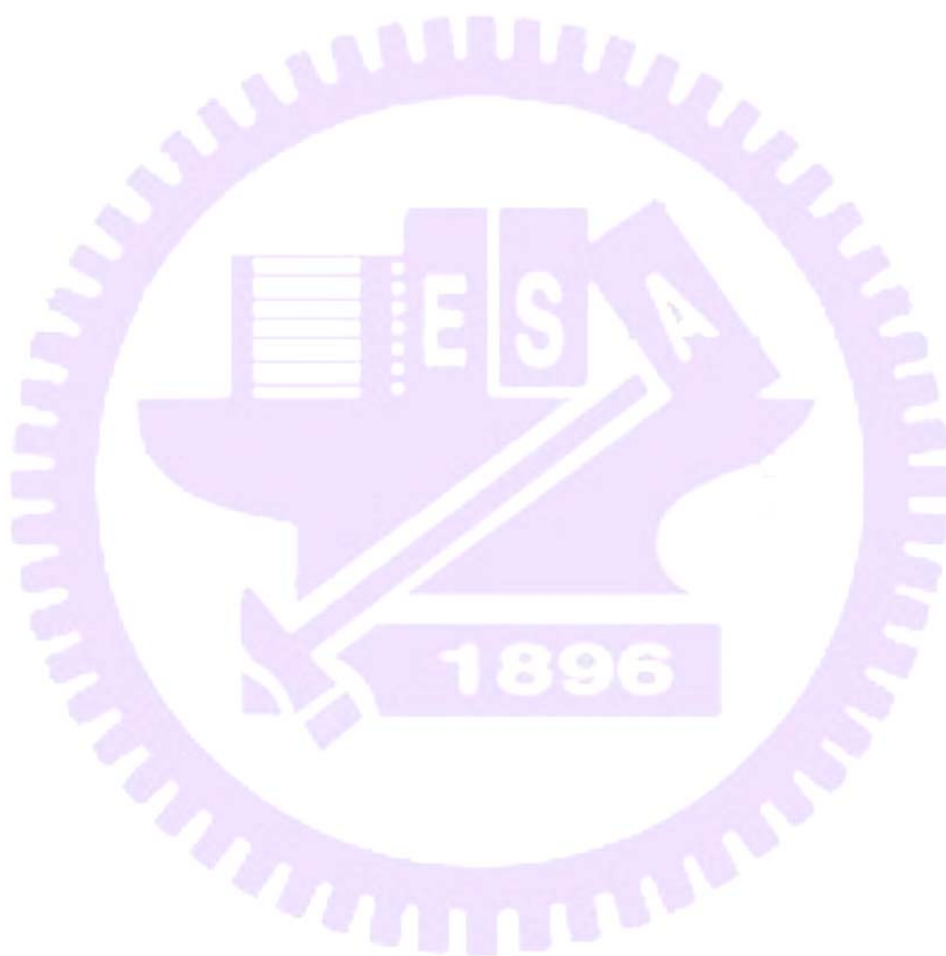
## 小結

從移民適應的層面來看，我們清楚發現外省人因為一開始依恃的移民網絡不同，使他們從遷抵台灣就被推向集居或散居的兩種適應典型。不同的適應典型所採取的適應行動當然不同，得到的在地發展也就有很大的差異，比如社會網絡、本地語言都有截然的分別，與本地社會的距離也就有親疏之分；此外，緣於本身的生命脈絡，他們對教育的需求動力也不同。而深層的心理危機，並非單純地隨遷移時間增加而降低，而是隨他們的適應情境而不斷變動，所以，集居外省人的心理危機不減反升。移民的心理危機會持續到他們同化於本地社會，不再覺得自己是「外人」，而別人也不以「外人」看待之，也就是在各方面都分不出界線為止。

散居外省人在遷台之初即與本地社會產生密切的交往，因而有較佳的機會認同新居地，集居外省人受限於政治力量則欠缺這種機會，不過隨著社會改革與都市更新計畫，老舊眷村面臨拆遷或重建的命運，許多眷村家庭也早已搬離，實體眷村已逐漸消失在歷史演進中，至於眷村精神或認同則有待時間的考驗。

本章從移民適應的角度分析前一章江志如的生命故事，雖然江志如只是散居外省人

的一種典型，不能代表其他外省人，但她讓我們看到自然情境下的移民適應，而且理解外省人是異質的集合體。下一章，我們將轉而從接納移民的社區視角，分析此一故事。



## 第四章 老潭門的開放性與變遷

上一章，我們看到移民在適應的層面上，除了個人因素，系統的因素也至為重要，它與個人不斷地互動衝擊，從而產生新的生態，新的系統因素繼續與個人互動，產生更新的生態，就這樣不停地循環，也不停地前進，個人與系統皆處在變動不居的情況下。系統因素指的是環境結構，包括遷入地整體社會、遷入地的地方社會、個人所在的各級團體等，多重而複雜。地方社會是移民居住與活動最頻繁的場域，也是讓移民感受最直接而深刻的系統因素，所以，本章將討論承載移民的地方社會。老潭門社會以自己的邏輯接納外來移民，而移民透過參與廟會、建立在地社會網絡，或是族群通婚，與社區緊密結合，老潭門社會就在內外環境持續的互動下，產生實質的變遷。

### 第一節 老潭門社會的開放性

潭門是一個宗族的社會，幾乎所有的居民都屬於宗族，形成一個血緣團體；宗族擁有潭門絕大部分的土地，並聚居在自家的土地上，當地口語化的地名往往以「屋」稱之，宗族有地域化的現象，也可被視為地緣團體。宗族裡的個體能共享土地、灌溉水源、其他家戶的部分財產（指的是禮物交換），往生以後能進祖塔接受祭祀。也就是說，從生到死都與宗族依存，脫離宗族，他們將無從定位，也下降成無產階級。<sup>277</sup>所以，潭門是典型的依血緣、地緣而居的漢人社會，雙重的連帶關係穩定了潭門社會的結構。宗教信仰以廟會的形式更進一步地連結所有宗族及其派下的家戶，不論是村廟三元宮的廟會或是聯外的義民廟祀典輪值，透過一次次的廟會把社區織結出一個以社會、經濟、宗教，三位合一的、主流的社會結構。

<sup>277</sup> 羅鵬華，《大潭門的歷史人類學探討》（2001）。

傳統潭門的土地幾乎都屬於宗族，而且不會以商品的形式在自由市場流動。1798 年潭門開庄拓墾，最初土地是以商品的形式陸續流入親自入墾的和後來移入的粵籍移民手中，但已建立宗族的粵籍移民在取得土地以後，將土地轉換為禮物的形式，只在父子間傳承。<sup>278</sup>由於宗族掌握的土地不輕易以商品的形式在自由市場流通，使得潭門的社會結構更為固著，甚至看起來呈現靜止的狀態。無論如何，以宗族為核心的社會結構是老潭門的基石。

經過兩個世紀的歷史發展，潭門三個主要區塊中，只有老潭門一直維持著農業社區的特質，因此，自十八世紀晚期潭門開庄墾殖以來，老潭門奠基於宗族、農業、廟會交纏的社經結構，發展出同質而靜態的社會特質。<sup>279</sup>然而，老潭門不同於一般傳統農業社區，她特殊的歷史經驗，使她發展出獨特的社會結構與氛圍（請見圖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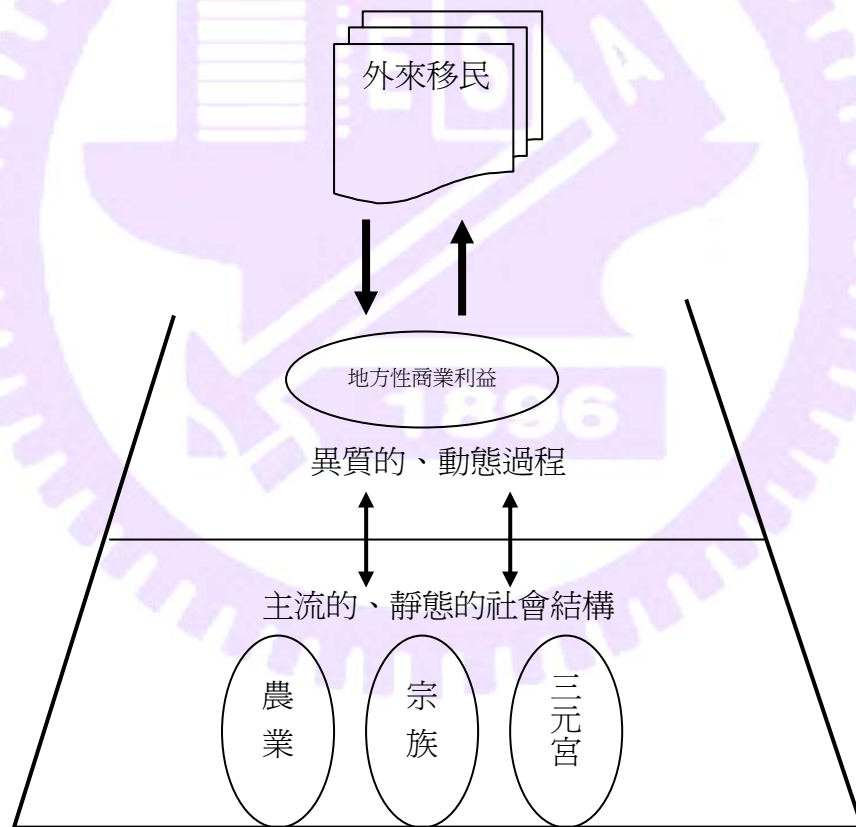


圖 5 老潭門社會結構示意圖

<sup>278</sup> 羅鵬華，《大潭門的歷史人類學探討》（2001），頁 98-99。

<sup>279</sup> 潭門三個主要人口聚集區，依其發展先後分別為河口淘、老潭門和新潭門，河口淘自光復以後，部分土地被徵為軍用地，後來其他土地也被劃為工業區；新潭門則因火車站和行政中心的設立而朝商業區發展。



老潭門不只是農業社區，她還有商業街區（就是現在的「潭門老街」），老街上那一排日治時期的富麗建築其實相當高調地宣告她繁華的過去：廿世紀初，這裡曾經是商業中心、行政中心和宗教中心。上溯自開庄時期，潭門即因交通輻輳的地位，成為地方性的商業中心，後來「大潭門驛」設站的加乘，吸引了四方的商戶及旅人，老潭門的商業街區昌盛了五十年。但是這股商機並未獲得在地宗族的青睞，參與商業街起造者是鄰區的吳屋和外地商人，街上的職業分化很細緻，人口也多是外來者或是當地非宗族的苦力階級。而且，因為限於地方性的商業利益，這裡的店屋轉手率非常高，人口的流動也很快速。<sup>280</sup>於是，我們看到商業街區相對於廣大的農業社區，它是外來移民的集中地區，充滿異質性，而且處於變動不居的過程。

商業街區與整體社區的確有非常明顯的對比，它特殊但不孤立，二者之間透過土地而連結。商業街區的店屋與土地的所有權是脫勾的，土地仍握在宗族的手上。宗族所擁有的土地雖然不能買賣，但是可以出租。1920年，商業街區在蓬勃的商機中出現，就是地主羅育進將三元宮至大潭門驛的土地無限期出租，供人起造店面。<sup>281</sup>也就是說，逐老潭門商機而來的人，欲在街區立足，就得向地主承租土地，自建房舍，無論是鄰區的吳屋或是外地商人皆然，這是商業街區自起始即有的邏輯。只要依循這個邏輯，就能在老潭門生存，這就是老潭門的開放性。

而且在日常生活中，商業街的商戶與社區的居民也有直接的互動。農戶將自己的收成運到街上販賣，商戶向農戶購買蔬食，居民上街採買生活所需的商品。也就是說，老潭門人以實際的行動與商業街區和移民發生關係。所以，我們看到具有穩定力量的底層結構與不斷流動的表層結構互相連結，農業與商業、宗族與外來移民，皆在三元宮的宗教氛圍下，共生共榮，也凝聚了認同。

當1929年火車站撤離，行政中心遷移，逐利的商戶也隨之出走，原有的商潮立即消退，商業街區繁華的風貌就成為老潭門人鮮明的歷史記憶。因為建物與土地權的分

<sup>280</sup> 羅鵬華，《大潭門的歷史人類學探討》（2001）。

<sup>281</sup> 「羅育進」為假名。羅鵬華，《老街講古》（2004），頁65。

屬，使老街上的大正建築被完整地保留下來。<sup>282</sup>街區雖不復往日的熱鬧，還是有少數的店家和臨時的攤販，仍是老潭門人進行商品交換的空間。

這麼說來，老潭門社會對移民而言是開放的，不過這種說法並不精確，我們以為老潭門社會有其開放性，但並不全然開放，因為它自有一套開放的邏輯：在商業大街，外來者只要透過土地承租的方式，就能取得居留老潭門的正當性，也能與當地社區產生進一步的互動。

## 第二節 一體的兩面：老潭門社會提供移民適應的助力和阻力

不同於廿世紀初期因經濟拉力而來的商業移民，光復後遷入老潭門的移民主要是軍人（具軍人身份的外省人）以及不具軍人背景的外省人。

台灣改治，國軍接收位於老潭門後山的日軍營地，外省軍人隨部隊駐紮於此，休演出營的阿兵哥在街上來來往往，讓商業街似乎又恢復昔日的商機，但這些為數眾多的駐地軍人只是老潭門短暫的過客，一旦調防或退役即離開老潭門，與社區的關係無法深耕。而部分軍人與在地的客籍女性通婚，退役後即落戶在老潭門，繁衍下一代。透過妻子所擁有的客語能力和社會網絡，這些外省人也能習得本地語言，並與社區產生密切的互動，而在地成長的子女更能協助他們持續深化與社區的關係，進而成為客家村落永遠的一份子。

還有一些期望藉助老潭門再起的商機做生意的外省人舉家遷入，本研究的江志如即是。江志如到老潭門定居，是為了駐地軍營可觀的休閒消費能力而來，他們在商業街區開了老潭門的第一家戲院。台灣在日治時期就引進了戲院和電影，戲院是現代社會時髦的休閒象徵，這對老潭門而言是件盛事，當時的潭肚村村長詹守和夫婦親自登門拜訪，到新潭門表達歡迎之意。但江志如要在老潭門立足，除了必須具備開設戲院的能力，比

---

<sup>282</sup> 羅鵬華，《老街講古》（2004），頁 19。

如透過開影片公司的朋友確保取得影片的管道，更關鍵的是向商業街的地主租地蓋戲院。

總之，無論是因為通婚而落腳的外省軍人，或是開戲院的江志如都是依循老潭門社會的邏輯，經由承租土地，進入老潭門。

宗族與廟會是老潭門社經結構中的兩個關鍵性的力量，它們凝聚了某些人，同時也排拒了另一些人。在潭門，土地的擁有、廟會等公共事務的參與，都是以宗族為單位，個體必須先成為宗族的一份子，才能與社區緊密地連結為一體。反過來說，如果不是宗族的成員，也就無從擁有土地和參與社區事務，共同體的感受無法萌生。這些外省移民不可能成為老潭門宗族的一員，他們從遷入社區開始就已經註定要失去或被迫放棄上述資源和權利而被邊緣化，成為社區的游離者，不過，他們雖然不能成為宗族的一員，但凝聚全村的宗教組織是解套的辦法。

老潭門共同的宗教信仰從早期自願性質的嘗會，發展為普遍性的義務性祭祀組織，也就是廟會，從少數菁英份子到全村村民的參與，這個大躍進把各宗族整合在一起，也把整個社區組織起來。<sup>283</sup>

所謂參與廟會，就是題丁，繳納丁口錢，也就是捐獻。三元宮的丁口錢雖以家戶為收取單位，但實際上是以丁份為經費計算的單位。也就是說，有題丁者就能受到神明的庇佑，象徵在宗教之下人人平等的意涵，它超越貧富、派系。<sup>284</sup>所以，即使不是宗族，透過參與廟會也能與社區結合為一體。在老潭門落戶的外省軍人因為客籍妻子的關係，全家都有參加題丁，但是信奉基督教的江志如夫妻就不曾有這樣的廟會經驗，無法藉由廟會與社區凝聚成一體。

江志如以一個外來者的身份進入老潭門，雖然無法經由傳統凝聚的媒介——即廟會，與社區結合為一體，但是在日常生活的場域中積極習得的客語讓他們能與本地居民有良好的溝通，另一個更重要的關鍵則是與本地宗族的重要人士保持密切的關係，建立了非常綿密而深厚的在地社會網絡，獲取相當程度的資源。以下我們舉例說明江志如家

<sup>283</sup> 羅鵬華，《大潭門的歷史人類學探討》（2001），頁 72-77。

<sup>284</sup> 謝國雄，《茶鄉社會誌：工資、政府與整體社會範疇》（台北：中研院社研所，2003），頁 209-210。

所建立的在地社會網絡。

江志如從新潭門到老潭門開戲院是得到潭肚村村長詹守和的協助；他們後來把戲院旁的住家贖回轉賣給街頭的饒家時，住饒家旁邊的村長詹守和是介紹人；三十年後，江志如搬離老潭門，空下的戲院租給了詹守和的女婿黃先生，其實那時詹守和和他的女兒都已經過世了。所以，江志如說詹守和「很照顧」他們，精確的說法應該是他們與詹家持續保持友好的關係。而且詹守和當了九屆近三十年的潭肚村村長，在任內去世，他的兒子詹明泰經補選接任村長，直到江志如搬離老潭門時，詹明泰仍是潭肚村村長，江志如在老潭門的三十年間一直與村長家有所互動，是他們在地網絡建立的關鍵。<sup>285</sup>戲院經營不如預期，生活陷入困境時，從江志如求援的對象可以更清楚地浮現網絡的密度。江志如不得已得把住家押掉以換取現金時，押給何人是一個學問，必須是有財力又能被信任的人，後來由一位甘先生出面協助，他有兩位同宗兄弟在當時先後擔任宜曲村和潭門村村長，甘先生的妻子也與江志如保持友善互助的關係。戲院要借戲班，住對面的吳先生不但借錢給他們，陪江志如去借戲班，還騰出住家的空間給戲班演員住；不只吳先生，左右鄰居也都免費借住。伸出援手的還有地主羅德義，江志如記得：「地租收得很便宜，一年交一次租，如果交不出來，會通融讓我們晚一點交。」不但地租廉價，而且能通融他們非惡意的滯納，不過他們是長期拖租，遲繳二年是常態，有三個年度甚至欠租長達五年。地主能包容這樣的承租者，對江志如而言，在心理和經濟現實面都是重要的支持力量。江志如搬離老潭門數年後，也透過地主兒子的介紹將戲院轉賣給同宗族的羅鵬華。

戲院勉強經營十個寒暑，為老潭門商機而來的江志如家並不像其他商戶，生意失敗就離開，他們在老潭門繼續居住二十年，我們相信這與他們建立起的在地社會網絡有關，我們可以從江志如現在的人際往來來看：

來往的朋友，現在就剩校長太太……後來他們也搬到台北，我們一直有來往。

現在我們比她好，過年過節都有表示，過年就給個大紅包。她先生過世了，她住養老院，心臟動過手術。我們跟她最多來往，但我們跟鄰居也有來往。……

我覺得客家人很好。外省人不多，有軍眷但不多，我們沒有來往。……先生那

---

<sup>285</sup> 「詹明泰」是假名。



邊的朋友沒有往來，小叔住桃園，因錢被敗光，先生怪他，比較不來往，婚喪喜慶才有。<sup>286</sup>

丈夫那邊的外省圈子都已瓦解，與丈夫胞弟的家族往來也少，而她自己的人際圈子，外省人中只有校長夫人至今仍相依相持。動過髖關節手術的江志如，年事已高又行走不便，能讓她出門的理由，除了看病、上基督教的聚會所，就是重要的人際往來。她會去台北的養老院探望校長夫人，會特地包計程車到潭門參加台元同事子女的婚禮，日常電話的問候也以昔日客家同事為主。她的子女也常回老潭門拜訪鄰居和朋友，並帶回鄰居致贈的客家美食給她回味。可見江志如對老潭門、對客家經驗的認同明顯超過對外省人的認同，但是，江志如終究還是離開了老潭門，不像許多外省軍人成為真正的在地人，何以如此呢？

有關潭門外省人的土著化尚未有完整細緻的研究，但有一個例子可以在此做對照討論。隨裝甲部隊進駐老潭門的外省軍人賈穎華，他娶了本地客籍妻子，退役後定居在天主堂附近。<sup>287</sup>他不但積極參與社區的公共事務，還曾經擔任潭肚社區發展協會的總幹事，與土生土長的在地人一同推動社區總體營造，與老潭門真正地結合為共同體，他自言要「與老街長相廝守」，而他一生也的確未曾離開。<sup>288</sup>江志如之所以離開，賈穎華之所以留下，自然導源於各自生命脈絡的發展。對賈穎華而言，族群通婚帶來強大的血親網絡的牽制力量，以及潭門宗族成員對土地的依賴，使賈穎華與客籍妻子留在老潭門；對江志如而言，既欠缺族群通婚和土地的牽絆，又多了高等教育使子女往都市謀生的推力，使得年老的江志如夫妻最終仍離開老潭門，到台北依親。所以，對漢人而言，血緣連帶的強度仍是高於在地社會網絡的地緣性。

老潭門不是一個純然的農業社區，土地與建物所有權分屬的特性，是社會系統能接納外來者的邏輯，而存在於系統中的個人行動者，不論是在地居民或是外來移民都有主體的意識與行動，個人與系統交互作用，產生不同的互動結果。因此，外來移民可以藉

<sup>286</sup> 引自江志如的訪談稿，2007.05.11。

<sup>287</sup> 「賈穎華」是假名。

<sup>288</sup> 參考賈穎華，〈五十寒暑老街情〉，《青年日報》2002.02.03。定居老潭門四十八年的賈穎華于同一年在空難中意外喪生。

由參與廟會，透過家戶捐獻和儀式與社區凝聚成共同體；建立深厚的在地社會網絡，與在地居民保持密切的互動，獲取資源，發展在地認同，也是移民生存適應的另一個重要面向，而族群通婚所帶來的血緣與土地的牽絆是外來移民土著化，成為真正在地人的關鍵因素，而教育是另一股重要的推力。

### 第三節 老潭門社會的變遷

任何一個社會系統都有其特質，因而對移民提供不同的助力與阻力，有些移民能夠落地生根，同化於該社會，成為永遠的一份子，有些移民最後還是離開。但不論移民適應的結果如何，移民的遷入，對於接受移民的社會都是一種刺激，該社會必然會有所變化，這看起來是內部的質變，不過我們必須記得，沒有一個社會是完全孤立的。任何一個地方社會都是另一個更大的社會的一部分，它必須與外界保持連繫和互動，所以外部環境的影響也不能忽略。內外因素交互作用下，社會樣貌就被改變了；其實，社會本來就是動態的，它持續不斷地改變，永遠沒有終點。

老潭門究竟有何變遷？我們試著從光榮戲院的變化來理解。

老潭門的商機因火車站撤離而萎縮，但是光復以後，政治環境變遷為老潭門帶來大批外省軍人，商機因此再度湧現，吸引了上海商人江志如丈夫的青睞，於是，商業街上開了老潭門的第一家戲院，它的存在某種程度改變了老潭門。光榮戲院的主要客群是外省軍人，但在地居民也有機會進戲院，透過觀賞相同的電影片子與老潭門以外的世界連結，操演現代社會進步的休閒活動。

但是，戲院經營才一年多，軍方調防制度改變，後山軍營的生活管束改變，光榮戲院的營運也跟著改變。戲院的性質從純電影的戲院走向電影與歌仔戲的混合戲院，在關閉的最後幾年已完全是演歌仔戲的戲院了，這充分反映戲院客群的變化，軍人與在地居民的主客觀眾群易位，也間接反映青壯人口在農村社會結構中的薄弱，在工業化下，農

村只餘下老人和小孩。

戰後的台灣，雖然民生凋敝，百廢待舉，但是復甦的速度很驚人，短短二十年裡，不但重振農業，更積極發展工業。工業需要密集的勞力，優渥的報酬迅速吸收農村的剩餘人口。民國五〇、六〇年代，老潭門的青壯人口流失得非常嚴重，沒有土地可依靠的外省移民得到外地的工廠謀生；土生土長的在地居民即使有土地，也同樣無法抗拒這股新興的工業風潮。工業化同時也帶來都市化，農村人口向都市集中，都市在無法負荷的情況下只得向外擴張，不停地吸收農地，於是農村向都市靠攏，許多農村漸漸消失，沒有消失的也處在危殆的狀態下。老潭門百年來穩定的社會結構經歷了前所未有的大震動，結構的基石已被工業化和都市化掏空。

讓農村子弟外流的原因不只是經濟的作用力，教育也是推手。日治時期，因為日本的殖民政策，使台灣的教育雖然有相當程度的普及，但幾乎只限於小學，光復以後，台灣教育的質與量都有顯著的提升。由於工業社會的腳步快速，社會對初中教育有高度需求，於是在民國五十七年實施九年義務教育，農村子弟也得以延長受教年限，進而對高中、甚至對高等教育的渴望與需求也與日俱增，工業化的激烈競爭使農村父母轉而認同教育的重要性，因而造成大量的農村子弟負笈至外地求學，而擁有高學歷的農村子弟往往在完成學業後，爲了更好的發展，選擇留在都市工作。

人潮是戲院生存的關鍵，商業街上的光榮戲院關閉了，也意味著老潭門再度失去人潮、失去商機，老潭門的商機在光復後只是曇花一現。經營困難的光榮戲院在風災的襲掠之下原貌受創，主人簡易修復後變更為自用住家，戲院正式走入歷史。二十年後，江志如舉家搬離老潭門，戲院也繼續以民房的形式出租長達二十幾年，最後轉手賣給有心保存戲院遺跡的在地人。戲院變成民房的四十多年是老潭門商機沉寂的時期，商業街僅是在地人基本生活必需品的交換空間。

戲院換新主人的時刻，也正是老潭門面臨新生的契機。老潭門人有意識地營造自己的社區，商業街以歷史文化街區的新形象出現在世人面前。<sup>289</sup>街上的光榮戲院也成為社區營造的元素之一，戲院遺址變成潭門老街觀光地圖上的一個焦點。曠廢的戲院經過一

---

<sup>289</sup> 羅鵬華，〈在歷史街區崛起：一間客家社區咖啡廳的故事〉，發表於研討會（2006年10月29-30日）。

番整修，在民國九十七年母親節前夕，以複合式的藝文餐飲空間再現，販賣道地的客家菜與自製的農特產品，以及藝術文物的拍賣或交換。在新主人的要求下，承租的經營者不得更動戲院的外在門面和磚牆壁面，但內部則是按餐廳經營者的在地客家理念重新構築。戲院煥然一新，重新出發，但戲院已不再是戲院，就像老潭門也不再是老潭門。

社區的變遷也同樣在天主堂身上得到印證。大陸淪陷，來的不只是外省人，耶穌會士也從大陸撤退轉進台灣。義大利籍的天主教神父接受新竹教區的傳教活動，選擇老潭門為落腳處，在商業街上，從小小的圖書館發展成莊嚴的天主堂，教友人數雖然無法與三元宮的信徒相提並論，但在民國四〇、五〇的艱困年代，無論是不是教友，老潭門人幾乎都領受過天主堂的救援物資，附設的日新幼稚園及教區也成為孩童遊玩成長的地方。<sup>290</sup>因為教友人數日益減少，老潭門的天主堂在民國八十二年關閉，終止了二十八年的宣教歲月，被新潭門的天主堂取代。仍佇立在街尾的天主堂與戲院一樣成為老潭門社區營造的重要元素，重新賦予天主堂與社區結合一體的新生命。天主堂重新開館了，坦克車也來了，裝甲營贈送給老潭門社區的「禮物」就被擺放在天主堂的戶外園區裡，雖然顯得突兀，但這就是新生的老潭門。

我們回過頭去看看是什麼力量迫促老潭門變遷？政治、教育、經濟、工業化、都市化、全球化等都是，面對外環境愈來愈巨大的壓力，老潭門向內索求、向下紮根，以在地化對抗全球化（請見下頁圖 6）。

---

<sup>290</sup> 「日新」幼稚園是假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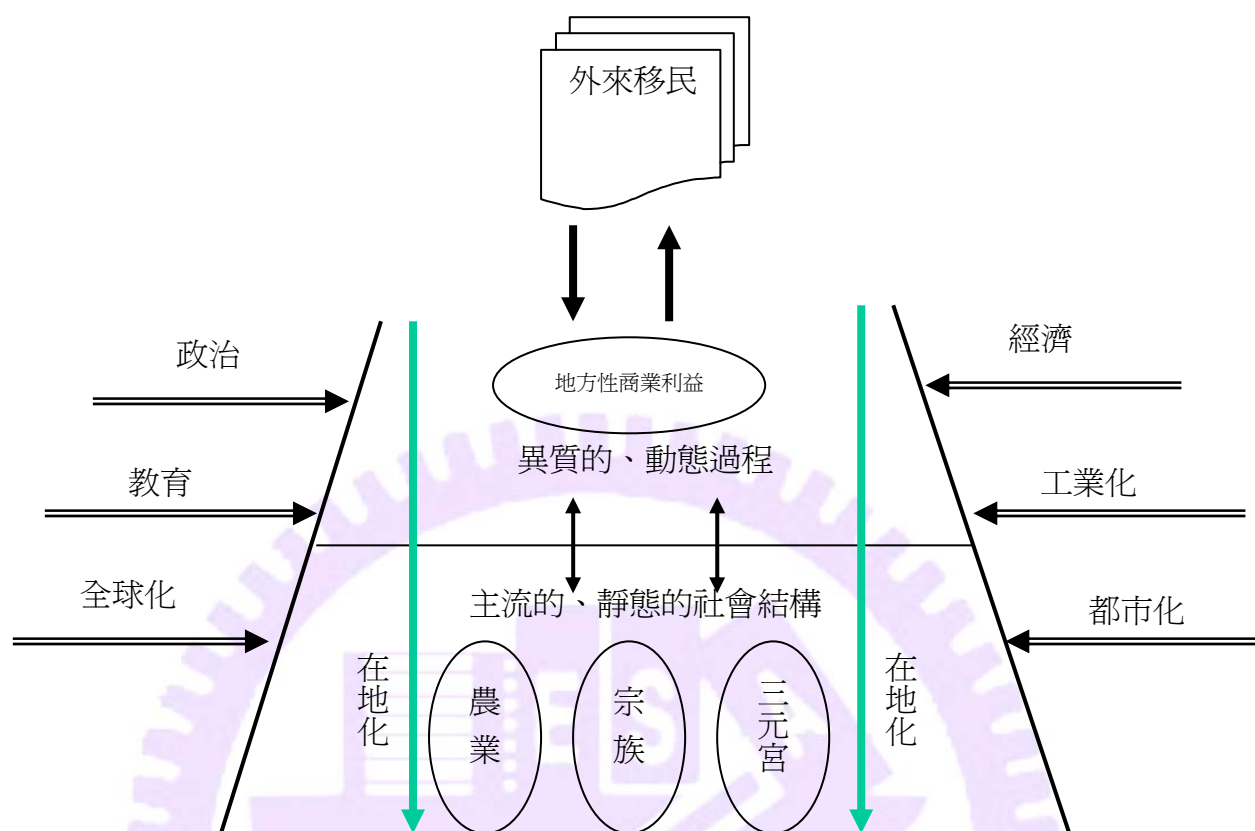


圖 6 老潭門社會變遷示意圖

台灣與世界經濟體系的密切性，使台灣深受資本主義的侵襲，再加上資訊高速流通，人們的空間感和時間感都被壓縮，全球化的結果是高度同質性。對地方社會而言，全球化在試圖消滅地方的文化與特色。全球化造成的危機感，促使地方社會必須採取行動，以確保自己的存在，這個行動就是在地化，也就是近年來流行的社區營造的概念。當一個社區需要營造，必定是有某種內在需求的驅動、外在的誘因和契機，三者同時到位方能啟動開關，老潭門也就是在這種危機感中試圖尋找自己，讓自己在全球化的同質化中產生差異性，進而使社區共同體化。

老潭門要從哪裡找回自己？日本學者宮崎清以為「『社區』乃『歷史』即『個性』」，只有低首檢視社區的歷史才能找回自己，也才有社區的特色，而不被消滅。<sup>291</sup>老潭門的社區營造算是起步得早，也頗有成果，成功地為老潭門找到新的定位，並行銷自己。

<sup>291</sup> 宮崎清之語，轉引自林信華，《文化政策新論：建構台灣新社會》（台北：揚智，2002），頁 137。

近十年來，我們看到老潭門以什麼做為社區營造的面向呢？做為基石的客家元素、農村特色當然不能少，但真正讓老潭門有別於其他客家農村的卻不是原來社會結構中的主流，而是異質的商業老街、戲院、天主堂、坦克車等。不論是主流的農業、客家、宗族、三元宮，還是異質的商業、外省人、軍人、戲院、天主堂，都在老潭門留下痕跡。我們以為藉由社區營造，老潭門人主動反思自己社區的歷史與文化，當社區將戲院、天主堂、坦克車等非客家的元素也納入其建構地方特色的同時，意味著人們回過頭去凝視社區的歷史脈動、文化生態與每個個體，承認這些非客家的元素是社區的一部分，也承認他們平等的地位，共同形塑了現在的地方結構與文化生態。所以，老潭門，這個客家村落，其實並不單純，外省人、軍人和西方宗教的元素都加進來了，成為共同體，實踐對社區的認同，也就是在地的認同。認同，是生活與情感一致的傾向，雖然中間仍有差異性，但已足以凝聚人與地。戲院、天主堂、老街、老潭門都還保留著昔日的外貌，但內裡是新生的，並非憑空創新，而是反芻自己的歷史與文化後的蛻變，不論是潭門的客家，還是客家的潭門都更顯新生的活力。

老潭門社會是變遷了，但變遷的只有外來的、異質的部分嗎？佇立在街尾，只有二十八歲的天主堂結束了；矗立在街頭，二百歲的三元宮卻晉身縣定古蹟。看起來答案是肯定的，但事實上並非如此。外來而異質的部分雖然在改變，或是消失，但是它們成為老潭門歷史文化的一部分，透過社區營造與社區更緊密的連結。而工業化和都市化、甚至教育，都嚴重衝擊了老潭門的人口結構和產業結構，以農業、宗族、三元宮廟會為核心的主流社會結構其實也在變。

老潭門商業街區的建物與土地的所有權是脫勾的，土地屬於宗族，不能買賣，但是，江志如在退休前買到了戲院基地的土地，又在多年後賣了戲院和土地。一個外來移民能買賣老潭門的土地，這意味著什麼？意味著老潭門真的變了。

## 小結

老潭門，是一個以宗族與廟會合一的農業社會，看似靜止的主流社會，早在二十世紀初迎接商業移民時就發展出自有的邏輯接納外來者，所以，對戰後移入的外省移民而言，只要透過土地承租的方式，老潭門社會是開放的。落戶的移民與本地的宗族因為土地的租賃關係而有基本的連結，但要與社區發展出進一步的關係，還必須透過其他更積極的途徑，比如學習客語、參與廟會、建立本地網絡、族群通婚等等。像江志如這樣的純粹外省家庭，他們能操持客語、建立深厚的本地社會網絡，雖然信仰基督教讓他們無法藉由傳統的廟會與社區結合，但他們仍然認同老潭門，並與社區有某種程度的結合。而娶了本地客籍女子為妻的外省軍人，也能操持客語、建立本地的社會網絡，並參加傳統的廟會而與社區結合。以留下的外省軍人賈穎華與離去的江志如相較，族群通婚所帶來的血緣與土地的牽絆是留與不留的關鍵原因，而教育是另一股重要的推力。雖然江志如沒有成為永遠的老潭門人，但是老潭門社會仍因為外來者的加入而變遷。戰後的老潭門內外都有急遽的變化，外環境的政治、經濟、教育、工業化、都市化和全球化擠壓老潭門，內部的外來移民與本地居民彼此互動，也同時受外環境的影響，內外因素互相作用使老潭門的社會面貌不斷地推移。近十年來，老潭門致力於社區的營造，本地的農村、客家是當然的元素，但能見度更高的、與外省人有關的戲院、軍方的坦克車，甚至是天主堂，都在老潭門的歷史與文化裡留下深刻的軌跡，某種形式成為老潭門永遠的一份子。

本章從地方社會的視角，分析江志如長居的老潭門的特性，以及個別移民行動者在社區所提供的助力與阻力中，透過不同的行動實踐與社區結合，社區因而變遷。下一章，我們將聚焦在江志如身上，轉從女性移民的主體性與能動性切入第二章故事的分析。

## 第五章 她的主體性與角色轉變

本論文的第三章提出散居外省人的概念，並以集居外省（眷村）的概念對比，從而透顯外省族群之文化異質性；第四章承續前章散居外省之議題，以一個接受散居外省家庭的客家社區為例，討論社區之社會文化體系與散居外省家庭之間，所產生的長期互動關係。前述討論側重於結構面向，本章則轉從個別行動者，而且是女性行動者的面向，解析散居外省女性超越社會變遷的能動性。

個體是被社會文化結構制約的承載者，但也具有反思，甚至超越結構的能動性，而且不論是個體和其所處的時空皆變動不居。江志如的一生與劇烈變遷的時代同步，面對家庭困境、國家變故和社會變遷等不斷變化的外環境，不堪回首的負面經驗迫促她反思。教育、語言、社會網絡等，甚至是妻職與母職的角色都是她可憑藉或轉化再利用的資產。雖然身受傳統社會文化對女性的侷限，但是她的主體性和能動性在各種生命經驗中不斷滋長，也在這些過程中愈見清晰。女性主體意識由萌生、覺醒，再壯大到足以解構傳統社會文化賦予女性的角色，是一段長時的進程，主體性帶動能動性，進而超越二元性別（gender）框架的同時，其附加價值是夫妻間權力地位的消長。然而正如前文所言，女性行動者離不了她當時所處的社會脈絡，因此我們也必須探察江志如能夠掙脫傳統力量束縛的系統因素，方能理解江志如之所以能達到同時代女性無法經驗的女性自主，在個體本身或她所處的社會系統，都有其特殊性。

以下，我們將探析江志如在主體性發展的歷程中所採取的行動策略——同時利用外環境的變化以及個人資產，既成就移民家庭的適應，也成就個人權力地位的提升和自我的實現，重構個人生命意義的正當性。



## 第一節 女性主體意識的萌生

在漢人的社會文化中，女性深受父權社會結構的限制，行動空間被侷限在私領域，成為家庭中的無償勞動者，並以生殖的身體和母職實踐做為個人意義的正當性和終點。女性的主體性受到結構性的壓制，無論在公私領域裡，她們都居於從屬地位，沒有發言權，趙彥寧稱之為「噤聲的女性」。<sup>292</sup>在性別文化的制約下，女性主體意識的萌生或覺醒，必定有外在環境的刺激，所以女性個體得經驗一連串壓抑、觸發、反思、實踐、強化、累積的複雜歷程，才能取得主體性。

江志如所擁有的主體性也是長時的發展，從女性主體意識的萌生、覺醒、解構與重構女性角色，這三個階段並非可以截然切割、剛好接續，而是有若干的重疊（請見圖 7），而且主體性的發展與生命歷程有絕對的關係。以江志如而言，女性主體意識的萌生，與婚後生命斷層的調適有關；主體意識的覺醒，與遷移適應陷入困境有關；有了主體性的江志如解構傳統性別的框架，也重構個人生命的意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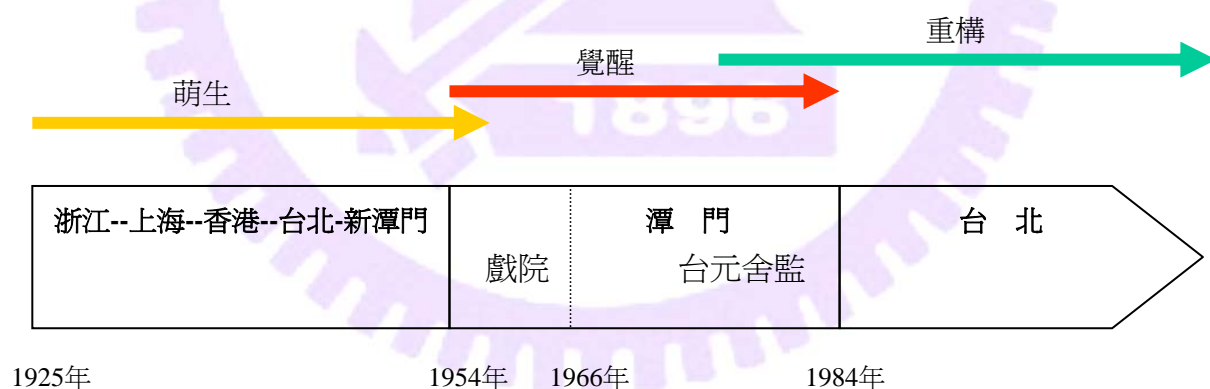


圖 7 江志如主體性的發展歷程

男性以其承繼的姓氏為家，不會因結婚而造成生命的斷層，而未婚的女性在原生家庭中，相較於兄弟是隱而未明的他者，婚姻則確定了她非此父系的身份，而成為另一父

<sup>292</sup> 趙彥寧，〈戴著草帽到處旅行：試論中國流亡、女性主體、與記憶間的建構關係〉，收入趙彥寧主編，《戴著草帽到處旅行》（台北：巨流，2001），頁 203-245。

系家庭的成員。女性婚前、婚後分屬於不同的家，必須經歷生命斷層的調適，走過陣痛期以後，婚後家庭的重要性往往超越原生家庭，而成為女性後半生努力耕耘的場域。<sup>293</sup>然而，這段轉換的陣痛期迫使女性反思自己的定位，自我意識也開始萌生。

十歲以前，江志如是浙江一間沒落米店的大小姐，雖然她沒有經驗到原生家庭真正富裕的時期，但是家庭的財富以教育資產的形式移轉給她，比起同時代絕大多數的中國女性，高一肄業的她擁有知識、書寫能力和主體的思考能力。因為鴉片走下坡的原生家庭，終於還是破產，但也開啓江志如工作的機會與經驗。為了解決原生家庭的經濟危機，十九歲的她跨出家的私領域，進入公領域，參與現實生活的競爭；為了轉嫁原生家庭的經濟重擔，她接受「買賣婚姻」，從公領域走進另一個家的私領域，回到傳統文化對女性的要求，在家裡扮演好妻職與母職的角色。此時的江志如雖然跨出私領域，但她很快地透過婚姻又回到私領域，而且要求「不做小的」，顯現她的思維與行動仍是複製並強化擠壓她的主流價值，以符合父權社會對女性的期待，然而認同主流價值並沒有轉換她的位階，她依然是「噤聲的女性」。

當丈夫不再履行當初談妥的條件，原生家庭的重擔又回到她身上，並沒有因為她結婚而轉移，反而是婚姻限制住她的發展，她無法像婚前那樣出去工作養家，此時她的主體性在丈夫與原生家庭的拉扯中滋長。女性主義者以為父權社會中性別文化賦予女性的妻職與母職角色是阻礙女性主體性發展的關鍵，女性被迫不斷異化以履行社會的期待，而喪失原有的女性自主意識。<sup>294</sup>但，事實上不然。雖然傳統文化制度對已婚女性有嚴謹的規範，但是，個體仍有其主體性和能動性，進而達成開創新局面的可能性。生了長女的江志如利用母職的機會，為自己的母親創造了照顧外孫女的保母工作，也利用妻子的身份為弟弟商討到布莊學徒的差事。而後，上海陷入嚴重的通貨膨脹，布莊生意和家庭經濟都受到相當嚴重的威脅，江志如的原生家庭變成丈夫不願再承受的負擔，她利用傳統女性的女紅繼續創造機會，「偷偷接織毛衣的生意」，為父親買冬衣。甚至當上海赤化，

<sup>293</sup> 趙彥寧，〈戴著草帽到處旅行：試論中國流亡、女性主體、與記憶間的建構關係〉，收入趙彥寧主編，《戴著草帽到處旅行》（台北：巨流，2001），頁214。

<sup>294</sup> 陳怡君，《日治時期女性自我主體的實踐——論楊千鶴及其作品》（台南：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頁83。

江志如要帶孩子到香港與丈夫會合時，也利用這個遷移的機會為弟弟開創到外地謀生的可能性，讓弟弟護送他們到香港並住上幾個月以謀求工作。

婚姻帶來的生命斷層還來不及調適完成，移民造成更大的生命斷層又隨之而來，江志如才萌生的自主意識因為移民而急凍。在戰爭與政治變局的特殊時空下，從屬地位讓女性幾乎沒有機會參與遷移行動，除非透過婚姻關係。江志如遷移到台灣也是透過丈夫的移民網絡，她本身的相關網絡因為移民而斷絕，就像許多女性移民一樣，完全依賴丈夫，經濟不獨立，也沒有自己的社會網絡。在香港以及在台灣的頭幾年，江志如致力於照顧年幼的四名子女和家庭，生活被侷限在家庭裡，母職的實踐就是她生命的意義。

傳統文化中，女性最主要的責任場域在家庭，但身為家庭中無償的勞動者，她的努力與付出往往受到忽視，沒有得到應得的尊嚴和地位，我們看到江志如剛結婚時，她當了少奶奶卻沒有受到尊重：「那時，我很痛苦啊，是心理上的苦，不是物質的。雖然有錢，可是我很痛苦啊！」原生家庭在經濟上對她的依賴，以及她對原生家庭的責任，強化了她在夫妻權力結構中弱勢的地位，而且那時她處在原居地的社會系統中，與她相關的社會網絡並未斷絕，傳統父權社會透過層層與她相關的網絡監視她，不允許她越界，那時的她也比較傾向於臣服傳統規範，主體意識還不夠強烈。但「為娘家想」，是江志如主體意識萌生的源頭，她的能動性在此時雖然不是無限制的施展，但在社會文化的箝制下仍有運用的空間。

## 第二節 女性主體意識的覺醒

國家動盪，在緊要關頭，江志如隨丈夫離開上海，到香港，轉台灣，又從台北南下新潭門經營農場，再到老潭門開戲院，都是丈夫的決定，江志如只是沒有聲音的從屬者。

吳孟潔針對大陸台商女性配偶的遷移與轉變的研究中發現，在移民的家庭裡，夫妻權力關係失衡的現象更為明顯，因為遷移對男性和女性是不同的經驗和挑戰。對女性而



言，受限於封閉的私領域和母職，又失去家務相關的支持網絡，比如原生家庭的協助，使女性在移民到新居地時更加依賴丈夫，家庭內部的權力關係更加不對等。然而，二十一世紀的台商女性配偶以參與虛擬的網絡社群來建立個人社會網絡，開闢不同於配偶的生活資源，進而平衡夫妻間的權力關係。<sup>295</sup>

同樣的狀況也在二十世紀的江志如身上發生。

遷移到台灣的前幾年，江志如在家庭經濟上完全沒有貢獻，只有無償地投入家庭和子女的照顧，所以，在家裡，丈夫講話最大聲、最有理，她沒辦法和丈夫辯駁，只能忍耐。此時江志如的處境，與其他外省女性，或是台灣本地的女性相同，都屈居父權社會結構中的從屬地位，安於扮演家庭裡的無償勞動者。然而，江志如的丈夫爲了在老潭門開戲院，變賣房產，又向朋友借貸，孤注一擲的結果是二十年揮之不去的惡夢，造成江志如生命的重大轉折，也提供她主體性發展的溫床。

雖然女性主義者以爲母職束縛住女性，但是女性並非在母職中沒有得到好處，尤其是在異地生存的威脅下，具有反思與能動性的個體會想辦法突破現狀，創造新的個人資源。在老潭門的時期，江志如爲自己開創了移民適應所需的資源，包括在地語言和社會網絡。老潭門商機萎縮，戲院經營困難，丈夫離家北上工作，江志如獨自在老潭門養育四名幼子，周圍盡是說客語的客家人，她在母職的實踐中，學會了堅強獨立；「要跟鄰居來往啊」，讓她也學會人際溝通所需的客語；四個孩子陸續屆滿入學年齡，孩子們跨出家庭，進入學校團體，江志如的生活範圍和經驗也就跟著孩子向外發展，接觸孩子的老師、同學，也跟著孩子學習國語。語言是移民在新居地建立在地社會網絡的關鍵，江志如與鄰居在日常生活領域中以客語互動，在地社會網絡逐步擴展。擁有在地語言和社會網絡對女性行動者而言是很重要的，再加上她個人的教育資產，這些資源是另一種足以與經濟資源抗衡的生活資源，成爲日後江志如突破困境的基礎。<sup>296</sup>

老潭門軍營制度的改變，戲院生意一落千丈，家庭經濟陷入困境，丈夫北上工作，

<sup>295</sup> 吳孟潔，《漂洋過海的生活：台商女性配偶的遷移與轉變》（新竹：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

<sup>296</sup> 生活資源的論述，參見吳孟潔，《漂洋過海的生活：台商女性配偶的遷移與轉變》（新竹：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頁 11-12。



把戲院交給江志如接手經營，她再度被迫跨出私領域，像男性一樣地為家庭經濟奮鬥。在工作和家庭中，她都必須自立自強。在惡劣的經營環境下，戲院原有的工作人員幾乎都被遣散，自己能做的事，江志如就自己做，以節省成本，比如賣票、偷學電影海報的書寫與製作等，但是對戲院來說，開源遠比節流來得重要，所以，面對軍人客源流失，戲院就轉型為搬演歌仔戲的戲院，以吸引在地客源，然而一切的努力還是敵不過大環境的變遷，看戲的主要階層是有經濟能力的青壯人口，但農村的年輕人都到外地謀生活，所以戲院終究還是倒閉。跨出私領域的江志如無暇顧及母職，四名年幼子女乏人關照，目睹孩子們晚上在戲院看戲看到睡著，讓她開始反思現況。對戲院經營的無力感，對丈夫信心的動搖，江志如反思解套的辦法只有投注在子女的教育，寄望未來。於是，她有意識地利用母職執行一系列行動，比如在牆上貼警語、塑造家裡讀書氣氛、嚴格分配子女讀書玩樂的時間等等。

江志如在原有的家庭責任之外，接手戲院的經營，增加了自僱的工作機會，空間的移動性提高，社會網絡也在擴張。苟延殘喘的戲院對家庭經濟的貢獻愈來愈低，謀事不順的丈夫也無法提供更多的支援，江志如利用戲院後來只在過年過節才營運的特點，並透過她自己的社會網絡資源，謀得一份學校臨時廚工的工作，以增加家庭收入；她也將生活重心再度拉回母職，嚴格督促子女讀書升學，拉長投資線。因為社會網絡和空間移動的擴張，使江志如獲致某種程度的經濟獨立，但又不影響母職的實踐，所以，雖然那時她的工作報酬仍不足以與丈夫所掌握的經濟資源抗衡，但加上她所擁有的生活資源，江志如還是成功地讓自己在家庭內的地位得到某種程度的提高，並掌握部分的家庭決策權，比如子女教育。但屬於丈夫管轄的戲院，雖然交由江志如經營，但她並沒有對戲院的決策權，丈夫的一句話決定戲院正式結束營運。可見得在家庭的私領域中，江志如還能有一些權力，但戲院被定位在公領域、男性的範圍，她仍是「噤聲的女性」。

戲院是丈夫留下的，她順從丈夫，嘗試維持戲院的經營，但戲院不可靠，丈夫也不可靠，在困境中必須自立自強的江志如，主體性及能動性迅速發展。

戲院結束後經過一段慘澹的生活，江志如憑藉她的學歷，獲得台元工廠女工宿舍舍監的工作。但這份工作對於外省人而言是一個挑戰，因為民間企業裡多是本省人，要與

本省籍同事有良好的互動，本地語言是重要的關鍵，更何況舍監是「管人的工作」，只有學歷恐怕難以勝任。不過台元工廠廠址在竹北，位於桃竹苗的客家區內，江志如說「大陸人很少，都是客家人，閩南人也有，比較少。」這對能操持客語的江志如而言，自然就減少了工作上的語言障礙。具備學歷和客語能力的江志如面對突如其來的工作機會仍是掙扎的，過去廚房臨時工的工作是貼補家計的副業，不影響母職，但是離家到工廠宿舍當舍監，意味著她得放棄對子女的照顧，也影響她對子女教育的監督。去與不去的矛盾，正是自主意識覺醒的江志如突破性別框架的最大關卡。不過，當現實生活無可承受的困境轉念成「為母則強」的期許時，她的主體性真正覺醒。

台灣從農業社會走向工業化，工廠吸收了鄉村過剩的勞動力，而當時發展的加工業、紡織業非常歡迎女性勞動力，工業化社會對中等教育的需求也升高，讓有初中學歷的江志如得以進入正式的工作職場。但是，整體社會文化對女性的期待仍是以家庭為重，工廠裡的本地女工多半是未婚女性，一旦結婚多數都退出職場，回歸家庭。<sup>297</sup>外省女性以家庭為優先的情況也差不多，第一代的外省女性絕少外出工作，通常以家庭代工的方式增加經濟收入。<sup>298</sup>江志如也的確為不能實踐母職而猶豫，但她最終突破了這個性別框架，除了經濟考量、個人能力之外，更值得注意的是她當時所處的環境無法束縛她。

在家庭經濟的困境中，丈夫非但不是她的障礙，還扮演推手的角色，這份工作就是透過丈夫的外省人網絡而來；而家庭外，她所居的老潭門社區能發揮的監督力量有限。江志如在老潭門學會客語，建立了在地的社會網絡，老潭門社會接納了她，也提供她生存適應的資源，但老潭門社會的網絡並不能真正地束縛她，因為她是外來移民，她與當地社會系統的關係可深可淺。她或許會遭遇到當地輿論的一些壓力，但這股壓力絕不若施加在本地女性身上那樣強大，因為本地女性屬於老潭門宗族的一員，血緣與地緣重疊的團體力量是可畏的。同樣地，散居的江志如也沒有集居外省女性所受到的束縛，集居的外省人之間雖然沒有血緣的連帶，但是居於國家機器管束的封閉眷村裡，被規範為「沒

<sup>297</sup> 莊英章在竹北與六家所做的量化研究指出，婦女在家庭中屬於從屬地位，多數婦女以照顧家庭為優先而不工作，犧牲自我抱負，此外部分婦女在婚後辭去工作，而在家從事家庭手工的副業。見莊英章，《家族與婚姻》（台北：中研院民族所，1994），頁 189-205。

<sup>298</sup> 郭苑平，《眷村台灣媽媽的自我與認同研究》（新竹：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頁 81。

有祕密的社群」。<sup>299</sup>眷戶彼此監控的網絡壓力對生活其中的人而言非常巨大，言行皆須符合期待，否則遭到群起排擠，就只能黯然搬走。<sup>300</sup>也就是說，做為一個移民，江志如脫離原社會系統的緊密監控，在新居地的社會雖然已有相當的社會網絡，但這個網絡並沒有足夠的控制力量，所以她能夠比較輕易地掙脫束縛，去實踐她工作的意願。

從大陸移民到台灣來的江志如，人生的菁華時間都在老潭門渡過，老潭門提供她許多資源，讓她至今仍然感懷，但是牽引她來的戲院卻是她不想多談的部分。在江志如眼中，戲院是丈夫的決定；戲院生存的保障來自與軍方簽訂的一紙合約，戲院為軍人而存在，為男性提供休閒服務。然而，戲院倚賴的軍方說變就變，合約形同廢紙，戲院倒閉是遲早的事；丈夫把她帶來老潭門，也說走就走，留下她獨自面對年幼的孩子和艱困的生活。戲院因為男性的需要而生，也因為男性（此二處的男性，指江志如的丈夫和軍人）的不可靠而亡，這一切都沒有她置喙的餘地，她只能承受殘局。或許對江志如來說，戲院結束，意味著男性時代的結束，同時，也是女性時代的開始。

### 第三節 重構女性個人生命的意義

江志如的生活重心從家庭移轉到工作上，她得到實踐自我主體性的時間與空間。在女工宿舍的工作場域，面對女性社群，江志如同時具有工作位階與年齡的高度，亦師亦母的工作策略，使她在工作中經驗到自我主體性的力量，而且，有償工作帶來了經濟能力，工作性質也使她的人際關係擴展得又快又廣又深，織結出一個比鄰里更大的社群網絡。換言之，穩定的社會網絡和獨立的經濟能力是江志如主體性日益壯大的關鍵。

在台元工作的有償報酬超越丈夫的經濟資源，於是，她與丈夫在家庭的角色互置了，丈夫辭去工作回家養雞，家庭分工變成「女主外，男主內」。江志如因為一方面取

<sup>299</sup> 郭苑平，《眷村台灣媽媽的自我與認同研究》（新竹：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頁 24-26。

<sup>300</sup> 郭苑平，《眷村台灣媽媽的自我與認同研究》（新竹：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頁 65-68。



得家庭經濟支柱的地位，另一方面是社會網絡擴展得更大也更深，她同時擁有經濟和生活資源，使她在夫妻間的權力關係中獲得明顯的提升，但並不表示她的權力凌駕丈夫。江志如勇於在家庭裡表達她的意見，甚至與丈夫衝突，但是她又把她賺來的錢交給丈夫「管」，理由是信任丈夫理財的能力比自己強，這看來是矛盾的，因為她「對丈夫失去了信心」，到丈夫過世前都不曾真正原諒和信任他。其實，江志如把家庭經濟的主導權保留給丈夫的潛在原因，是維持丈夫的自尊。大於家庭結構的社會文化結構還沒有顯著的改變，女性仍「主動」臣服於父權文化的規範，在家庭裡維持丈夫的尊嚴，讓丈夫仍能掌有相當的決策權，有意識或無意識地維持夫妻間的權力平衡。<sup>301</sup>

江志如表面上放棄家庭經濟的主導權，退到丈夫身後，其實她對自己的財產有絕對的支配權：

我那時候在台元，我先生常怪我愛買衣服，可是我是個主管啊，不能沒有幾件像樣的衣服穿。還有我工廠裡那麼多女工，……訂婚啊結婚啊，不能不有所表示嘛……還有如果有生病住院的……我就捐一盒麥片……所以我的開銷很大，他就罵我亂花錢，罵得很兇……。<sup>302</sup>

即使丈夫有意見，江志如對於她賺來的錢很有定見，也有實際支配的行動力。解嚴以後，江志如如同許多外省人，與在大陸的原生家庭取得聯繫，已經退休的她一年轉匯二次美金給娘家手足，丈夫罵她「一天到晚只想著娘家」，她不但大方承認，也繼續對原生家庭提供金錢支援。所以，江志如的錢由丈夫「管」，看起來是被迫的，她仍居於從屬地位，事實不然。當家庭經濟有剩餘可以進行投資時，丈夫能「管」的錢，其實是她有目的支配的一部分。也就是說，江志如的丈夫像是一個投資理財的顧問或經理人，被有主體性和能動性的江志如所吸納和利用。江志如在家庭經濟的實質地位不但比先前提高許多，甚至比丈夫還來得高，可以說是一家之主。當然這樣的權力變化不是平順的，而是一連串交換、協商、衝突和轉變的過程。<sup>303</sup>

<sup>301</sup> 吳孟潔，《漂洋過海的生活：台商女性配偶的遷移與轉變》（新竹：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頁12。

<sup>302</sup> 引自江志如的訪談稿，2007.10.21。

<sup>303</sup> 吳孟潔，《漂洋過海的生活：台商女性配偶的遷移與轉變》（新竹：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頁11。



江志如曾經對丈夫徹底失望，也對投資抱持不信任的態度，但是她的主體性和能動性讓她改被動為主動，主動吸納對她有利的資源，從丈夫那兒學習打會的方法，在工廠女工宿舍裡打會。集資得來的大筆資金，她交給丈夫去買戲院的地、買黃金保值、買台北的房子。最後，江志如的能動性讓他們成功跟上台灣經濟起飛的腳步，靠著房地產的投資致富，徹底脫離貧窮，奠定晚年生活的經濟資本，以及傳承給下一代的家產，完成第一代移民的責任。

我們看到在大社會不斷變化，壓迫家庭經濟的時候，江志如憑藉著個人的教育資產，以及她創造出來的生活資源，進而取得經濟資源，解決家庭困境，同時提升自己在社會階層的向上流動，也充分提升她在婚姻間的權力地位，並維持了下一代對她的敬意與認同。江志如在家庭裡的權力抬升，是她面對外環境變動所做出的選擇與行動，而且必須超越性別框架才能取得，但她認為次女和么女的升學表現不如兄姐，是她沒有提供倆姐妹良好的環境讀書所致，也就是虧守母職。所以，江志如只是某種程度解構了傳統的女性角色，母職仍是她個人生命意義的重要選項。

父權社會裡的女性被限定在從屬的地位，被要求「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女性在父權體制下也「主動」接受宰制自己的社會禮教（其實此一主動仍是文化社會性的宰制），內化成理所當然的價值觀與行動規準，這些性別的框架逐漸被江志如解構。江志如到台元工作以後，主體性與能動性益發高張，她的主體性不只是突破母職的束縛，也體現在對金錢的支配上。在家庭裡，她不再是「噤聲的女性」，只要與丈夫意見不同，她必定據理力爭，這是她以前不敢做的事。而且，從原生家庭到自己的家庭，江志如有很長一段時間是替代傳統男性的角色，成為家庭經濟的支柱，這些經驗衝擊她對傳統文化中女性角色的認知，並重構個人生命意義的正當性，母職不再是唯一的內涵和終點。換言之，對於在某些層面仍「主動」遵守傳統女性角色的江志如來說，她所解構並重構的女性生命意義，是從母職出發，而終於自我實現。

已高齡八十二歲的江志如與同年代大多數的女性相比，她的生命意義超越對丈夫和子女成就的依附，透過工作和經濟獨立來成就她的移民家庭和她身為女性的尊嚴。

## 小結

江志如特殊的生命經驗讓她有機會掙脫侷限女性的傳統社會規範，解構文化所建構的性別差異，而重構個人的意義，但是，她並非沒有任何準備而魯莽衝撞。她先是擁有教育資產，在移居地，又積極學習在地語言，建立在地社會網絡，逐步取得工作機會，進而經濟獨立。所以，女性若要擁有主體性和能動性，得依靠兩大支柱：一是社會網絡的支持，二是經濟獨立；江志如皆具備，所以，在父權社會中，她得以突破性別的位階，不再「噤聲」。

關於江志如生命故事的分析，我們一共用了三章的篇幅來討論，分別是第三章的外省人遷移適應的層面、第四章承載江志如的老潭門社會的視角，以及第五章江志如本身的主體性。下一章，我們將進入結論，並說明本研究的意義，以及限制與展望。

## 第六章 結論

把外省人視為一個族群具有「回向建構」(retrospectively constructed)之嫌，而且也總是陷入本省或台灣的二元對立之上。<sup>304</sup>因此，本研究試圖回到戰後移民遷移與適應的生命經驗，是避開預設的本質化的可能途徑。本研究從關懷外省人的異質性入手，因此在研究對象的選取上，刻意篩選出並不典型的外省人，也就是不住在眷村的外省人，而且是向來被「噤聲」的外省女性。本研究仍立基於外省人研究的脈絡中，但重點轉移至移民適應的研究面向，討論集居與散居在適應典型上的差異，也因而透顯外省人並不具有外省族群的意識與認同；在進一步探究散居的移民個體的認同傾向時，發現在個體與地方社會的互動關係上，個體本身具有主體性與能動性，社會與文化也有其彈性與包容力，能吸納異質的元素，在互動過程中促成社區的變遷，移民個體產生在地的認同；至於研究對象的性別在此的確顯出差異，女性移民個體在台灣既成的社會與文化脈絡中仍受到侷限，但移民淺根與游移的特性正是突破結構限制的利基點，江志如因此透過行動實踐而定義自己，也反映女性角色在時代變遷中的改變。

本研究的意義在於以移民、地方性及女性等三重視野，檢視一個客家村落的外省移民家庭故事。本文據此而提出「散居外省人」這一概念，作為爾後討論外省族群的理論基礎。然而本研究的限制也來自提出「散居外省人」概念時所陷入的二元對立，本文並不認為外省人的內涵可以如此被簡化成兩類，未來的研究理應用更多的個案，探討箇中內涵。其次，本文關於潭門的地方性知識還不夠充分，但也自信已發展出相關研究的可能性。最後，外省女性具有移民與女性的雙重位置，其生命史甚有保存與研究的價值，是後續研究者可以努力的方向。

---

<sup>304</sup> 趙彥寧，〈戴著草帽到處旅行：試論中國流亡、女性主體、與記憶間的建構關係〉，收入趙彥寧主編，《戴著草帽到處旅行》（台北：巨流，2001），頁 203-245。

## 第一節 本研究的意義

### 一、一個新的嘗試

本研究的文本依據是深度訪談而來的生命史，為尊重生命不可分割或化約的特性，所以第二章「一個外省女性在客家村」並不侷限於江志如定居在潭門的時期，而力圖呈現完整的生命脈絡，以確保分析與理解皆能立基在江志如本身的脈絡之上。筆者也嘗試仿效《金翅》的敘事性筆法，期望故事的本身就能蘊涵某種程度的歷史、社會與文化等層面的展演，並留給讀者參與分析的權力。在故事之後，展開三章的分析，分別從外省人、社區，與女性行動者本身，三個層次來討論。這三個層次看似各自獨立，其實是沿著移民這條軸線而發展：外省人入台，在台灣社會結構中的初始位置就是移民，移民因移民網絡差異，入台後有集居與散居的分別，集居是一般典型的眷村，而江志如是散居的一種典型，她能積極開創移民適應關鍵所需的資源，從而傾向在地認同；散居的移民從落戶開始，必然會與社區發生最直接的碰撞與變化；本研究的女性行動者同時具有女性與移民的雙重不利因素，但我們從她在公私領域的行動實踐更能窺見多重意義。

雖然，本研究僅視江志如為散居外省人的一種典型，而無意聲稱其代表性，不過，我們相信就移民自然情境的適應而言，本個案的生命經驗與其他散居的外省人應有相當的共通性。

### 二、重回歷史的脈絡：外省人是戰後移民

把本研究的個案放在外省人研究上來看，江志如開啓我們看待外省人的新視野，眷村或國家認同在這裡都消失不見，她展演的是一個女性移民及其家庭為求生存的行動實踐以及土著化的過程，而接納他們的地方社會也同時產生質變。換言之，對移民而言，在自然的生活情境下，因為承受少數融入多數的壓力，而積極學習在地語言和建立在地社會網絡，此二者是適應成功的關鍵資源，而遷移是為追求更好的生活，所以如果能同時把握住教育的機會，處於弱勢的移民就能在社會結構的上層卡位，而達到遷移行動的



成功。但以接納移民的社會的立場來看，如果不能排拒外來者，同化他們是遷入地社會最安全的選擇，散居的外省人土著化較深，但佔多數的集居外省人的土著化則相對較為淺薄，這構成了台灣社會內在的焦慮。

移民網絡是外省人土著化差異性的源頭，而來台後的集居與散居本是移民為確保適應成功的兩種極端典型，其適應對策與同化進程自然是不同的。在國家的變局下，某些人利用相同的移民網絡——即加入軍隊，以達到離開戰亂、赤化的大陸的目的。由於移民網絡也是在新居地所能依賴的最初資源，所以依附政治網絡來台者並沒有除了國家以外的資源，為了生存，他們同意、甚至感激在國家的主導下形成集居，然而，他們被異化卻不自知。集居的封閉性和同質性標識了他們，國家正式的組織性控制了他們的生活，使他們欠缺學習在地語言和建立在地的、異質性的社會網絡資源的動力，他們在無法充分掌握移民適應所需的關鍵資源下，也逐漸喪失面對變局的能力，造成日後深層的心理危機。而未依靠政治網絡者，其適應歷程較趨近自然的移民情境。以江志如的移民家庭來說，其移民網絡是結合生意網絡及親人網絡，此一非正式的網絡資源先他們入台前即已存在，所以，他們入台後的生活、工作等皆能繼續利用此資源，但非正式的網絡組織是鬆散的，無法提供穩定生活的保證，而讓使用者必須處在戒備的狀態下，從而保持應變與開創的動力與能力。江志如及其家庭至老潭門開戲院並安居落戶，在自然的移民情境的脈絡下，積極學習在地的客語，同時也隨入學的孩子學習國語，雙語的能力成為未來人際往來與工作的利器。在建立社會網絡方面，江志如主要掌握本地社會網絡和小範圍的外省人網絡，而她的丈夫則維持過去的外省人網絡，夫妻所共有的社會網絡充滿異質性，且能兼顧特殊時空下的兩股社會資源而從中獲取所需，對其異地適應提供極大的助力。移民如果擁有在地語言與社會網絡，其與在地社會的互動關係就深刻得多，這也就是江志如傾向在地認同的主因。而教育之於外省人的重要性，在本研究中也得到證實，不過，教育的意義並非如過去研究所顯示的單純，從江志如的生命脈絡去理解時，教育不但是工具性的，也是情感的依託，以及實踐個人生命的價值與意義。

落戶台灣的戰後移民，至今才繁衍至第三或第四代，移民的研究顯示遷移行動真正的完成至少需要好幾代的時間，甚至更久，但是這批戰後移民在完成土著化之前，已提

早遭遇台灣社會對他們的本土化要求，而產生較先前更嚴苛的適應危機。在 1990 年代台灣本土化的論述下，戰後移民皆被劃歸為「外省人」族群，與閩南、客家、原住民三大族群並列，並被視為本土化的假想敵，於是外省人遷移適應的歷程被結構性的遺忘，直接跳接到現存結果來論斷，而外省人因應外在危機而回向建構原不存在的族群和認同，但欠缺血緣、地緣、甚至是文化親親性的百萬戰後移民，其內部的差異與分歧並不因為被視為同一族群而消失，反而因為族群邊界的不合法性而脆弱不堪。然而邊界愈鬆動，社群愈企圖鞏固其邊界，張顯邊界的存在，其結果是移民與社會雙輸。

所以，本研究企圖以散居的江志如來凸顯集居外省人不夠本土化而與之切割嗎？答案是否定的，本研究的意義在於以移民適應的角度看待特殊時空下的外省人，我們才能理解並幫助外省人繼續土著化，給予他們土著化所需的時間與空間，才是消解台灣社會內在焦慮的辦法。愈來愈多的學者反對將外省人視為同質性或是一個族群，因為，如果粗糙地本質化外省人，本質化台灣，戰後移民的問題是無法解決的。

### 三、提出「散居外省人」的概念

在外省人的研究中，劉益誠的研究已出現「散戶」一詞，指稱相對於眷村的、自發性集居的榮民，但我以為此一類型仍維持了集居的特性，而且他們與國家的關係仍保持某種程度的密切，並不能充分呈現外省人的差異性。<sup>305</sup>所以，本文更進一步提出相對於制度性與自發性集居外省人的「散居外省人」，回歸當年的時空脈絡下，此一概念指涉的對象是非依附政治性移民網絡來台且未受政治力介入而影響適應行動的外省人，也就是能在自然情境下進行適應歷程的戰後移民；來台不久即提早退役且未自發性集居，而與本地民眾混居的外省人也包括在內。

關於來台不久即提早退役且未自發性集居的外省人，其移民網絡雖然是依附國家機器，並在軍中接受國家的教化，的確已受政治力的干擾，但我們推測早年的軍職經驗是其土著化過程中的重要變項，但不是絕對變項，族群通婚是解套的關鍵。因為通婚能帶

---

<sup>305</sup> 「散戶」一詞見於劉益誠，《竹籬笆內外的老鄉們－外省人的兩個社區比較》（新竹：清華大學社會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

來在地語言的持有、社會網絡的建立，以及血緣的連帶，甚至是對土地的依賴，都是積極土著化的途徑，第四章提及的賈穎華即是一例。

要言之，本概念的重點在於「散居」。因為散居而欠缺操演原鄉認同的場域，也排除國家政治力的干擾，提供自然的移民情境，增加與在地社會互動的機會，所以散居的外省人通常有較佳的適應結果。自台灣經濟起飛以後，有不少眷戶主動搬離眷村，尋求更佳的生活環境，而成為散居外省人；同時，也有少數本地族群搬入眷村，眷村不再是純粹的外省人社區，集居的外省人已某種程度被迫成為散居外省人，雖然程度尚淺。而近年來，老舊眷村拆除或改建成國宅，更是結構性地驅使集居的外省人走向散居的情境。所以，如果以現在的社會情況來說，散居外省人可涵括的範圍已愈來愈大，戰後移民土著化的腳步只會愈來愈快。

「散居外省人」仍屬一個集合的概念，江志如僅是其中的一種典型，期盼未來能有更多相關的研究填充此一概念與範疇，以徹底解構對外省人的政治建構，並細緻外省人的內涵。

#### 四、開啓外省人研究的地方性視野

本文的另一重意義是開啓地方性的視野，外省人研究如果繼續以外省人為研究本位，我們將會自囚於想像之中，而錯失理解地方社會如何接納外來者而重構自我的過程，以及基層社會的地方性知識有別於菁英階層而產生活化的力量。本研究從行動者的面向切入，探究接納移民的潭門社區在二十世紀的動態變遷的過程，並從二十一世紀潭門在社區營造的成果回應變遷的事實。老潭門經過十八、十九世紀的墾殖與發展，呈現羅鵬華所研究的，是由客家、宗族、廟會所建構出來的傳統社區，長期處於穩定而似靜止的狀態。<sup>306</sup>而戰後移民的遷入，正好呼應了二十世紀的潭門所面臨內外環境的巨大變遷。台灣改治、工業化、全球化，一波波的漫進潭門社區，商業、外省人、西方的天主堂，這些外來者都得透過租地蓋屋的正當性進入老潭門，老潭門社區即以其自有的邏輯接納外來元素，遷入的多重行動者與社區不斷互動，外環境也從中拉扯，共構出老潭門

<sup>306</sup> 羅鵬華，《大潭門的歷史人類學探討》（2001）。



的新面貌。二十一世紀老潭門的社區營造即證明這個事實。外省人曾經經營的戲院外觀仍在，斑駁的售票口、電影放映口的輪廓也清楚地展示著，但戲院改成的餐廳裡不停地上著熱騰騰的客家菜，喝著客家老茶的客人同時享受著外來與在地元素碰撞出的幽情。外來元素驅趕了本土主流文化嗎？沒有，本土文化仍是主流，但納入外來元素的主流文化多了一種魅人的風情。我們以此理解了傳統社區新生的方式，是回溯自己的歷史與文化，將外來元素內化，重構更豐富的主流文化的內涵。二十世紀以後的潭門已不是單純的客家村落，如果忽略潭門內部的異質性，或是欠缺全球性的觀點，都不可能窺知真實的潭門。

地方社會確有其包容性，但移民個體仍必須透過學習客語、建立本地社會網絡、參與傳統廟會，或族群通婚等積極的方式，才能深化與社區的關係，與社區產生情感的連帶而成為共同體。對照外省軍人賈穎華，定居三十年的江志如及其家庭最終因為個人的生命脈絡，無法在老潭門生根，或許顯示出在漢人社會文化中，地緣連帶的強度是不如族群通婚所帶來的血緣連帶。

## 五、讓外省女性發聲

在漢人父權文化的宰制下，居於從屬地位的女性往往是「噤聲」的，所以，政治鬆綁之後的外省人研究，清一色以男性為研究對象，集中在國族認同之上，而後起的外省人研究，外省女性仍被排擠出對女性的關懷之列，所以，本研究試圖還給外省女性一個空間，讓外省女性自己發聲。

一般女性在言說時多將自己隱藏在丈夫和子女的後面，但是江志如於其再現的記憶中，她就是主角，丈夫的身影反倒是模糊的，這或許是女性特殊言說展演中的默言（reticence），即使丈夫早已過世，但是沉默的父權結構仍然發揮某種程度的箝制作用，讓她產生自我審查（self-censorship）性的「失聲」型言說行動。<sup>307</sup>

不過，江志如之於同時代的女性，無論是外省或是客家，她所擁有的自主性仍是我

<sup>307</sup> 趙彥寧，〈戴著草帽到處旅行：試論中國流亡、女性主體、與記憶間的建構關係〉，收入趙彥寧主編，《戴著草帽到處旅行》（台北：巨流，2001），頁 206-210。



們無法忽視的面向。誠如吳孟潔以爲的，女性移民在遷移適應的歷程中，若能利用自身本有的資源（如教育程度），再開創新資源（如建立社群網絡等生活資源），就能衝破社會文化與移民困境對女性的侷限，因而平衡夫妻間的權力關係，江志如的生命脈絡亦是如此。<sup>308</sup>

在性別文化的制約下，女性主體意識的萌生或覺醒是來自外在環境的刺激，並且經驗壓抑、觸發、反思、實踐、強化、累積的複雜歷程。江志如主體意識的萌生即來自婚後生命斷層的調適衝突，遷移適應陷入困境則是覺醒的契機，有了主體性的江志如才能解構傳統性別的框架，也重構個人生命的意義。女性取得主體性的過程，也意味著夫妻間權力的變化。娘家是江志如主體意識萌生的源頭，那時她仍馴順於父權規範，能動性也受原社會網絡的箝制。遷移的行動斷絕了江志如原有的社會網絡，又受限於封閉的私領域和母職，遷台初期的江志如更依賴丈夫，夫妻的權力關係更加不對等。戲院經營的困境讓江志如的主體意識覺醒，她有意識地進行生活資源的累積，並投注子女的教育，以與丈夫的經濟資源抗衡。當她本身的資源足夠支持她跨出家戶，投身職業女性，取得經濟獨立時，夫妻間的角色互置，江志如與丈夫的權力關係立時達到平衡，甚至更高，但是，父權文化結構仍驅使江志如「主動」在家庭裡維持丈夫的尊嚴，讓丈夫掌有家庭經濟的決策權，維持夫妻間的權力平衡。橫跨農業社會與工業社會的女性，在社會變遷中得以跨出家戶，但取得主體性，勢必得破壞原有的性別結構，因此交換、協商、衝突和轉變的過程是無可避免的，女性也同時在社會與文化結構的困境中試圖重新定位自己。

回到女性移民的脈絡上，江志如無疑是幸運而成功的。她的主體性與能動性來自於個人資源的茁壯，移居地社會系統束縛的乏力也是關鍵。教育程度、語言能力和社會網絡是江志如最重要的個人資源，才能取得工作自信和經濟獨立，達成主體性。然而，光有個人資產是不夠的，環境的配合十分重要。由於散居移民在系統中的位置是游移的，所以江志如沒有集居外省女性所承受的社群壓力，也缺乏在地客家女性被宗族力量的制

---

<sup>308</sup> 吳孟潔，《漂洋過海的生活：台商女性配偶的遷移與轉變》（新竹：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

約，而家戶內，丈夫是她去台元工作的推手，所以，江志如能突破父權文化下的性別框架，跨出私領域，投入工作。不過當時社會文化對女性的期待仍是家庭優先，母職實踐確實是牽絆她的重要力量，當現實生活無可承受的困境轉念成「為母則強」的期許時，江志如的主體性才真正覺醒。所以，具有主體性的江志如所解構並重構的女性角色，是從母職出發，而終於自我實現，個人的生命意義不只是依附丈夫子女的成就，更有自己的命題。

外省女性發聲，讓我們看到貼近真實生活的面向，也更能理解外省人不是國家支配的工具，而是生活在你我周遭的一般人。所以，本研究藉由一個外省女性的個人記憶，期望喚起社會集體的記憶，讓外省人卸除政治性的負累，回歸移民的本色，也透過移民的適應行動來理解台灣社會在戰後的急速變遷。

## 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展望

本研究在外省人研究的基礎上，透過個別女性行動者細緻的生命脈絡，企圖回歸原初的移民層面，來省視外省人與台灣社會的關係，以及未來的可能發展。本文也試圖延展女性移民在社會文化與移民困境的侷限下，仍有相似的能動性。然而受限於研究取材與研究旨趣，以及研究者的能力，本文尚有許多未臻美善之處，期望未來有興趣者能進一步發展。

我從移民適應的觀點來理解遷移者與遷入地社會互動的關係時，為了提出「散居外省人」的概念，而使用了「集居」與「散居」的極端典型做為對照，此舉或許陷入了二元對立，但這樣的簡化是為了學術研究分析的需要，並不表示研究者以為外省人的內涵可以如此被簡化成兩類，實際上外省人是如同光譜般有各種可能性。畢竟當年百萬的戰後移民入台，其原初的社會位置（包括性別、階級等）、生命經驗，以及個人所擁有的資源，甚至是個體本身的主體性和能動性，都是影響適應的個人因素。例如台元紡織的

董事長吳舜文及其家庭，亦是純粹的外省人家庭，他們散居在民間，但是大資本家的階級、資源與生命經驗，其遷移適應的情況與江志如相同嗎？我不敢斷言。再比如，彭芊琪研究落戶於苗栗的廣東陸豐莊氏宗親會，與國家機器並無關係，也非集體依附政治的移民網絡來台（除了少數幾位是軍人），是戰後移民潮中少見的同鄉聚居的形式。他們雖然是集居，但因為同時具有外省人與客家人的身份，並透過同鄉的移民網絡的協助，因此在生活和工作上都未呈現封閉的狀態，較其他外省人易於土著化。<sup>309</sup>這種同鄉聚居的集居形態，成員所掌握移民適應的關鍵資源比江志如更有優勢，所以，在移民適應的研究上，還需要透過更多有關外省人遷移適應的質性研究，才有可能更細緻地比較與研究。

另外，本文開啓了外省人研究的地方性視野，雖然有關於潭門的地方性知識，本文所獲致的成果還不夠豐沛，但已發展出潭門地方知識研究的可能性。比如我在潭門田野調查的過程中，發現潭門的外省人多得超乎我的想像，與指導教授討論此一現象時，我們才回過頭來發現：老師的同學、朋友，我的表哥，他們的父親都是外省人，他們就是所謂的外省第二代，但是他們也根本就是潭門的客家人，純正的海陸客家話、道地的客家飲食習慣、依循潭門客家所有的風俗。他們不提，我們完全不會記得他們是外省人。他們還算是外省人嗎？他們為何會如此客家？是因為長期居住於客家村？或是與家戶內的夫妻權力結構有關？他們如何看待自己、外省父親與客家母親？而潭門人又如何看待他們與他們的外省父親？上述問題，我們認為無論對外省人或本省人來說，都深具意義，而且這些地方性的知識必須奠基於紮實的田野研究工作，確切掌握在地人對外省人遷入的看法，以及定居潭門的外省人如何看待潭門與自己，也就是讓潭門社區充分發聲，才能建構出屬於潭門的地方性知識，我們對潭門的理解也才能更細膩，我期望能有更進一步的研究來延續此項議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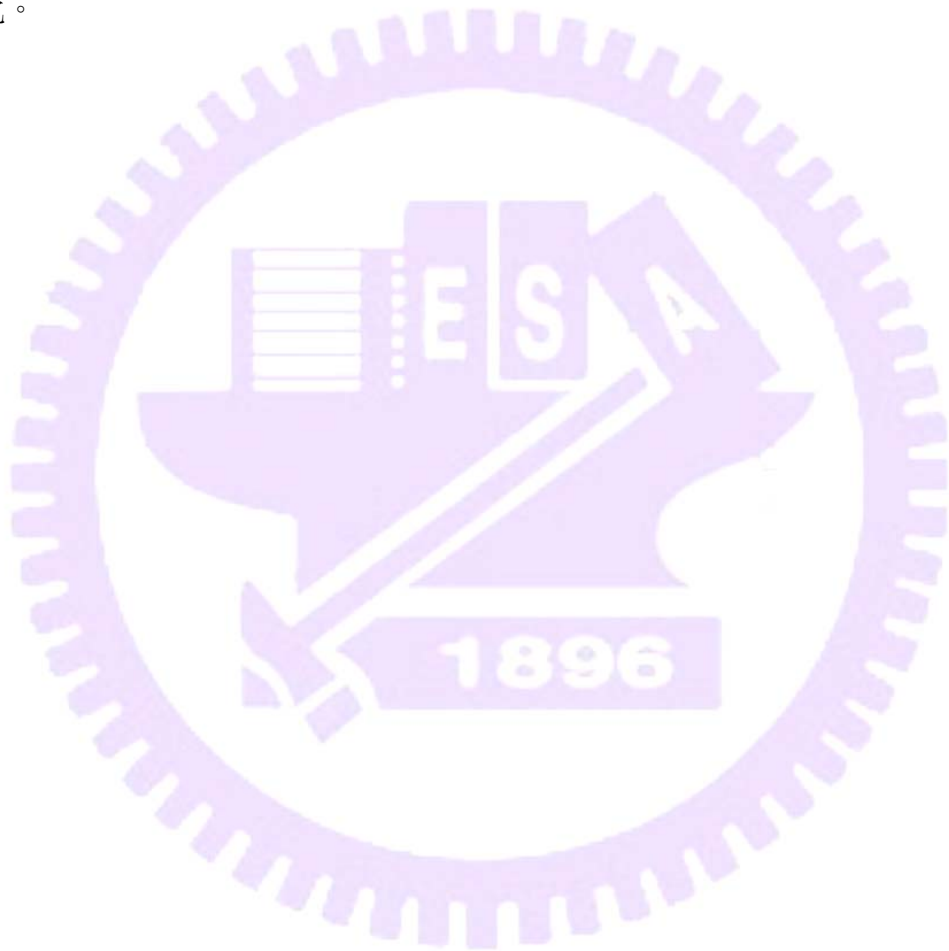
本研究到此告一個段落，雖然有遺憾之處，但我仍充滿研究者的喜悅。在外省人研究的領域上，本文確實走出一條「外省人、非軍方背景（非眷村）、女性」的研究取徑，

---

<sup>309</sup> 彭芊琪，《外省客家人的本土化：以廣東陸豐莊氏宗親會為例》（桃園：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

並在外省女性生命史的蒐集上做出棉薄的貢獻。我認為外省女性兼具女性與移民的雙重角色，而且她們處在快速變遷的時代，是新舊社會交接的見證者，也是公私領域互動的參與者，她們的生命史非常具有保存與研究的價值。不過，第一代外省女性已逐漸凋殘，未來研究者得要加快腳步才行。

本章已結論出本研究主要架構下的議題，但生命史的研究，研究者很難不在其中發生影響與自我改變，所以，下一章我將拉回到研究者本身，探索自己在研究過程中的位置與變化。





## 第七章 餘論

上一章「結論」已完成本研究主架構下的外省人土著化議題，但在研究的進行中還有兩個部分一直迴繞在我腦海裡，無法於正文中探究：一是江志如為何這麼說，也就是對她言說的內容，以後設的立場來觀察；另一部分則是外省人在本土化論述下的內在心理焦慮，它其實是隱藏在本文中一個顯著面向。因此，本章將對此做一些省思。

江志如所口述的生命經驗，是同時結合記憶與言說的產物——記憶以合理化過去的形式出現，言說則隱含受訪者的社會關係與權力關係。對一個陌生人談個人生命，江志如與我花了一些時間才進入互信的階段。我原本以為她既然願意坦承隱諱的過去，那肯定能暢所欲言，但事實不然。江志如對於潭門生活和丈夫總是輕描淡寫，並主動把話題轉到她在台元的工作以及子孫的成就，她也會強調客家人相較於外省人是多麼可親，還有她不後悔曾經做過的每個選擇，因為命都是注定好的。研究進行中，這幾個面向不斷跳出來在我面前舞動，干擾我對她做全面的理解。顯然，江志如是有意識地選擇她所產出的材料。

那麼，是什麼影響她選擇？

就江志如個人的生命脈絡而言，我相信丈夫過世與宗教信仰是關鍵原因。早年生命經驗中的苦或恨，在丈夫過世以後，江志如失去了怨或恨的對象，而宗教信仰的慰藉和導引，使她重整過去的記憶。丈夫和潭門的苦難歲月既是不堪回首，是欲忘懷的一段記憶，丈夫過世以後，她更可以利用結構性健忘來遺忘或扭曲過去的事實，也可以以現在晚年得意的生活來合理化過去。就言說的脈絡而言，江志如對我這樣一個後生晚輩談自己的生命，她過去的苦難與現在的得意，變成一種可以訴說的勵志教材，就像她退休以後的投稿文章充滿了教化意味。所以，江志如再現的記憶的確比事實多了補充說明或推論，是在特定時空下選擇性地重建或重組過去，而她的個人記憶也在這過程中修正或更新，認同也隨之變遷。

但是，在此研究過程中，變遷的不只是江志如，還有研究者本身。

從進入客家研究所開始，到論文的完成，我不斷經驗著內在的衝突和焦慮（請見圖 8），而這正是當前本土化要求下的外省人處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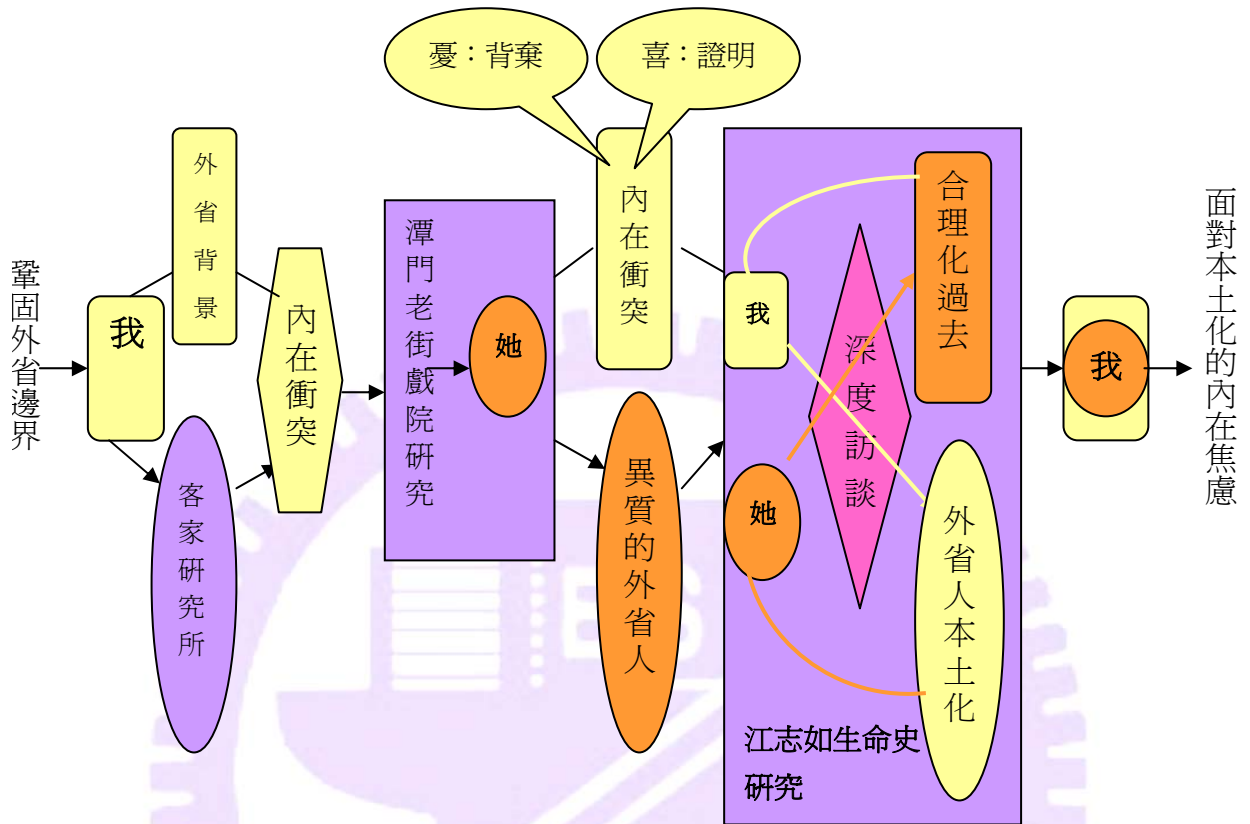


圖 8 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的自我探索圖

具有外省背景的我進入客家研究所，期望藉此彌補對家母族群文化的無知。在研究所學習的過程中，開始研讀我不曾接觸過的本土論述，強烈的本土論述時常以挑戰、批判外省人、國民政府、國民黨政權的姿態出現，對我而言，有震撼、也有被排拒的感受，內在衝突不斷上升，我的外省邊界也時而更堅實，時而鬆解，不停地在研究過程中游移。

碩一下學期，選擇田野研究法的期末報告主題，由於是客家研究所，主題必須與客家相關，但研究是從個人出發的，我刻意選擇同時結合客家與外省人的主題，也就是外省人曾經在客家村經營的戲院。我以為這是一個「安全」的題目，可以暫時卸下本土論述加諸在我身上的沉重壓力，躲進外省老奶奶的懷抱裡。但是，我的算盤打錯了。

在潭門老街的戲院研究中，我認識了外省老奶奶江志如，但是她不像我過去所接觸過的外省人，眷村、軍人等外省人慣見的背景都無法拉近我們的距離，她對於外省人的

疏離，讓我企圖放鬆的心防再度緊繃。而且，我竟然產生被外省人背棄的微怒感，並不斷嘗試證明她是爲了迎合我的研究旨趣而刻意表現親客家而遠外省。當證明失敗時，我確定江志如是一個「不一樣」的外省人，我既震驚又疑惑，懷疑她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卻也暗暗滋生無名的喜悅，因爲在本土化喊得震天價響之際，江志如正可以堵住那些總是將外省人視爲「外」省人的人的嘴巴，誰說外省人就一定是「外」省人？然而，江志如的本土化是她自己的事，與我何干？對我有什麼意義？複雜的感覺攪和在心頭，理不清。做爲期末報告的戲院研究雖然結束了，但爲了論文研究，也爲了我想釐清江志如不像我所認識的外省人是怎麼回事，我又一頭栽進江志如的生命史，透過多次的深度訪談，與她發生更深刻的交會。

進行生命史的深度訪談，不只是單純取得分析所需文本的途徑，同時也是研究者與受訪者互動下的結果，亦即我必須某種程度地涉入江志如的生命。那我在哪裡呢？由於記憶的再現與事實有相當的差距，此一差距正反映出江志如從「現在」觀照「過去」，而我也在研究進程中來回觀照江志如的「現在」與「過去」，以分析出可能的差距。所以，在本研究中，我很清楚研究的明線是江志如是外省人本土化的例證，她透過訪談口述自己的生命經驗，企圖爲她自己合理化過去；而我則是企圖藉訪談證明外省人本土化的經驗。但有一條暗線在研究進程中不斷出來干擾，我是覺而未明。

我在企圖證明江志如本土化的過程中（甚至可以說從進入客家研究所開始），也嘗試朝本土化靠近，也就是嘗試修正我的外省邊界和認同，但我更試圖合理化我自己、或是外省人本土化不深的過去。這條暗線不斷拉扯、操縱著我研究的走向，我自己並未警覺，直到指導教授給我一記當頭棒喝，這條暗線才曝了光，研究方向也在這過程中不斷修正回應走的路徑上。研究愈接近尾聲，這條暗線的力道愈大，我心裡的掙扎也更受壓制，因爲研究結論似乎給了外省人一條「生路」，這條生路卻是我過去不曾關注的路線。但我必須承認，研究的結果是我與江志如，外省人與本土化，有真正的交集，不能逃避的交集，而這個交集的動力，不是冠冕堂皇的理由，而是當前外省人面對本土化的內在焦慮。

回想研究開始之前的我，在求學過程中，從來沒有意識到本省、外省的差別，若說

有，也僅止於聽不懂同學講的閩南語，並不影響同學間的情誼。直到大學時期，民進黨時常在總統府所在的博愛特區示威遊行，而那是我上下學的必經之地，才開始深刻感受到社會氛圍對外省人的不友善；其後，每當南下旅遊，因為不能以閩南語與當地人溝通而被羞辱的情況也愈來愈頻繁。我終於清楚地意識到族群的邊界，也開始鞏固自己的外省邊界，因為我不能理解外省人何以被排斥，也不能理解我為何一定要會說閩南語，更不能理解我錯在哪裡。

研究江志如的生命史，讓我有機會理解我的記憶是構築在過去樣板教育的社會記憶之上，而不同族群有不同的集體記憶，所以我與本省人的記憶是有落差的，我開始能理解外省人與本省人不同的處境與眼下的發展。我也終於能理解我與江志如是不同典型的外省人，因為我的父祖輩與江志如有不同的生命處境與脈絡。於是在研究過程中，我同時扮演了觸發江志如與自己的角色，我的記憶與族群邊界得到某種程度的修正。我想，我在本文中所參與的角色與位置，具體而微地反映出外省人在本土化論述下的心理危機與變遷。

在論文研究的過程中，我曾想過如果當初家母把她的族群文化傳承給她的子女，面對現在的本土化，我可能就不會有那麼大的壓力，這不是怨懟，而是感嘆。但研究完成以後，我也終於理解家母的記憶一樣奠基在戰後樣板教育的社會記憶之上，而且，客籍的她婚入父權觀念濃厚的外省家庭，為了取得夫家的接納，她盡力將自己外省化，再加上工業社會吸納農村人口，她流向都市受教育及工作，人口數量弱勢的客家人長期處在都市環境中，家母早已屈服於噤聲的女性與隱形的客家人的雙重不利位置。她的族群認同在此過程中不斷向外省認同修正，但她並非沒有客家認同，只是強勢的環境迫使她選擇對自己有利的邊界修正。而我成長在這樣幾近於「純」外省家庭中，家族記憶與社會記憶高度重疊，我無由懷疑我的記憶不真，直到我接觸了修正個人記憶的機會。至此，我真正明白歷史與記憶之間的弔詭關係，我、家母、江志如，都是明證。



## 參考文獻

丁興祥、賴誠斌

- 2001 <心理傳記學的開展與應用：典範與方法>，《應用心理研究》12：77-106。

王作榮

- 1978 《我們如何創造了經濟奇蹟》，臺北市：時報文化，1978。

王甫昌

- 1993 <省籍融合的本質——一個理論與經驗的探討>，收入張茂桂主編，《族群關係與國家認同》，台北：業強，頁 53-100。

王明珂

- 1993 <集體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當代》91：6-19。
- 1994 <過去、集體記憶與族群認同：台灣的族群經驗>，收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輯，《認同與國家：近代中西歷史的比較》，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頁 249-274。
- 1996 <誰的歷史：自傳、傳記與口述歷史的社會記憶本質>，《思與言—人文與社會科學雜誌》34.3：147-183。

史景遷

- 2001 《追尋現代中國（中）》，台北：時報文化，2001。

江文瑜

- 1996 <口述史法>，收入胡幼慧主編，《質性研究：理論、方法及本土女性研究實例》，台北：巨流，頁 249-269。

江玉珮

- 2002 《蕭麗紅小說中女性主體反思之研究》，屏東：屏東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吳乃德

- 1993 <省籍意識、政治支持和國家認同——臺灣族群政治理論的初探>，收入張茂桂主編，《族群關係與國家認同》，台北：業強，頁 27-52。

吳忻怡

- 1996 《「多重現實」的建構：眷村、眷村人與眷村文學》，台北：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吳孟潔

- 2006 《漂洋過海的生活：台商女性配偶的遷移與轉變》，新竹：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呂秀玲

- 1998 《眷村的社會流動與社會資源——一個榮民社區之田野研究》，台中：東海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李克勉

- 2008 <新竹教區簡史>，網路資源，<http://catholic.org.tw/catholic/tc02-1.php>，2008 年 6 月 25 日。

李國鼎

- 1978 《台灣經濟快速成長的經驗》，台北：正中，1978。

李雲漢

- 1985 《中國近代史》，台北：三民，1985。

李道生

- 1987 《聖經與中國文化》，台北：基督教中國主日學協會，1987。

林忠正、林鶴玲

- 1993 <臺灣地區各族群的經濟差異>，收入張茂桂主編，《族群關係與國家認同》，台北：業強，頁 101-160。

林信華

- 2002 《文化政策新論：建構台灣新社會》，台北：揚智，2002。

林耀華著，宋和譯

1989 《金翅：傳統中國家庭的社會化過程》，台北：桂冠，1989。

柯塞著，邱澎生譯

1993 <阿伯瓦克與集體記憶>，《當代》91：20-39。

查時傑

1987 <一百七十年來的基督教>，收入林治平編，《基督教入華百七十年紀念集》，台北市：宇宙光，頁 1-28。

胡台麗

1993 <芋仔與蕃薯——台灣「榮民」的族群關係與認同>，收入張茂桂主編，《族群關係與國家認同》，台北：業強，頁 279-325。

風的故鄉

2008 <北大教堂>，網路資源，<http://www.cpmah.org.tw/2001/c900007/www/k-13.htm>，2008 年 6 月 25 日。

徐勃毓

2003 《美國墨西哥裔移民發展之研究》，台北：淡江大學拉丁美洲研究所碩士論文。

袁美雲

2004 <潭門地名探索>，《新竹文獻》15：41-47。

張茂桂

1993 <省籍問題與民族主義>，收入張茂桂主編，《族群關係與國家認同》，台北：業強，頁 233-278。

2002 <「流浪」到永遠？評介趙彥寧，《戴著草帽到處旅行》>，《台灣社會學刊》28：261-267。

莊英章

1994 《家族與婚姻》，台北：中研院民族所，1994。

郭苑平

2003 《眷村台灣媽媽的自我與認同研究》，新竹：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陳正茂編著

- 2003 《台灣經濟發展史》，臺北：新文京開發，2003。

陳怡君

- 2006 《日治時期女性自我主體的實踐——論楊千鶴及其作品》，台南：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陶涵（Jay Taylor）著，林添貴譯

- 2000 《台灣現代化的推力：蔣經國傳》，台北：時報，2000。

彭芊琪

- 2005 《外省客家人的本土化：以廣東陸豐莊氏宗親會為例》，桃園：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游鑑明

- 2002 《傾聽她們的聲音：女性口述歷史的方法與口述史料的運用》，台北：左岸文化，2002。

湯熙勇主編

- 2002 《臺北市地名與路街沿革史》，臺北市：臺北市文獻委員會，2002。

黃進興

- 1990 《半世紀的奮鬥—吳火獅先生口述傳記》，台北：允晨，1990。

新竹客運股份有限公司

- 2007 <新竹客運股份有限公司簡介>，網路資源，  
<http://www.hcbus.com.tw/fpage01.htm>，2007年5月16日。

溫世仁

- 1997 《台灣經濟的苦難與成長》，臺北市：大塊文化，1997。

溫曼英

- 1993 《吳舜文傳：中國最有影響力的女企業家》，臺北市：天下，1993。

葉龍彥

- 2006 《台灣的老戲院》，台北：遠足文化，2006。



賈穎華

2002 <五十寒暑老街情>，《青年日報》2002.02.03。

廖正宏

1985 《人口遷移》，台北：三民，1985。

趙文衡

2003 《台灣崛起：從停滯到高飛的經濟躍升》，臺北市：御書房，2003。

趙彥寧

2001 <戴著草帽到處旅行：試論中國流亡、女性主體、與記憶間的建構關係>，收入趙彥寧主編，《戴著草帽到處旅行》，台北：巨流，頁 203-245。

趙剛

1998 <錢、「謊言」、統計表：體檢族群民族主義的利益政治>，收入《告別妒恨：民主危機與出路的探索》，台北市：唐山，頁 71-96。

劉益誠

1997 《竹籬笆內外的老鄉們—外省人的兩個社區比較》，新竹：清華大學社會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潭門鄉志編輯委員會

1997 《潭門鄉志》，新竹：潭門鄉公所，1997。

蔡麗玲

1998 《母職作為女性主義的實踐》，新竹：清華大學社會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賴錦慧

1998 《族群通婚與族群觀——四季新村原住民婦女的經驗》，花蓮：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聯合報新竹訊

1953 <春雨纏綿，豬瘟猖獗>，《聯合報》1953.04.22。

1954 <竹將開座談會商討改善民俗>，《聯合報》1954.06.13。

1954 <第五期補充兵定期分別入營各地籌備熱烈歡送>，《聯合報》1954.07.02。

謝高橋

- 1995 <台灣大都市原住民的居住隔離——以台北市為例>，收入曹俊漢、柯瓊芳主編，《中西都會區之發展與面臨的問題》，台北：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頁203-240。

謝國雄

- 2003 《茶鄉社會誌：工資、政府與整體社會範疇》，台北：中研院社研所，2003。

羅鵬華

- 2001 《大潭門的歷史人類學探討》，2001。
- 2004 《老街講古》，2004。
- 2006 <在歷史街區崛起：一間客家社區咖啡廳的故事>，發表於研討會，2006年10月29-30日。

Joan Ferrante 著，李茂興、徐偉傑譯

- 1998 《社會學：全球性的觀點》，台北：弘智，1998。

Saskia Sassen 著，黃克先譯

- 2006 《客人？外人？遷移在歐洲（1800～）》，台北：巨流，2006。

## 史料剪影

納稅或扣繳商號/名稱		負責人姓名		詳細地址	
[Blank]		[Blank]		[Blank]	
業別	娛樂	所屬	27年3月1期	售出券張：壹張	(無價券 元 角)
期別	自 日起至 日止	開立統一發票冊	張(自 字第 號起至 號止)	營業稅收入額：	元 角 分
代征稅額	萬 仟 百 拾 元 角 分	扣額獎勵金百分之一	萬 仟 百 拾 元 角 分		
帶征防衛捐百分之一	萬 仟 百 拾 元 角 分				
應納稅額及防衛捐總額	新台幣 萬 仟 貳 百 捌 拾 元 零 角 零 分				
總計	新台幣 (大寫) 萬 仟 貳 百 捌 拾 元 零 角 零 分				
自行報繳日期	27年3月21日	限繳日期	甲期稅款限乙期第一日前繳納		
備考	收款公庫				
	收款日期				

上列稅款由該號自行填單報繳到庫已照數收訖無誤。

(210 x 14mm)

使

新竹縣政府 52 年上下期乙種車輛使用牌照稅單

92

車輛號碼

車牌號碼

車牌號碼	出廠年份	車身顏色	引擎馬力	車身號碼	車牌號碼
CC					
納稅人姓名	地址	電話	車牌號碼	車牌號碼	車牌號碼
上屆牌照號碼	本屆牌照號碼	有效期間	有效期間	有效期間	有效期間
限繳日期	自 52 年 1 月 31 日起至 52 年 2 月 28 日止	有效期間	有效期間	有效期間	有效期間
應納稅額	新臺幣(大寫)	佰 壹 拾 捌 元	應納稅額	新臺幣(大寫)	佰 壹 拾 捌 元
運銷金	新臺幣(大寫)	佰 拾 元	運銷金	新臺幣(大寫)	佰 拾 元
合計	新臺幣(大寫)	佰 拾 元	合計	新臺幣(大寫)	佰 拾 元
備註	<p>92.23</p> <p>訖收</p>				

縣市照稅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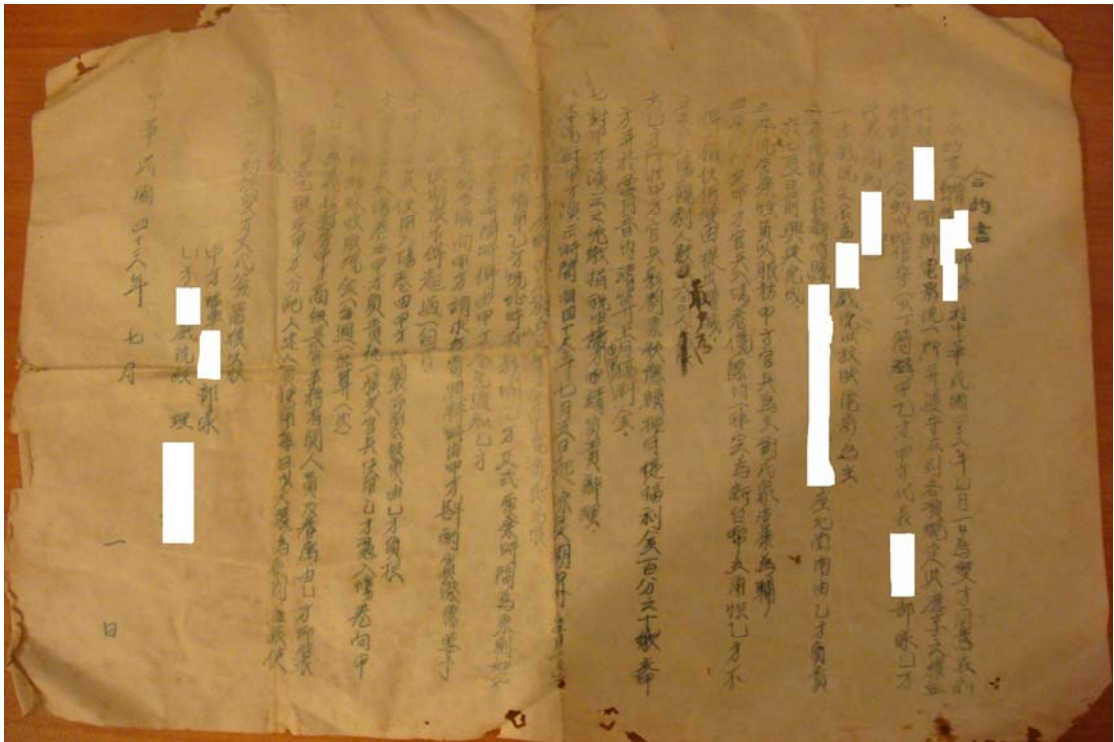
征收機關

核發

填發



### 3.戲院開辦合約書



### 4.地基租金繳納收據

